

# 目 录

达理札雅·····	罗永寿 张文第 张世杰
引言·····	( 1 )
一、阿拉善霍硕特旗的由来·····	( 1 )
二、从和罗理贝勒到达理札雅亲王·····	( 2 )
三、从一代王公到人民干部·····	( 4 )
附：阿拉善旗历代王位世袭表·····	( 6 )

##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第一节 定远营及王府·····	( 7 )
第二节 诞生于显赫家庭·····	( 9 )
第三节 北京罗王府·····	( 10 )
第四节 离旗回京·····	( 11 )
第五节 生活习惯和爱好·····	( 13 )
第六节 与金允诚结婚·····	( 14 )
第七节 塔王逝世与达理札雅袭位·····	( 16 )

## 第二章 离平回旗 举行承袭大典

第一节 饱经战乱的阿拉善旗·····	( 18 )
(一)回民聚众进攻定远营·····	( 18 )
(二)外国教会在阿旗的侵略活动·····	( 19 )
(三)哥老会在定远营的活动·····	( 20 )
(四)独立队的骚扰·····	( 22 )
(五)小三爷事件·····	( 24 )
(六)南寺格根事件·····	( 32 )
第二节 回旗途中情景·····	( 37 )
第三节 王府生活·····	( 40 )

第四节 承袭大典·····	( 42 )
第三章 执政以后	
第一节 革新政治制度·····	( 46 )
附：清时阿拉善霍硕特旗组织情况表·····	( 48 )
第二节 遴选新的政府官员·····	( 49 )
第三节 改建武装力量·····	( 50 )
第四节 革除陈规陋习·····	( 53 )
第五节 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	( 54 )
第六节 七世班禅到阿拉善旗·····	( 56 )
(一) 喇嘛教流传到阿拉善旗·····	( 56 )
(二) 向第七世班禅额尔德尼发出邀请·····	( 57 )
(三) 筹备迎接班禅大师·····	( 58 )
(四) 班禅大师在定远营·····	( 59 )
(五) 班禅大师到阿拉善旗的影响·····	( 60 )
第四章 同日本人周旋	
第一节 与张学良旧友重逢·····	( 61 )
第二节 以物资支持抗战·····	( 63 )
第三节 与“蒙政会”的关系·····	( 64 )
第四节 日本特务在阿旗的活动·····	( 66 )
第五节 与坂垣征四郎的会见·····	( 68 )
第六节 日本人在阿旗修飞机场·····	( 69 )
第七节 陈诚来宁夏·····	( 70 )
第八节 关麟徵率兵驱逐日特·····	( 71 )
第五章 与马鸿逵抗争	
第一节 冲突的由来·····	( 72 )
(一) 根源在于磴口设县·····	( 72 )
(二) 特务的挑拨离间·····	( 74 )

第二节 定远营之战	( 75 )
第三节 马家势力涌入阿旗	( 78 )
(一) 设立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	( 78 )
(二) 加强军事控制	( 79 )
(三) 设立军警联合督查处	( 79 )
(四) 设立富宁公司	( 80 )
(五) 设立税卡、木材厂等	( 81 )

## 第六章 兰州七年

(一) 银川小住	( 81 )
(二) 移居兰州	( 82 )
(三) 两谒蒋介石	( 86 )
(四) 阿旗人民思念札萨克	( 87 )
(五) 两次回旗探望	( 89 )
(六) 离开兰州回旗	( 91 )

## 第七章 和国民党打交道

第一节 开始经营阿旗	( 92 )
第二节 设立军事专员办事处	( 94 )
第三节 设置协赞专员	( 97 )
第四节 建立国民党党团组织	( 99 )
第五节 国民党在阿旗的特务组织	( 101 )
第六节 教育和卫生设施	( 104 )
第七节 监督、羁縻、控制、怀柔	( 105 )

## 第八章 励精图治

第一节 改组阿旗政府	( 107 )
附：改组后的阿旗政府组织表	( 109 )
第二节 一次多种意义的庆祝会	( 108 )
第三节 “约法三章”	( 110 )

第四节	举办边官训练	（111）
第五节	重整地方武装	（112）
附：	阿旗区防司令部组织表；区防司令部及骑兵保安总队人员装备表	（114）
第六节	整顿财政经济	（115）
（一）	改革财政制度	（115）
（二）	收回三盛公天主教堂侵占的土地	（116）
（三）	发展盐业生产	（117）
附：	阿旗十三盐池方位表	（119）
（四）	开发煤矿、碱矿和其它土特产	（120）
（五）	减免包道税	（121）
第七节	兴办学校	（123）
第八节	改革宗教	（124）
附：	阿旗八大寺名称和十六个小寺名称	（124）
第九节	被召进京述职	（125）
第十节	其它政治活动	（125）
（一）	处理与甘肃划界问题	（125）
（二）	举办国大代表选举	（126）

## 第九章 率领阿拉善旗和平起义

第一节	北平和平解放对阿旗的影响	（127）
（一）	王府会议	（127）
（二）	坚定地反动势力作斗争	（133）
第二节	蒙古自治政府的开锣与收场	（140）
第三节	李守信率部西窜与德王会合	（143）
第四节	宁夏特务营哗变	（145）
第五节	防止牧民逃往外蒙	（149）
第六节	阿旗在迎接和平解放前的准备	（151）
（一）	成立阿旗解放指挥部	（151）

(二) 做好全旗和平解放的准备工作·····	(153)
第七节 派员赴兰州欢迎解放军·····	(156)
第八节 阿旗向北平及西北野战军发出致敬电·····	(157)
(一) 派代表晋见彭总·····	(157)
(二) 向毛主席致敬电·····	(158)
(三) 派代表欢迎十九兵团·····	(160)
(四) 到腰坝欢迎解放军徐团·····	(162)
(五) 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63)
(六) 到银川会见党政军领导 ·····	(167)
第九节 争取德李部属投诚·····	(170)
第十节 中共阿旗工委成立·····	(174)
(一) 成立阿旗自治区人民政府·····	(174)
(二) 开展各项民主改革工作·····	(175)
(三) 举行那达慕大会庆祝解放·····	(176)

## 第十章 新的荣誉、新的征途

第一节 新的荣誉·····	(177)
第二节 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	(178)
第三节 努力学习 改造思想·····	(178)
第四节 认真工作 赤胆忠心·····	(179)
第五节 积劳成疾·····	(180)
第六节 惨遭“四人帮”迫害致死·····	(181)
第七节 举行隆重追悼会悼念达理札雅先生·····	(181)
后记·····	(185)
附录(一) 营建定远营碑文·····	(185)
附录(二) 清代官员的顶戴、蟒袍、补服、腰带和坐褥	

..... ( 186 )

怀念我的母亲爱新觉罗·韞慧

( 金允诚 ) ..... 达倩芬 ( 188 )

# 达 理 札 雅

罗永寿 张文第 张世杰

## 引 言

达理札雅是内蒙古原阿拉善霍硕特旗第九代第十位亲王札萨克，也是阿拉善旗最末的一位王爷。

### 一、阿拉善霍硕特旗的由来

阿拉善霍硕特旗是由阿拉善与霍硕特及旗三词组成，前者表示地域名称，中间表示部族名称，旗则是蒙族聚居地的行政单位，相当于县。阿拉善是贺兰山的转音。贺兰山始名说法不一，有说是由于西晋太康年间（284年—287年）内迁的匈奴族贺兰部曾在贺兰山一带居住而得名；还有说是因山中树木状如骏马，突厥语“马”为“曷拉”转音为贺兰。不过汉晋以后，逐渐有贺兰山之名。

霍硕特部系成吉思汗之弟哈萨尔哈布图的后代，该部酋长顾实汗在西套的一支，即其子鄂其尔图汗与孙和罗理。

康熙十六年，准部噶尔丹兵袭西套，鄂其尔

图汗部从溃散、和罗理避居阿拉善，求达赖喇嘛表请归牧，清政府以其地赐之。

康熙三十六年，清廷按内蒙四十九旗之例，将阿拉善编为佐领，封和罗理为多罗贝勒札萨克，并颁发印信，称为阿拉善霍硕特旗。

## 二、从和罗理贝勒到达理札雅亲王

阿拉善霍硕特旗建立后，和罗理被封为多罗贝勒，并授予札萨克印绶，这即是阿拉善霍硕特旗的第一代札萨克。旗首府设在紫泥湖。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和罗理死，康熙四十八年，其子阿宝袭贝勒爵。

阿宝幼居北京，并充任御前侍卫。康熙四十三年，尚和硕格格（郡主），授他为和硕额駙。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阿宝率兵远征准噶尔诸战皆捷，复又奉命护送达赖喇嘛入藏，先后在青海、西藏统兵达十年之久。雍正元年（1723年），阿宝晋爵多罗郡王。雍正八年（1730年），清廷在贺兰山以西设立定远营城，以为镇守之地。雍正九年（1731年），阿宝归牧阿拉善时，即奉命驻于定远营。乾隆四年（1739年）阿宝死，次子罗卜桑多尔济袭职札萨克多罗贝勒。

乾隆十二年（1747年），尚多罗公主，授多罗额駙，后奉命从征准噶尔诸部，擒获塔瓦



齐汗和辉特部汗巴雅尔，并使哈萨克降，歼灭柯尔柯斯诸部，追击阿睦尔萨那至俄罗斯境。二十二年（1757年），罗卜桑多尔济晋爵为多罗郡王，授参赞大臣。三十年，晋封霍硕亲王，俗称罗王，并在北京建罗王府。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又授予“世袭罔替”的特殊待遇。罗卜桑多尔济时代是阿拉善旗的盛世，为阿旗诸王中最知名的一位，故后代阿旗台吉多取名的音首，以罗为姓。

罗卜桑多尔济在位四十四年，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死去。同年，长子旺沁班巴尔袭位，这是阿旗的四代四王。

旺沁班巴尔死于嘉庆九年（1804年），在位二十一年。由其弟玛哈巴拉袭位，是为阿旗的四代五王。

玛哈巴拉死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在位二十八年，由其长子囊多布苏隆袭位，为五代六王。

囊多布苏隆在位十二年，于道光二十四年死去。其长子贡桑珠尔默特袭位，为六代七王。

贡桑珠尔默特在位三十二年，光绪二年死去。由其次子多罗特色楞袭位，为七代八王。

多罗特色楞在位三十四年，宣统二年（1910年）死去，由其长子塔旺布理甲拉袭位，为八代

九王。

塔旺布理甲拉袭位时，正值辛亥革命成功，清廷退位，民国成立。后政权被袁世凯篡夺，承认蒙古王公制度。塔旺布理甲拉曾出任袁世凯政府的京都翊卫使和蒙藏院总裁。并由于在北京有豪华的罗王府住宅，长期居住北京，甚少回阿旗管理旗政。民国二十年（1931年）塔旺布理甲拉死去。王位由其长子达理札雅承袭，为九代十王。一直到1949年和平起义在位十九年。

阿拉善霍硕特旗王位世系共九代十王。其统治时期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算起，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计二百六十三年。若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阿拉善正式编旗、封爵算起，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则为二百五十二年。

### 三、从一代王公到人民干部

达理札雅的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国民党统治到人民革命胜利，这是一个革新与守旧、侵略与反侵略、革命与反革命斗争非常复杂、激烈的时代。达理札雅出生前后，戊戌变法彻底失败，义和团反帝斗争惨遭镇压，八国联军猖狂入侵，国将不国；国内民族矛盾亦趋激烈，辛亥革命风起云涌，清廷退位，民国成立。以后经过袁世凯称帝，北洋军阀混战，蒋介石

石国民党倒行逆施，镇压人民，日寇侵略，人民抗战，又经过人民解放战争，国民党败逃，人民革命胜利。处在这样一个触目惊心剧变的历史时代。在潮流的涤荡下，达理札雅也在潮流漩涡中冲撞，旧的封建思想烙印逐渐减退，新的民主意识逐步增加，使他渐渐开拓了政治眼界，对事物逐渐能辨清是非曲直，作出比较正确的抉择。如一，当“九·一八”伪满洲国成立时，他不为所动，没有走入歧途；二、日本特务潜入阿旗，劝诱威胁，他多方应付，没有妥协；三、马鸿逵兵围定远营，他被受到怀疑以大局为重，移住兰州七年之久，并无怨言；四、特别是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他坚决脱离国民党阵营，既不听命于国民党调遣与马鸿逵同流抗拒解放，亦不受国民党诱骗逃往台湾，且与德王李守信决裂不逃亡沙漠戈壁负隅顽抗，而是大义凛然，旗帜鲜明地率领全旗军民举起义旗，归依人民阵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后半生献给了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象达理札雅这样的人物，在当时的蒙古王公中还是不多见的。本文作为人物传记，将通过史实，力求对达理札雅一生，作出实事求是的叙述。

阿拉善旗历代王位世袭表

代序	与前代王关系	袭位人	袭位时间	在位时间	谥号
一代	——	和罗里	康熙二十五年——康熙四十六年 公元1686——1707年	21年	爱尔和吉能
二代	三子	阿宝	康熙四十八年——乾隆四年 公元1709——1739年	30年	蒙滚阿宝
三代	次子	罗卜桑多尔济	乾隆四年——乾隆四十八年 公元1739——1783年	44年	博格达诺彦
四代	长子	旺沁班巴尔	乾隆四十八年——嘉庆九年 公元1783——1804年	21年	布尔罕诺彦
	胞弟	玛哈巴拉	嘉庆九年——道光十二年 公元1804——1832年	28年	阿其图诺彦
五代	长子	囊多布苏隆	道光十二年——道光二十四年 公元1832——1844年	12年	葛根诺彦
六代	长子	贡桑珠尔默特	道光二十四年——光绪二年 公元1844——1876年	32年	呼毕勒罕诺彦
七代	次子	多罗特色楞	光绪二年——宣统二年 公元1876——1910年	34年	呼图克图诺彦
八代	长子	塔旺布里甲拉	宣统二年——民国二十年 公元1910——1931年	21年	乌鲁希叶勒图诺彦
九代	长子	达理札雅	民国二十年——民国三十八年 公元1931——1949年	18年	爱克图希叶图诺彦

## 第一章 青少年时期

达理札雅，字锐荪，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出生在阿拉善霍硕特旗定远营王府。

### 第一节 定远营及王府

定远营（1952年改称巴音浩特）是阿拉善旗的首府，位于贺兰山北麓；是祖国西北边疆的蒙古民族部落的古城重镇。建于清雍正八年（1730年），距今有近三百年的历史。

据史料记载，清朝雍正鉴于贺兰山北大片土地无人管理，为稳定西北的蒙古族部落，采纳岳钟琪、通智等大臣的奏请，在贺兰山北麓十里处建一城池，特设一营，驻兵镇守，名曰定远，当地人叫它是“皇上的马圈”。雍正十年（1732年）阿拉善第二代王阿宝镇压准噶尔叛乱由青海凯旋回来，清廷即以定远营及全部阿旗土地赐之。阿宝王即将原来阿拉善旗首府由紫泥湖迁至定远营，始建王府，修寺庙。以后历代王爷都不断修缮，一直以定远营为首府。

定远营城始建于雍正四年，雍正八年建成。城地势东高西低，南北两侧突起，由东向西形成一块小盆地。城垣大都由青砖筑成，城围三里三，辟有南门及东门，而无西门和北门，唯在城垣西北角上筑有城楼。城南门外有条大街，直达

南梁，有三道河沟蜿蜒穿过大街。因靠近贺兰山区，气候温和，夏不酷暑，冬不严寒。城池和街道，基本上是仿照北京城垣建造的，故有“小北京”之称。特别是在西花园一带，据传在六代王贡桑珠儿默特执政时期，曾修过一条名叫“长河”的渠道，将三道河沟流水引入，用以摆渡游船。在养鹿山——鹿圈山，还建有壮丽的如意堂等。后经变乱焚毁，只余残垣败瓦了。

王府是从雍正九年（1731年）阿宝王进驻定远营后开始兴建，又经历代王公增建修缮而成的。位于定远营城的东侧，背靠城中的打更山头，由正府、西府、东府、新府组成，均为两进、三进、四进的四合院，共有古式建筑房舍五百余间。另有后花园三处，园内有二层楼房及亭台楼阁、娘娘庙等。还有各种名贵果木树、珍贵观赏树以及松、榆、杨、柳等一千余株。

王府的正府，又名老府，有六间大殿。后院亦有六间大的房子为王府书房，存放各种古籍及名画。新府是在1931年专为达理札雅承袭王位而修建的。

王府大门外，两边有两个大石狮子，形状雄伟。还有东西通道门，叫阿司门，门上挂着两条长鞭、两根木棒。常住有看门的阿司门喀守门人，如遇有骑马过路的人不下马时，即予以处

罚。

最早时代，王府就是政府。到了第四代王玛哈巴拉时，始设印房，王府是住宅，印房是政府。不过远处的人还是统称作王爷府。达理札雅便是在这里诞生的。

## 第二节 诞生于显赫家庭

达理札雅虽是蒙族王公，但由于祖上曾为清王朝征战有功，并世代与清皇室联姻，故得到清廷的特殊照顾，声势较比一般蒙族王公家尤为显赫，达理札雅正是在这样权势很大的家庭里出生的。

达理札雅之父，即阿拉善旗八代九王塔旺布里甲拉。塔王字云桥，在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称帝时曾任过京都翊卫使及蒙藏院总裁等职务。原配福晋是清室克勤郡王的女儿睿仙格格。婚后曾生一子名那笋德力格尔，五岁夭折。而睿仙福晋亦病逝在定远营王府。继娶本旗李氏女为福晋，不久亦病故。后塔王遂来北京罗王府居住时，经喀喇沁旗郡王贡桑诺尔布为媒，娶满族姑娘姜静德为福晋。生有三子一女。长子即达理札雅。

达理札雅是头胎，按清朝制度，如生男子即有袭位问题，按照家规须在封地内（即阿旗）生育，故塔王夫妇在达理札雅出生之前即回定远营王府居住。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农历腊月十二日，达理札雅降生了，由于是男孩，全家皆大欢喜。随即由祖母四老太太看护，并另雇本旗妇女王秀根为奶妈喂养。稍长，又选了两名专门伺候这位大阿哥的人员，张更敦和曹铁保。张更敦教大阿哥蒙古话和阿旗的习惯礼俗、宗教仪式、地方风情。曹铁保教汉语，时或还讲些历史人物故事，使其懂得待人接物的道理。达理札雅后来所以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虽不能说蒙语但能听懂蒙语，并懂得不少蒙汉两族的人情事故，大都是与这俩位侍从的自幼教导分不开的。

达理札雅之母姜静德后来又生了两子一女，次子达都拉旺楚克，三子达穆林旺楚克，女塔祉华。他们幼年时期都在北京罗王府生活。达理札雅在定远营长到十岁，亦随其父母回到北京罗王府居住。

### 第三节 北京罗王府

北京罗王府是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清圣祖为嘉奖阿拉善第二代札萨克多罗郡王阿宝征战有功，拨银五千两，赏赐修建的府第。地址在北京地安门外三座桥府夹道一号，（即清恭亲王府的东边）。其建筑规模和式样，都是仿照清代王府的规模，庭堂院落，回廊画壁，极其辉煌华丽。府内由古式建筑的四合院、新式楼房



和后花园等组成，共有房屋二百余间。

北京罗王府的建成，成了阿拉善王驻京的办事衙门。一方面直接与理藩院发生关系；一方面可以向旗里发布指示，遥控指挥。

北京罗王府原叫阿拉善王府。至第三代王罗布桑多尔济亲王时期，因他率阿旗官兵随清军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处平叛有功建立殊勋，赏赐优渥，备受荣贵，声名显赫，远近闻名，因之以后即以罗王府的名称代替了阿拉善王府。塔王在世的时候，即经常住在那里。达理札雅十岁，亦随其父母来京在那里度过他的青年时代。

#### 第四节 离旗回京

达理札雅到北京罗王府居住后，依然过着幼年时候极其讲究的豪华的贵族生活，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呼奴喝婢，养尊处优，嬉戏游耍，无所事事，根本不以什么仕途经济为重。但是，由于他是嫡生长男，将来是要继承王位的，所以颇为家人尊崇，塔王更是偏爱。为了维护蒙古王爷的封建统治，避免沾染上新思想，塔王特为他在王府内设立了私塾，请名师张煜教授“四书”、“五经”等汉文古籍，并由阿旗请来俞世珍先生教授蒙文，还请人为他教英文、法文和满文。达理札雅天资聪慧，读了几年书，在老师们的精心教诲和父母的督促管教下，学业有所进

步，特别是汉文程度进步较快，阅读、写作能力大增，已能阅览一些小说、文章，批阅一般文件、书信，但对外文和蒙文、满文，则兴趣不大，收获不多。

那时的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正处于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伟大民族民主革命时代，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后，外国的进步思想和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国内各方面的先进人物云集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集会结社，提倡新学，进行革新。处在青年时代的达理札雅，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不能不受到影响，平时与游伴闲谈时，亦常接触此类问题，这对于丰富社会阅历，开拓思想境界，当然有不少裨益。

达理札雅在少年时期的游伴，大多是王公贵族的子弟，追逐的是声色犬马的生活。稍长，即步入社会，广泛展开交游。由于塔王在北京时曾与张作霖、阎锡山、马福祥等军人结拜为盟兄弟，达理札雅于1928年前后曾一度到奉军任官队学习军事，与张学良结为义兄弟，关系甚为密切，后因内战频仍，再未去过奉军军营，但与张学良长期保持着如兄弟关系。其后张学良到了西北，还经常有书信来往。

通过张学良，达理札雅同当时的名流于学忠、宋哲元等也交成朋友。由于交游广见识多，

冲破了封建家庭圈子，给他以后从事社会活动也奠定了基础。

### 第五节 生活习惯和爱好

达理札雅平时生活是酷爱清洁，起居有节，待人接物比较随便，甚少对下人发脾气。他的爱好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爱马。他六岁时就练习骑术，稍长，在读书时兼习骑射，因而对马匹有特殊的爱好。家中饲养名马三、四十匹，雇用名骑师为其调教训练马匹。到阿旗即位之后，还经常带领下属及侍卫人员到郊外骑马，平时还经常到马厩观赏侍弄他的马匹。

二是爱枪。他自己收藏的各式各样小手枪有三十多种，都是当时名人赠送的。对这些手枪平时擦的很干净，大都存放在箱子里保存。他个人喜欢拿支捷克式七九步枪打猎；枪法很准，在一百五十米内能弹弹中靶。

三是爱骑马射箭。据说1936年在阿旗北寺的一次庙会上，他也参加了有一百二十多人参加的箭赛，并获得首名；赢得全场人的喝彩。

四是爱吸纸烟。吸的烟特别讲究，经常吸的是三五牌、茄克利、大小炮台等。后来改吸中华牌香烟。他吸烟有定量，每天吸多少事先都装在纸烟盒内，而且装上不同牌号的烟。招待客人

时，因客人的爱好而异递给不同牌号的烟。

五是爱烟盒、烟咀、打火机等物。对这些东西他在选择上也很讲究，总是千方百计搜集新颖别致的产品。无事时就擦得锃光瓦亮，在朋友交往时，与人比高低。在这些琐碎小事上，都是自己动手，不使唤旁人。

除此之外，达理札雅还对钟表、照像也爱好。《大公报》名记者范长江在他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曾写到“骑马、打枪、照像，是达理札雅的三大爱好”，这话是属实的。

#### 第六节 与金允诚结婚

民国十四年（1925年），达理札雅十九岁时，经人介绍与金允诚女士结婚。这桩婚事，男方是阿拉善旗亲王塔旺布理甲拉的长子，将来王位的继承人；女方是光绪皇帝的叔伯兄弟载涛贝勒的女儿，溥仪皇帝的堂妹，双方都是大富大贵的家庭，可以想象，办起婚事来是非常隆重、豪华、热闹的。

塔王为长子办婚事，阿拉善旗便从财政上取出现洋两万元，并将王府的总管、旗里的副协理、副章京各一人，还有听差、婢女等各四人，应差人员三十人一并派到北京，供婚礼时使用。另外，还将阿旗的土特产，特制的奶皮子、奶豆腐、细羊毛筒子、苻蓉膏、锁阳、宁夏枸杞等贵

重物品送到北京，供馈赠皇亲姑舅之用。

男方给新娘准备的首饰极为珍贵：有金手镯、金戒指若干对，不同式样的钻石白金戒指、翡翠宝石戒指若干对，翡翠手镯、珊瑚项链、盘头首饰都是珍珠宝石缀花，还有其它翡翠、珍珠、玛瑙等装饰品应有尽有。此外，还有若干貂皮、水獭、海龙等贵重皮张，各种衣服。室内摆设，更是琳琅满目。地毯、床毯都是按皇室官中式样制做的，金碗、银杯等生活用品，一应俱全。

女方陪送的嫁妆有四十柜，无非也是金银珍珠玛瑙翡翠之类的贵重用品和衣物。

结婚那天，达理札雅、金允诚各穿着民族礼服，达坐的是漂亮的洋马车，金坐的是八抬大轿，前后有执事乐队。另外，还有双方聘请的送亲和娶亲的马车，各二十辆。每辆车内乘坐夫妇成双的二人，这些车马行走在大街上，长达数里，沿途观者如堵。这天前来贺喜的宾客多达一千余人。除双方亲友外，马福祥、喀喇沁旗贡王等显贵亲友亦来致贺。

婚后伉俪情笃，夫妻相敬如宾，先后生下六女一子。

金允诚幼读诗书，兼爱绘画，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以后对达理札雅的帮助是很大的。达理札

雅亦尊敬金允诚，事无大小，都与金允诚商议而行。

### 第七节 塔王逝世与达理札雅袭位

在达理札雅结婚之前，罗王府里为了世袭王位问题，正闹着矛盾。塔王要照正统观念，由长子达理札雅承袭王位。福晋姜静德则溺爱次子，要次子达都勒旺楚克承袭王位。由于双方争执不下，使问题久久不能确定。在此时期，姜静德又将罗王府的行政大权连同经济权力悉交达都勒旺楚克掌管，达理札雅不能过问。无奈，塔王只好让达理札雅专负同义斋玉器店的经理权，用意是倘若将来达理札雅得不到王位时，也可以靠这并有十万现大洋股金的玉器店过日子。但这并没有使达理札雅快意，他憎恶作生意，所以每天到马球场赛球，或到赛马场赛马，借以消遣。好在他练就一身骑术，赢的时候多，输的时候少，倒也心安理得。却因此使他本来基础不稳固的学业荒疏了不少。

结婚之后，经过金允诚的规劝，开始把心收敛起来，重新读起书来。金允诚又按照满族贵族的生活规则，每天早上偕达理札雅到塔王夫妇居处请安，晚上双双又去听双亲训话，一直到叫他们回去休息时方请了晚安回到自己的居处。

这样，时间一长，得到了父母的欢心，逐渐

同意让他承袭王位。后来，塔王又请他的盟兄弟张作霖、马福祥、阎锡山等前来斡旋帮助，久悬未决的王位承袭问题才逐渐得到解决。

民国二十年（1931年）春，年仅二十几岁的塔王次子，达都勒旺楚克因骑摩托车摔伤，震坏肺部，吐血而死。其妻亦服毒殉节。塔王遭此变故，忧伤成疾；姜静德亦因爱子夭亡，尤为悲痛。塔王于当年七月二十三日病笃逝世。弥留之际，塔王将全旗大权交给福晋姜静德，请她扶助达理札雅承袭王位；并请其盟兄马福祥等善为照料。

塔王逝世的消息经当时担任蒙藏委员会总裁的马福祥向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呈报后，南京政府正式任命达理札雅继承父职，为阿拉善霍硕特旗札萨克。

命令如下：

国民政府令 第九一零号兼行政院院长蒋中正呈据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马福祥呈请任命达理札雅为阿拉善霍硕特旗札萨克一事应照准此令

主 席 蒋中正  
行政院长

民国二十年（1931年）十二月十三日达理札雅在北京府邸就职。当时曾受到北京有关方面大员及友好的热烈庆贺；并向阿拉善旗通电宣

告，使全旗人民家喻户晓。

## 第二章 离平回旗 举行承袭大典

### 第一节 饱经战乱的阿拉善旗

达理札雅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离开他生活了将近二十年的北京罗王府，回到阿拉善霍硕特旗的。这时的阿拉善旗，从清朝末年开  
始，已经经历了不少战乱。较大的有以下几次：

#### （一）回民聚众进攻定远营

回民在清朝没有政治地位，备受歧视，招致回民极大不满。到了同治初年（1868—1870年），陕西各地回民拥戴教主马化龙为首，起而反对朝廷，声势浩大，很快波及西北各地。不久宁夏、同心、金积堡被占，并分兵进攻定远营。

当时阿拉善执政的札萨克亲王贡桑珠尔默特尚望与之和谈，未加戒备。以后经人劝告，方令旗兵在定远营布防。统领回兵的是白彦虎，命部众攻城，人数达万余人。但仅有刀枪、长矛，缺乏攻城利器。阿旗人数虽少，但有台枪、长龙炮，居高临下，威力较大，多次击退回兵攻城，双方都有较大伤亡。后因阿旗带队官德尔格勒达赖阵亡，旗兵亦伤亡增多，深恐长期相持，寡不敌众，乃派人突围前往北京，请求清廷发兵救援。清廷初尚不以为意，嗣因回兵挖掘公主坟



墓，暴尸街外，始引起重视，派遣张耀统兵救援，回兵向西撤退，定远营之围始解。

此次变乱，阿旗遭到抢掠，许多房屋被焚，居民被杀，损失极为严重。

## （二）外国教会在阿旗的侵略活动

阿拉善旗很早以来，就有一些外国的教堂，三盛公、补隆淖尔、渡口堂等地（即现在巴盟磴口县境内）都设立了教堂；其中以三盛公教堂为最大，俗有“天主国”之称。教堂在三盛公建有类似碉堡的城墙。并备有枪支武器，与当地人民时有纠纷。阿旗蒙汉人民不堪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压迫，进行了英勇的反帝斗争。如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下，以阿木尔吉尔格拉为首的蒙古人，带领一些人将三盛公的比利时派驻神父的教堂——双义堂烧毁。1901年至1902年，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因而各国天主教长先后返回三盛公教堂，硬说阿旗抢掠了他们的经卷和财产，向清政府控告，要求阿旗赔款白银八万两，后经宁夏、兰州、北京各方面再三交涉，决定赔款白银五万两，其中现款一万两先期交付，其余四万两则将附近巴格的可耕地66顷作抵押，至还完赔款时，退还给土地。教堂利用赔款抵押之地，开渠引水，租给教民，非教民不得在领地垦种，无异

以经济逼迫人入教。教民因事涉讼，神父可代官方开脱。遇有匪患或军队过境骚扰，教民可安全避入教堂，由神父保护，甚至凭其深沟高垒对抗。至于疾病、借贷及子女保育、教养；凡为当地政府所无暇顾及者，教堂悉可一一为之解决，卒致教堂代政，拢络人心。著名记者范长江记三盛公天主堂有曰：“教堂为唯一可以指挥民众之机关。神父为最有支配民众力量的首领。一般民众，只知有天主堂，而不知有政府；只知有神父，而不知有官吏。”天主教势力之大，对阿拉善旗之影响可见一般。

### （三）哥老会在定远营的活动

清朝宣统三年（1911年），民间秘密团体哥老会，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影响下，在各地活跃起来。宁夏哥老会首领刘华堂、刘复太等，于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晚，发动会员起义，占领宁夏，并组织新政权，在定远营和贺兰山的哥老会会员，与宁夏哥老会遥相呼应。定远营哥老会首领坐堂大爷张敬铭，也在群众中发展会员，编练包扎黑巾的黑头军，时常向居民显威。显威的方式是聚众开会，会前先发动会员要做英雄好汉，要做敢死队，开会时要大显身手。开会那天，哥老会会员，必须结成队伍，排成行列，执掌会旗，入场围站，招群众聚而围观，这

时，为首的龙头爷，就出场讲话：“现在发现违反会规，做了坏事的一个案件，经详细调查得知是我们会中人干的，干了这案的人，要做英雄好汉，来坐第一把交椅，向大家坦白承认错误，并自己惩罚自己。”这时，预先动员安排的人，就从人丛中闯出来，坐在早已备好的第一把交椅上，坦白地说：“这件案子是我干的，好汉做事好汉当，我要自己惩罚自己。三把刀子六个眼，自己挖坑自己埋。”遂即取出三把刀子，刺穿腿部，这边见刀柄，那边见刀尖。表演的人却坦然自若，面不改色，博得群众齐声喝彩。定远营坐堂大爷张敬铭，也曾用聚会方式，在南梁山刀砍过违反会规的一个会员。哥老会经常用这个方法，显示威风、勇敢和会规的严厉，以取得群众的好感，吸收群众入会。因此入会的人愈来愈多，声势愈来愈大。

这时，宁夏哥老会派人给阿旗政府送信，要一万匹马，五万两银子，二万只羊，并要求尽量供应武器。否则就要攻打定远营。这时，曾策动义和团起义的端王载漪，为避八国联军的追索，正在定远营隐蔽。他同情哥老会的行动，暗地里派他的随从人员苏顺给刘华堂送信，表示愿作内应。而苏顺感到阿旗方面相待甚厚，不满端王这种举动，竟将端王的信送交塔王。塔王对端王深

为不满，但碍于亲戚情面，未予扣押拘禁，只派人把端王送出旗境外了事。

塔王虽然解除了端王这一内应之患，但仍感哥老会人多势众，无法抵抗。并因对方要求条件甚苛，无法应付。准备逃往牧区躲避，朱猷师爷和阿木吉尔格朗痛陈利害，力谏塔王不可轻易出走，动摇人心，定远营有城可守，广大牧区也有兵可调，应立即调动旗兵，严加戒备。哥老会不过一时聚集的乌合之众，必不能持久，终将溃散。塔王从其谏，迅即调集旗兵，严加防守。又通过在阿旗政府供职的张凤鸣，劝说其弟哥老会首领张敬铭和刘大顺等，前往宁夏讲和作缓冲。到十一月间，清西军分统马骥带兵前来剿抚。官兵进抵灵州和宁夏省城后，杀戮哥老会甚众，殃及无辜良民甚多。哥老会首领刘华堂、刘照黎等先期率众取道平罗向北路撤退，仅有张少堂一人为马骥搜获杀害。在定远营和贺兰山一带的哥老会，不敢公开活动了。

#### （四）独立队的骚扰

民国六年（1917年），有甘肃省静宁县人吴生彦，小名六吉的，是个巫医，自称有神术，又用阴阳家扶乩问吉凶等一套骗术来迷惑群众，一般无知者奉之为神明。哥老会首领高士秀、张九才、卢占魁等，尊之为主，称为皇帝。

他封卢占魁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高士秀为御林将军，于凌云为军师，自称独立队，兵力有上万之多。

独立队由三边流窜至河套及蒙旗地区，攻击绥军于乌兰脑包侥幸获胜，得武器甚多，势愈猖獗。其后，六吉用高士秀之议，率所部数千人，经西山咀渡河，占据磴口，大肆抢掠。当地人民纷纷逃散。

阿拉善旗的官员阿木吉尔格朗（人称安久大人）适在赛力庙附近的家中，为了探明独立队的虚实，好与阿旗政府报信，故而没有逃避。独立队到后，即将阿拿获，六吉要拉他入伙，作为进攻定远营和宁夏的前驱，阿诡顺其意，曲意奉承，六吉甚为欢喜，即将阿释放，令其带路进攻定远营。

阿木吉尔格朗即暗派他儿子阿木尔林圭，乘快驼连夜赶到定远营，报告独立队的情况。为了争取更多时间，让阿旗作充分准备，他又以小路崎岖不好走为由，建议六吉折回改走大路（这要多走二百多里路程）。独立队不明阿旗地理，改走大路向定远营进发。阿木吉尔格朗趁独立队忙乱之际，躲到沙漠杂杠（梭梭树）林中，悄悄地溜走了。

阿旗得报后，积极准备防守，并派人驰赴宁

夏请求马福祥派兵救援。一天晚间，高士秀率独立队簇拥着六吉蜂拥而来，屯聚在离定远营不远的庙家梁子一带；致书阿旗政府，要求准许假道赴宁，阿旗当予拒绝。高士秀将兵分成三队。一队猛扑后山营盘；一队猛扑定远营城；一队猛扑市街。这时，守候在后山由杨喇嘛率领的旗兵开枪猛打，城上旗兵配合射击，又加以天气奇寒，朔风凛冽，独立队伤亡甚重，气势大挫。翌晨，宁夏马鸿宾又率大军前来支援，独立队弃马登山，恃险抗拒。宁夏军和旗兵联合进攻，用炮轰击，独立队死伤和冻僵的很多。高士秀见势不佳，率领数人潜逃，其余多被俘获。六吉和“皇后”以及兄弟吴王庆，隐蔽在贺兰山稠密松林中。但终被拿获，押解宁夏城。军师于凌云，统领苏学奉、卢占魁等十八人，后亦被拿获。民国六年五月，六吉等十九人同被处死。经此骚乱，人民遭了灾难，定远营也受到很大的破坏。

#### （五）小三爷事件

“小三爷事件”在阿拉善旗历史上，是比较重要的事件，它表现了阿旗新旧两派的斗争并带有明显的革新性质。它的发生和发展，曾经震撼过阿拉善全旗。

“小三爷”蒙名德钦一心诺尔布，乳名勇格，汉名德毅忱，出身于阿拉善旗的贵族家庭。

他的父亲嘉伦春旺吉勒，是阿拉善旗第七代亲王多罗特色楞的三弟，幼年曾被选为南寺（广宗寺）活佛。人称“三爷葛根”，后自愿还俗，娶妻置妾，生有三子。长子名叫齐米德爱林岑；人称“任大爷”。次子名叫恩克布音；人称“知二爷”。三子即德毅忱，因为有别于其父的“三爷”称号，人们称他为“小三爷”。他幼年在家私塾读书，通晓蒙汉文。民国初年，袁世凯称帝时，曾封他为辅国公。塔旺布里甲拉曾先提升他为管旗副章京，以后，又晋升他正协理。他生活散漫，又与当时的当权派章京陈·莽哈赖不和，很少到旗衙门办公，成为一个虚有其名的贵族人物。

一九二六年九月，冯玉祥的国民军在直奉战争中失败，退据陕、甘、宁一带。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白云梯、郭道甫、伊德钦等在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等协同下，来到阿拉善旗开展推翻王公制度的革命活动。首先找到德钦一心诺尔布进行联系，决定尽速发展革命组织，建立革命武装力量。准备夺取政权，并吸收田协安、孟雄、罗敖有为革命事变的领导者，不久即组成事变的领导集团。

田协安，本名田济。先祖是随清朝皇室公主陪嫁到阿拉善旗的“媵户”。他自幼随父在阿旗

王府当差。因侍奉塔王，常住北京，知道不少新事物，是个出身于奴隶家庭的知识分子。孟雄原系甘肃省秦安县人，有一手裁缝手艺。因在原籍打死了人，逃亡到定远营，由阿旗协理四公爷逐步携他作了梅林兼听差处“达尔嘎”（审判官）。罗敖有，蒙名嘎宁嘎，出身于台吉家庭，因系远支贵族，家庭比较贫困。他精于武术，喜爱狩猎，并会修理枪械。因在旗衙门里学习，通晓公文，由一般“笔帖式”（文书）逐渐提升为梅林副章京，充任全旗兵营“达尔嘎”。后来因吸食鸦片，家庭生活更苦，在他携带鸦片赴京贩卖时，被塔王得悉，当即将其鸦片全部予以没收。因而他对塔王深为怀恨。这几个人都有不满现状的情绪，很容易与德钦一心诺尔布合在一起，合谋推翻王公制度。

这些人结合起来以后，为了发展武装力量，进一步商定，由孟雄在盐务局、税务局、百货统捐局内秘密发展一部分比较可靠的税丁，作为组织商团的基本武装力量。再由罗敖有在旗兵营中发展一些蒙古士兵，壮大武装力量。这些工作进行得都很顺利，而且得到了冯玉祥及其部下宁夏省主席吉鸿昌的有力支持。

当时，冯玉祥曾要求阿旗支援骆驼七千峰，步枪五百支，以供军用。吉鸿昌派姚连榜（姚甲



三)到阿旗定远营，一面坐镇催索，一面与德、田、孟、罗等秘密来往，筹划举事。阿旗管旗章京陈·莽哈赖探得此事，便派人星夜赴京向塔王报告，塔王闻之大惊。急令阿旗衙门中的亲信暗中迅速召集各巴格和防卡的旗兵，对德等进行镇压。德等觉察事已败露，经商得姚连榜同意，并商定联系支援办法，遂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旧历三月初三日凌晨，发动了震撼全旗的以推翻塔王政府为目的的革命事变。

事变发动起来后，由孟雄事先策动，复经国民军武装起来的商团，连同姚甲三所带的国民军，共集合起一百余人。由德等率领，顺利占领了阿旗衙门，缴获了阿旗印信，并包围了王府。由罗敖有事先发动好的在定远营兵营中的一部分蒙兵，也举起起义旗帜，解除了其他蒙兵的武装，占领了定远营各要点，并捕获了当权的陈·莽哈赖章京，其它官员逃跑。这一事变由于事先有充分准备，又得到国民军的支援，所以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顺利地取得了胜利。

事变取得胜利后，德等立即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宣布成立“阿拉善旗政务委员会”，由德钦一心诺尔布任主任委员；成立国民革命军蒙兵第二路军司令部，由德兼任司令，孟雄任副司令，田协安任参谋长，姚甲三任监督（即政

委)，下辖两个旅，罗敖有任第一旅旅长，敖其尔任第二旅旅长，辅国公齐米德爱林岑（小三爷的大哥）任军需处长。所属士兵以参加事变的商团和起义的蒙兵为基础，吸收一些不愿遣散回家的蒙兵。另外，还聘任了原镇国公塔旺策林、镇国公米格瓦齐尔为顾问，副管旗章京罗·巴音都伦为参议。

第二，在定远营城门口召开群众大会。由田协安代表阿拉善旗政务委员会宣布：塔王封建政权已被推翻。由德钦一心诺尔布领导的民主、自由、平等的新政权——阿拉善旗政务委员会宣告成立。还张贴了阿拉善旗王公制度已被推翻的布告。

第三，没收塔旺布里甲拉王府和阿拉善旗的财物，约价值五十万银元（其中白洋十三万元、鸦片一万两、余为珠宝玉器、古玩衣饰之类）。这些财物留一部分作为政务委员会行政费用，绝大部分银元及全部鸦片均上交宁夏省政府。

第四，宣布了被捕获的阿旗管旗章京陈·莽哈赖反对阿拉善旗革新的罪状，于三月初六日执行了枪决。

第五，为了反对封建制度，向全旗宣布废除“乌拉”制度，同时，宣布今后不准再留辫子。

这些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塔旺布里甲拉听

到后非常生气，捶胸顿足，即与讨伐。立即指示阿旗的反对革新的官员，尽快组织各苏木、巴格的佐领、骁骑校、“达木尔”率领全旗武装向新政权进行讨伐。这些人得到指示后，就到牧区招兵派马。并说：德钦一心诺尔布叛变了塔王。向东军（指冯玉祥所率领的国民军）出卖了阿拉善旗。枪毙了管旗章京陈·莽哈赖；抢掠了历代王爷宝库中的财物。国民军在定远营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无所不为。又向群众说：王爷对此十分恼怒，命令你们为王爷效命，为阿旗尽忠。牧民听到这一消息后，纷纷起来向定远营进发。南部巴格的蒙兵，由毛·巴图尔、范·布尔格德、杨·巴图孟柯等率领，截住了从三关口通往宁夏的道路，从东面逼近定远营。沿贺兰山各巴格的蒙兵，由杨·嘎瓦率领，封锁了由樊家营子山区通往宁夏的小路，由北面逼近定远营。巴音乌拉和紫泥湖各巴格的蒙兵，由巴图赛迪率领，从西面逼近定远营。这些蒙兵靠近定远营后，由原副梅林章京黄·图们巴雅尔任指挥。于四月八日向定远营城开始攻击，经过一昼夜的战斗，未能攻破，而定远营至银川各道路已被截断，便撤至南北寺，准备围困定远营。

定远营被围后，阿拉善旗政务委员会向宁夏省主席门致中（吉鸿昌已调走）求援，门从宁夏

派步兵一营驰援又被蒙兵截住，到不了定远营。门闻讯后，乃从河套调苏雨生骑兵旅由镇木关越过贺兰山，冲破蒙兵防线进入定远营，加强了新政权的防务，但是仍在被包围之中。

这时，牧区联军看到城内援军到来，力量增大，一时不易攻破，遂派出原本旗佐领杨·巴图孟柯和罗·恩凯巴图二人，到北京与塔王计议，决定在巴音乌拉的确立毛登地区，组织了阿拉善旗临时政府，统一指挥联军的行动。六月上旬，向定远营展开第二次进攻，将定远营紧紧包围。此时，新政权所凭借的唯一依靠冯玉祥的国民军，主力早已东出潼关，无力西顾。城内人心涣散，军心动摇。门致中虽仍在宁夏，但亦爱莫能助，并认为困守无益，促使与阿旗临时政府和平谈判。

居住在北京的塔王，又向南京政府和蒙藏委员会提出立即制止门致中在阿旗的军事行动，撤走苏雨生骑兵旅，恢复阿拉善旗秩序，赔偿已被劫走的财物等要求。蒙藏委员会遂以中央名义，责令甘肃省主席刘郁芬从中进行调停。刘郁芬与宁夏天致中磋商后派于长东为调解人，到阿旗促成双方谈判，新政权只好服从。谁料于长东到后，竟支持阿旗临时政府方面，尽力为塔王效劳：一是以门致中名义，将姚甲三扣捕解送宁夏；

二是解除德钦一心诺尔布部队的武装，移交给阿旗临时政府；三是迫使苏雨生部队撤离定远营；四是胁迫德、田、孟等人随军撤走。经过于长东这一番处置后，新政权自三月初三日发动政变起，至强迫解散止，共存在了七个月。

新政权被摧毁后，于长东又积极恢复阿拉善旗旧秩序，召集临时政府的负责人及带兵的“达木尔”开会，决定推举南寺活佛“喇嘛爷”暂时护理印务，并派人到北京向塔王汇报旗里的情况。塔王即下令委派罗·巴音都伦为协理，白和尚为管旗章京，杨·尼玛敖其尔为管旗副章京，受喇嘛爷领导，分管旗政。

于长东恢复阿拉善旗旧秩序的作法，为门致中反对，曾下令四处缉拿。于长东由旗府护送至北京罗王府任秘书长，至门致中离开宁夏后方回阿旗，在旗政府仍担任秘书长职务，一直到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病逝为止。

罗敖有、敖齐尔两个新政权的旅长，被旗政府捕获押至南寺处死。曾任蒙兵二路司令部的军需处长齐米德爱林岑，被撤销辅国公爵，台吉革除，降为一般平民。并继续搜捕逃到宁夏的德、田、孟等，他们只好各自分散逃亡。

德钦一心诺尔布一九三〇年春，携长子罗景瑞前往北京，在京时期不幸被塔王发觉，遂于当天

乘车逃至归绥市，住在一家小旅馆内，又被阿旗侦探发现，报告给归绥市警察局扣留，交与阿旗派来的人，押解回旗。经酷刑审讯后，被处以无期徒刑，流放到阿旗南部察干高勒庙，最后病饿而死。其十四岁的长子罗景瑞不久亦被枪毙在拐子郭勒卡伦。孟雄自一九二九年从宁夏逃亡后，至今无消息。田协安于解放后返回阿旗。齐米德爱林岑于解放前郁郁而死。

#### （六）南寺格根（那旺丹曾——达布华呼图克图）事件

南寺即广宗寺，格根是喇嘛庙里最高首脑，俗称活佛。南寺格根事件，是小三爷事件的继续和发展，也是阿旗上层争权夺利的一场激烈斗争。

旗府自从把姚连榜（姚甲三）、小三爷等人从定远营打跑以后，指挥这一战斗的毛·巴特尔、范·布尔格德二人，以战功被喇嘛坦（即喇嘛爷）任命为旗兵营总管和副总管。当时逃亡到城外的原管旗梅林图门吉尔嘎拉回来后。他同毛·巴特尔和范·布尔格德组成一派，主张罢免原有的一切官员。理由是他们既能当官员，为什么保护不了旗政，还被小三爷等人夺了去呢？其中图门吉尔嘎拉则连喇嘛爷代掌旗政也不同意。另一派则是以协理巴音都伦（又名巴哈乃）为首的原

任官员赛登（副协理）、好生满吉（章京）、杨·尼木资尔（副章京）等人。在这种情况下，喇嘛爷把图门吉尔嘎拉革除了官职，交雅布赖、树桂两个巴格的“达木尔”监视。不久，协理巴哈乃又把毛·巴特尔、范·布尔格德二人扣押起来，据说是因为毛·巴特尔是南寺格根的堂叔父，当时格根正在北京，毛·巴特尔要到北京迎接格根回来。巴哈乃怕毛见了塔王说自己的坏话，才把他扣押的。

民国十九年（1930年），格根从北京回旗，在他的干预下，毛·巴特尔被释放，并恢复了图门吉尔嘎拉的顶戴。

毛·巴特尔被释放后，翌年去了银川，由宁夏马鸿宾任命为德尔斯（中卫县）北、西路三站游击司令。

协理巴音都伦听到消息，就给马鸿宾去信，要求他把毛·巴特尔处死。马鸿宾不但不听，反而把原信交给了毛·巴特尔。毛看了信以后，便把格根请到了银川，见了马鸿宾。马认为阿拉善旗衙门对有功的毛·巴特尔这样对待是不公正的，表示在王爷回旗以前，他将保护毛·巴特尔，要格根回旗以后，到旗衙门讲清道理。

格根于六月十四日返回阿旗。他们一行十来个人，只有一人带枪，来到南寺，迳赴旗衙门。当

行至定远营以南三道河沟时，城内向他们开枪射击，他们便打马冲进定远营城内，一人被打死，门岗也有一人被格根随从打伤。格根便直接冲入自己的“拉布楞”（格根在定远营的别府）。

格根进城以后，便受了包围。夜间随员们把格根的“色本”，名叫罗布桑却木不勒的，用绳子系上，偷着从城墙放下来跑回南寺，报告格根被围之事。当时，南寺喇嘛大部分是拥护喇嘛爷的，少部分拥护格根的，这部分人里，连小喇嘛在内，一共集合了六、七十名喇嘛，要进城营救格根。当时，经过边界卡伦负责人杨·格瓦的说合，得以进了城，经过多方交涉，才把格根接回南寺。

不久旗衙门通令全旗，消除南寺格根的达布华呼图克图尊号，缴回袈裟，降为普通喇嘛，交由南寺“朝克沁吉萨”监视。继而处死了同格根有联系的图门吉尔嘎拉，又把范·布尔格德也扣押起来，并陆续传讯参与这一事件的人。巴音都伦协理接着也为此事进京参见王爷。

同年冬月，有叫阿木尔撒那、来格登的两个人，为给图门吉尔嘎拉、范·布尔格德报仇，举兵打进旗衙门，释放了范·布尔格德；把副协理赛登和副章京杨·尼木资尔扣押起来，又请格根



到衙门来。格根把喇嘛爷请来。喇嘛爷便以执掌旗印的身份，追究枪杀图门吉尔嘎拉和扣押赛登、杨·尼木资尔的责任。阿木尔撒那和来格登二人说：图门吉尔嘎拉是巴音都伦杀的，与我们无干。关押赛登、杨·尼木资尔由我们负责，与格根无干。喇嘛爷表示不愿再管旗印了，经格根再三劝解，并向喇嘛爷道歉后，喇嘛爷才表示继续掌印。事后赛登和杨·尼木资尔被释放。格根与喇嘛爷相继回到南寺。事情才暂时平息。

同年九月，旗衙门下令拘捕格根的随从德勒格尔，格根叫他前往银川投靠毛·巴特尔，当了副官。这时正值吴佩孚率兵经银川，毛·巴特尔便给格根写信，要格根去见吴佩孚，设法使他回旗；并营救范·布尔格德。据说当时，吴佩孚声言到前线打日本鬼子去。及至格根到银川时，吴已出发，于十二月初五才在石咀山追上了吴，述说了旗内发生的事情，并说旗里怀疑他参加了红党，要求吴出面讲和。传说吴和格根当时还有一段对话：吴问：“日本怎样？”格根答：“一朵乌云，很快就过。”吴说：“请你回下处，以后在北京相见。”格根的要求被吴婉言拒绝后，郁郁不乐，十二月初九日回南寺。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正月，阿木尔撒那、来格登二人，又把格根和毛·巴特尔请到

旗衙门，打算追究扣押毛·巴特尔、范·布尔格德、向格根开枪、抢杀图门吉尔嘎拉等事的责任。毛·巴特尔在来旗途中，经过副章京杨·尼木资尔的家，将杨捆绑起来，严加拷打。并连人及审问纪录一并带到旗衙门。正当大家在旗衙门议事时，城已被喇嘛爷所发动的兵包围。带兵的是杨·格瓦等人。至夜，双方开了火，一直打到次日中午，死伤几人。结果，毛·巴特尔、范·布尔格德、阿木尔撒那、来格登均被逮捕。处死了阿木尔撒那和来格登二人；将毛·巴特尔交给宗别立巴格砚迪尔图防卡服劳役；范·布尔格德交给北寺服劳役；格根在杨·格瓦的帮助下脱险逃回南寺，感到自身危险，便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八月初三离开南寺，只身逃亡外地，不知所终。以后，毛·巴特尔亦被旗衙门处死。

以上几桩较大的变乱，大大损伤了阿拉善旗的元气。人员的死亡，物资的损失，使阿拉善旗蒙受严重摧残。当时国外日寇的节节侵略，国内军阀特别是宁夏军阀马鸿逵的咄咄进逼，而塔旺布里甲拉长期居留北京，旗内政务交给当时的协理、章京及贵族、台吉管理，时间一久，有些人便争权夺利，树立派别，各自为政，发生磨擦，造成阿拉善旗政治上群龙无首，四分五裂，动荡

不安的局面，加之连年干旱，致使牧业遭受极大的破坏。在这种天灾人祸的干扰下，全旗上下都抱有一个希望，盼着王爷回来整顿一下。因此，当听到达理札雅已被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任命为阿旗札萨克；继承亲王王位时，人们莫不欢欣鼓舞。于是便由罗·巴音都伦到北平敦请达理札雅回阿拉善旗执政。

### 第二节 回旗途中情景

阿拉善旗派人到达北平后，达理札雅即着手准备回旗，除了要运回塔王的、二弟的、二弟媳的三个棺木外，主要的是随行人员问题，谁去谁留，需要统筹安排一下。首先师爷于长东先生必须带去，因为在瓦解小三爷势力的斗争中，他是维护阿旗封建统治制度的大恩人，又是塔王临终前的“托孤之臣”，必须随同前往；其次是心爱的几匹良马和养马的温头，因为他是载涛老岳父特意挑选介绍，而且有丰富的养马经验的。除此以外，必须随去的厨师、医生、差役、婢妇，也适当选定一些。此次不能随去的，仍留在罗王府，以备将来回京时需用。这样算来算去，随去的足有百十口人。

当时，由北京到阿拉善旗，行程数千里，乘火车只能到达包头。从包头到阿旗还有一千来里旱路，要穿越草地、山地、沙漠等地才能到达定

远营。

达理札雅带领全家百十口人，从五月初九日动身，乘火车到包头。下车后，早有旗下官员派来的迎接人员；有阿旗骑兵三百人；旗府官员一百余人；连同运输骆驼五百峰、乘马六百匹、轿车数十辆、汽车两辆，以及马夫、驼夫及应差人等合计有一千余人，长达十几里地，浩浩荡荡从包头进入阿旗境内的磴口巴格。在这里，阿旗沙金套海巴格、巴音套海巴格、道兰素海巴格的一些蒙民群众，已先后到阿旗边界，开始向达王敬献哈达迎接。三盛公天主教堂也派了代表迎接。

从磴口到定远营六百里路程，设有十好几个驿站，三十里一打尖，六十里一住宿。每个驿站设有“达木尔”（边官）一名。准备作厨房用的蒙古包一至二顶，王爷专用的蒙古包两个。每日午餐和晚餐均准备绵羊一只，专供王爷和福晋享用。水和柴是骆驼驮运。王爷到了驿站，“达木尔”须跪拜迎接，献哈达请安。王爷用的蒙古包，也是用骆驼驮运，从宿营地到打尖地，须等王爷动身以后才得搬运，并须赶在王爷前头去作准备，不然要受处罚。三个棺木都是用骡子驮着，两边各有四个人扶着走。王爷有时坐车，有时骑马，间或有时观赏路边畜群。福晋和其他

随来的人，女的坐车，男的骑马；所有的人都要和王爷一样带孝。一路经过克布尔巴格、吉兰太巴格、苏木图巴格，走了十来天，才到达定远营近郊。沿途有三十六个巴格的边官和二十四 个寺庙的喇嘛，以及各巴格来的牧民群众和边卡人员夹道迎接，献的哈达有七千三百多条，迎接王爺的人数大致也是如此。有的牧民看到了自己年轻有为的王爺，内心里无比欢欣，有的人甚至一直跟随王爺到定远营。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农历六月初一日，定远营的人倾城出动来迎接达理札雅王爺，并向老王爺的灵棺焚香致祭。到了西关，将棺木放下，搁在八十四抬的大杠上，由八十四个一律穿着蓝长袍、头缠黑纱的扛夫，徐徐抬往城南面。走在灵棺前面的是全副执事及执拂的人。达理札雅在灵棺之后，后面依次是旗府文武官员、喇嘛活佛、和尚、以及各界代表。灵棺抬到定远营以东五里的亚亚庙安放，供人祭奠，过了七七四十九天，才运往贺兰山下老陵安葬。在这期间达理札雅及旗政府官员每日早晚都来跪拜祭祀，来往都穿白色孝衣。各寺庙的喇嘛都念经诵佛，拜坛行礼，全旗远近牧民都来祭奠，一时盛况空前。

在祭典期间，殡葬大礼亦积极准备。从外地

雇来的匠人，连明带夜赶做纸活（用纸糊做的人物、牲畜、车马、宫殿等），已经好几个月，连工带料花了三千银元。送殡那天，纸活从亚亚庙到老陵几里路摆的连续不断。王爷以下各级官员、全旗官民都来送殡，参加葬礼。一时路上熙熙攘攘络绎不绝，埋葬时哭声震天。此外，还给达的二弟媳在墓地树立了一块贞烈牌坊，以表彰她的“殉节。”这个葬礼持续进行了十几天，才算完事。

至于承袭王位大典，亦开始准备，计划和举办那达慕大会，同时举行。

### 第三节 王府生活

达理札雅和福晋从北京罗王府来到定远营王府，生活上也有一些变化。以往在罗王府，他们是单独住在一处院子里，生活来源主要依靠聚宝斋的商业收入。因为当时，还没有当上王爷，没有王爷俸禄，只能靠金允诚的精打细算，量入为出，由于她善于持家，倒也过的井井有条。如今承袭了王位，生活富裕多了，怎么过呢？金允诚以她自幼受的教育，依然是主张勤俭持家。她与达商议以后，尽力裁减王府内的仆役，比起在罗王府里的起居食用，简朴多了，这样以压缩王府内的开支，减轻人民的经济负担，便于休养生息。

他们住的是1945年建起来的房子，叫做新府，比起老府来是有所改进，但设计模式依旧是陈旧的。北靠花园的水池，院内除有花草、果木树外，还有汽车房。边门外是马厩，专门喂养马匹。王府内平时有四、五个老妈子和保姆，有二、三个使唤丫头。此外，有四个副官和五、六个卫士。在王府大院外，另有阿旗骑兵保安总队派的一个排的士兵担任保卫工作。

王府的饭食均由“包衣达”（官衙）负责。每天的饭菜由厨师头安排，由专雇的北京厨师制做。早点一般是四个菜和稀饭、奶茶、馒头。午餐有六个菜，米饭、馒头、蒸饺。晚饭也是六个菜，米饭、水饺、面条俱备。遇到节日或者喜庆的日子，就要摆宴席。达理札雅向来不动酒，金允诚晚年时候偶而饮点酒，也是为了应酬客人的。

阿拉善旗历来有个应差的制度，凡是住在定远营街上的本旗人，都有服差役的义务。清朝时期叫做“包衣人”（奴才的意思），到了民国改称为“戈什哈”（随从）。遇到结婚、过寿或招待外宾时，都要来王府当差，事完后，除了值班的外，都回自己的家。实际上“戈什哈”也是一种职务。一般情况下，官员要由“戈什哈”逐渐升迁。所以阿旗的旧军政人员，如协理、章京梅

林等，绝大部分都有当“戈什哈”的经历。

达理札雅的私生活很严肃，除了金允诚之外，再没有娶过第二个女人。这在当时王公贵族里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达理札雅为人忠厚，平易近人。金允诚也很少有贵族派头，一向在家深居简出，读书作画。除了至交亲友外，一般不肯会客。

他二人婚后共生了八个孩子——七女一男（男称阿哥，女称格格）。第三个女儿（欢格格）和第八个女儿（八格格）均夭折。现有五女一男。大女儿达倩芬，嫁与甘肃景泰县一条山盐商之子，黄埔高教班十一期学员张钦武。二女儿达芟芬嫁与甘肃卓尼藏族自治州州长杨复兴。以下子女的婚事都由自己选择。

王府规矩，历来福晋生下孩子都要雇用奶妈喂养，三岁后停奶喂饭食，另有别的人照养。金允诚对子女自幼管教很严，从吃穿到玩耍、读书都要规规矩矩，根本不能上街游玩，平时在家亦不准大声喧闹。当年在王府应差的人说，从来不见格格和阿哥随便要钱买东西吃，也不见他们花零钱。除了金允诚管理家务外，所有王府上下人的衣食住等生活，都由王府总管张仁负责。

#### 第四节 承袭大典

达理札雅承袭王位的庆祝大典，是民国二十



六年（1937年）农历七月二十一日举行的。

按照规定，一个王子继承王位后，即应举行承袭大典和那达慕大会，以便全旗人民来表示拥护和庆贺。塔王死后，达理札雅要守孝三年，按理承袭大典应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举行。但因当时全旗正为迎接班禅大师而作准备，没有顾上举行承袭大典。接着，日本人又来阿旗设立特务机关，进行侵略活动，阿旗局势很不安定。因此，一直拖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才举行。

承袭大典的会场设在定远营以东五六里处的老陵滩上。庆典场所用毡幕布置成一个元朝大汗游牧宫殿式样的能坐三百多人的蒙古包式大殿。大殿最上面向门口处，摆着一对盘龙宝座，是世袭亲王和福晋坐的。下面有一排排栽绒方垫座子，是协理、章京、梅林、参领、佐领、骁骑校、各寺活佛及大、二、三喇嘛的座位。

大毡殿前面有一个可坐几百人的花顶蓝布帐篷，是为亲王和福晋以及全体政府官员等观看那达慕大会节目时准备的看台。其后有一连三顶华丽的一开三室的蒙古包，亲王、福晋及家里的人就住在这里。它的周围用蓝布缝成的大布围圈

住，这就是临时的亲王府，一般人不准进入。

亲王府的布围东边，并排着五顶蒙古包，这就是印房（旗政府）。在这里对办理官员奖赏、晋升授顶戴等事项。通过庆典，达王把多年来供职的老官吏，都赏赐个功臣顶戴。布围西边，也有一排七、八顶蒙古包，住着王府的卫队。会场外五百米开外，是各巴格来的牧民的帐篷和蒙古包。

庆典这天，达理札雅穿着龙袍补服，戴着王爵服饰顶戴、三眼花翎，胸挂朝珠，端坐在宝座上；福晋也梳上阿旗蒙古头饰，珠翠叮当，戴着紫红顶戴，身穿蒙古长袍，坐在达理札雅右边的宝座上，接受大家的祝贺。当时国民党政府蒙藏委员会，也派遣大员前来祝贺。北平、宁夏等地均派有代表参加。冠盖云集，车水马龙，极一时之盛。

庆贺之前，先由侍者用金碗端奶茶及桌上摆着的几样精制点心请达王、福晋食用，用茶毕，斟用马奶酒。然后奏乐、唱歌、典礼开始。先由协理和章京献哈达和礼品，接着，梅林、佐领、参领、骁骑校等政府官员、离职老官员、全旗八个苏木、三十六个巴格及二十四個庙的活佛，大、二、三喇嘛，座床喇嘛，科白尔清真寺阿訇献哈达和礼品，最后由各巴格的牧民献哈达和礼品。

礼品有元宝、银元、绸缎、牲畜等。这次献的礼品共有元宝八十多个；银元三千多元；骆驼一百三十多峰；马五十多匹；绸缎一百多件；哈达一万多条。

庆典后举行了三天的那达慕大会，进行了赛马、摔跤、射箭比赛。白天比赛后，到了晚间，四处的帐篷和蒙古包里的奶茶奶酒飘出了醇香，传出了悠扬动听的欢乐歌声。人们一面饮着马奶酒、羊奶酒、骆驼奶酒，一面纵声高唱阿拉善民歌：《阿尔本查汗布音》、《温乌尔根阿拉夏》、《桥格齐拉格省布音》、《乌拉木金布音》、《夏兴陶尔》、《艾尔德尼曹格图宋布尔乌拉》、《那达慕德格都》、《沟庆号依尔夏斯特尔》、《乃门萨尔那尔》等阿拉善蒙古传统歌曲。歌声此起彼伏，一直唱到深夜。一万一千多观看那达慕大会的人们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

大会结束时，达理札雅和协理、章京们骑着马来到牧民们前面，向大家点头致意。牧民们都两手合十表示谢意。在这次承袭大典上，还给多年为封建王公制度效劳的人，晋升了顶戴，对一些反对封建制度的人予以赦免，信任使用。达王这样恩德广施，争得全旗人民的信任，增进了团结，提高了达理札雅在牧民中的声誉和威望。

这次大会共花费了一万多块现洋，另外，还为参加人准备饭食用去羊五百多只，牛一百多头。大会进行了四天才结束。

### 第三章 执政以后

#### 第一节 革新政治制度

达王执政前，蒙旗的政治制度一直是沿用清朝时代的王公制度。从定名阿拉善霍硕特旗起，是直属清廷理藩院，作为不属于盟辖的特别旗。全旗共编为八个苏木。旗的政治制度：王爷（亲王）之下，置正副协理各一人，记名协理一人，正副管旗章京各一人，正副梅林各一人，正副参领各二人，佐领八人，骁骑校八人，“牌特尼达”一人，四等“牌特尼哈旺”一人，五等“牌特尼哈旺”一人，共计三十人。民国成立后，基本上还是承袭旧制，不过将旗的归属由理藩院改为蒙藏院。国民党统治时期，国民政府将蒙藏院改为蒙藏委员会，仍管辖几个特别旗，除按旧制只任命一个札萨克执掌旗政外，对旗内具体军政事务则不予过问，蒙旗享有一定的自主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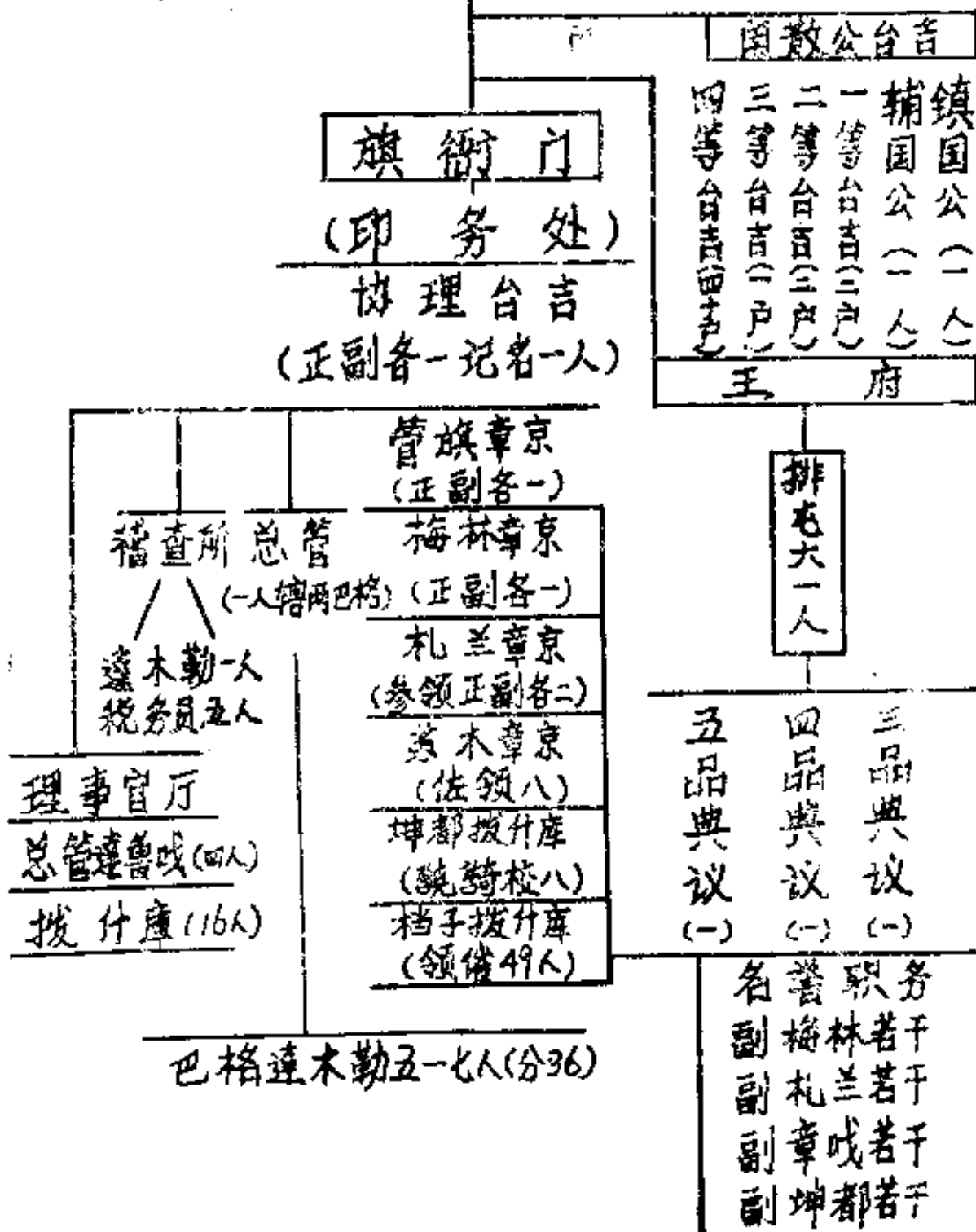
达理札雅从北京回旗后，很想把旗政整顿一番。他同旗府官员商议后，在民国二十五年

(1936年)派当时的管旗章京陈·爱尔德尼巴图到南京请示,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一月二十二日第七号训令批准废除“阿拉善霍硕特印房(即政务处)”,改发“阿拉善霍硕特旗印”,对旗政府的组织机构也作了指示。阿旗遂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三月六日正式成立了“阿拉善霍硕特旗政府。”札萨克以下设协理、章京,再下设政务、秘书、教育、财政四个处。处设主任。另将旧有的听差处(也叫堆子),改为理事官厅,管理司法工作。此外,还在定远营地区设立了稽查局,用以处理各族居民和商人的纠纷事宜,并办理警务和地方税收工作。对旗以下的三十六个巴格(相当于乡),也作了整顿,以加强牧区地方行政事务。又在与边界发生纠纷较多的磴口、四坝、宗别立、奴尔盖等地设立了四个总管公署,处理汉民与过往商旅事宜。同时,“王爷”改叫“札萨克”,旗政府升起青天白日旗,政府内悬挂孙中山像。

这是达理札雅从北京回旗后的首次对政治机构的改革。但考虑到蒙族官员和蒙民对旧政府制度的习惯和留恋情绪,一方面允许蒙族官员依旧自愿使用清朝的顶戴袍服。对牧区行文传达政令仍然使用旧的政务处(印房)的印信,一方面对

### 清時阿拉善碩特旗組織情況

札薩克(和碩親王)



外则以新的政府和札萨克名义行文。实际上这是保留着两种制度，一直沿袭到解放为止。这是因为几百年的习惯，不可能一下子彻底改变，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权宜措施而已。

## 第二节 遴选新的政府官员

达理札雅执政以后，塔王时期一批旧的政府官员要求引退告老还家，当经批准，并给予“额尔克滕”（有功之臣）称号。接着选定达穆林旺楚克为正协理，罗·恩凯巴图为副协理，罗·巴图孟柯为记名协理。图布吉尔格勒为管旗章京，陈·爱尔德尼巴图、吉仁太为副章京。任命陈·那笋巴图、胡·爱立佐巴依尔、马万康、宗布尔、李·巧格登、左·甲木英、金·对岱、罗锐林、罗月亭、俞世珍、谢尚德等人为旗政府各处正副主任。任命张仁为理事官厅总管，张元忻、李树德为稽查局正副局长。王·宝勒都为磴口总管，敖其尔为四坝总管，司乔英为努尔盖总管。聘用文化高、有行政经验的汉人，如，于来堂等担任旗政府的秘书长或秘书职务，负责对外联系、交涉和公文往返事宜。各巴格也都选用正直能干的人担任巴格“达木尔”（巴格长）和“保什哈”（副达木尔）。

由于正协理达穆林旺楚克在抗日战争时期一直住在北京，正协理职务由副协理罗·恩凯巴图

代行。1933年，为了工作需要，将罗·巴图孟柯晋升为副协理。这样，旗政府有了两个副协理，称为大协理、小协理。大协理代行正协理职权；小协理代行副协理职权。一九四八年春，达穆林旺楚克由北平返回阿旗，因已选为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按规定不能兼任地方职务，遂辞去正协理职务。以后，罗·恩凯巴图引退。正协理由罗·巴图孟柯担任，罗瑞光为副协理，罗永寿为记名协理。与此同时，达理札雅发布命令，将罗·恩凯巴图和罗·巴图孟柯二人均升为一品红顶戴，并均授予正协理的名誉称号。

一九三五年以后，管旗章京改为陈·爱尔德尼巴图担任。段·巴图尔、白·图布巴依尔（诚禧）为副章京。

旗政府人员的更新，使政府组织更加健全，人员充实，从而提高了工作效率。

### 第三节 改建武装力量

阿拉善旗的武装力量，是从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开始建立的。当时已有七个苏木（连）的兵力，每个苏木大约是一百五十人。乾隆时期，明令建立阿拉善霍硕特旗亲王亲兵马队（清君马队），编制是八个苏木（连）的兵力，两千人左右。当时除在定远营设总兵马营之外，大部分兵力分布在全旗的四十三個边卡上。它的



一项重要任务是保卫旗政府和王府。同治二年（1863年）曾在定远营周围建立五座营盘。即：后山头上两座（以后又增建一座），察库尔山头一座，南梁山两座。这时的马队没有统一服装，平时穿着便衣，会操时在外面套上一件红色或黄色的坎肩，用白色布镶个边。前面写有“阿拉善旗亲兵马队”，背面写着“卫士”两字，头上包一块黑色手帕。武器多是土枪、土炮和大刀。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达理札雅回旗后，将原来的“亲兵马队”改编为阿拉善旗卫队。以后又改为阿拉善旗保安大队，穿灰色军服，戴青天白日帽徽的大沿帽，兵士发给“三八式”步枪，军费开支旗里自备。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日本人在阿旗定远营设立特务机关，筹建空军基地，达理札雅向国民党中央汇报了这一情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派关麟徵率二十五师撵走了日本人。拨给步枪五百支，轻机枪四挺，迫击炮两门。并报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成立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下辖保安总队。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春筹建成立，达理札雅任中将司令，罗·恩凯巴图任上校总队长。司令部设司令办公室、参谋、军法、副官、军需四处。总队部设参谋、副官、

文书等股；部队编制八个大队，每大队辖三个中队，共二十四个中队。每中队辖三个分队，共有七十二个分队。人员总编制一千二百名，军饷开支亦旗里自行解决。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张学良又给补充了一批枪支弹药。武器更新之后，正在训练军官，编制扩建旗保安队之时，由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侵犯阿旗，旗区防司令部和保安总队被缴械，定远营的保安队已名存实亡。但广大牧区民兵依然存在。一直到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九月一日，经国民政府国防部批准，才恢复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重新建立骑兵保安总队。

抗日战争胜利后，阿拉善旗原在全旗边界，主要路口设有边卡四十三处，各卡派有正、副卡长一名，巡兵数十名，用以防守边界、保护牧场、盘查行人、防范盗贼。对这些防卡也进行了整顿，裁汰老弱，任用受过军训的年轻能干的人担任卡长，加强了边防。

阿拉善旗的兵役制度，从清朝到民国，历来沿用寓兵于民的政策，凡旗内蒙族男子年满十八岁，都有服兵役和其它差役的义务，经常保持三千至五千人的员额，总动员时，兵力可达八千人。平时大部分人在家放牧或打猎，只有少数士兵在旗政府执行保卫任务和维持地方治安，四个

月轮换一次。如有重大事故，需用兵力时，一声令下，就可以全旗动员，凡是青壮年都自带枪马集中待命。这种全民皆兵的义务兵役制度，有着机动灵活的优势，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清朝曾多次利用阿拉善旗骑兵平定反清叛乱，都取得了胜利，其原因正在于此。

#### 第四节 革除陈规陋习

达理札雅在改革旗政府和武装力量之后，又立即下令废除陈规陋习。如：（1）废除封建的跪拜大礼，在上下老幼之间以及社会交往中，一律实行鞠躬礼，并且首先在政府官员中实行。（2）废除奴隶制，裁减王府内伏役，压缩王府内开支，以减轻财政负担。（3）废除“乌拉”（在牧民中派差）制，旗内的公文传递、公物运送等所需用的骑乘、运输驼只以及用费等，均由公家负担。以减轻牧民与商户、作坊的负担。（4）一切公职人员的待遇，仍沿用旧的义务轮换制，上班期间由旗政府财政处发给口粮、砖茶等生活用品，其它自理，以避免增大财政支出。（5）发布禁烟、禁赌、禁娼等禁令。严惩盗匪及一切奸宄宵小的不法行为，使全旗各族人民安居乐业。

达理札雅当政后，深感自己文化低，处理工作方面有困难，除了事事向福晋金允诚请教外，

还不惜重金聘请蒙、汉老师，每天公余之暇，一般在下午的三、四点钟，或者利用晚上空闲的时间，练习文化课和读书写字，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 第五节 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

民国十六年（1927年），发生的震撼阿旗的“小三爷事件”，在达理札雅尚未回阿旗执政之前已基本平息。首要人物德毅臣（德钦一心诺尔布）被获，经阿旗当时的旗政府官员审讯后，被流放到巴丹吉林大沙漠的察干高勒庙，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病饥而死。其它主要人物孟雄逃亡在外，杳无音信。田协安亦漂泊外地，尚未回旗（解放后方回）。曾任二旅旅长的敖其尔和变节投降的罗敖有，当时亦被枪杀。至此，政变的主要人物，跑的跑，死的死，已基本处理完毕，只余德毅臣的长子罗景瑞与其父一同被捕后尚未处理，罗景瑞只是个十四岁的孩子，实际并未参与政变之事。然而达理札雅回旗后，在一部分人的坚持下，派亲卓尔格将其枪杀于拐子湖。

在平息小三爷事件中立有战功的毛·巴特力和范·布尔格德二人，因与旗衙门的协理罗·巴音都伦一派有隙，彼此互相捆绑扣押，此际毛和范已被罗·巴音都伦等逮捕，毛被押往宗别立巴

格砚迪尔图防卡服劳役，范交予北寺服劳役，以后范逃跑，三年后回来，又被罗判处在吉兰太盐池服劳役半年。

达理札雅回旗执政后，命罗·巴音都伦（巴哈乃）把毛·巴特尔带来一见，罗怕达王知道事情真相，与己不利，便事先派人杀了毛·巴特尔，诡称“毛·巴特尔逃跑，追赶的人放枪误伤致死。”达也未再深究，这是阿旗历史上一大冤案。其后，达理札雅有所察觉，深自愧悔。所以在处理范·布尔格德问题时，就比较宽大，仅服劳役半年，没有追究责任，事后又加官晋爵，给了红顶戴，并一直对范家十分关心照顾。

至此，“小三爷事件”以及以后的南寺格根事件的遗留问题，大体上告了一个段落。

另一问题，即三盛公教堂案，亦进行了处理。

1900年春，义和团起义军运动风靡全国。阿旗兵马总管阿木尔吉尔嘎勒（安九大人）起而响应，在二十四顷地捉获比（比利时）国神甫韩默理，送到绥远托城（今托县），后被烧死。

1901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三盛公教堂提出赔款要求，经清政府决定，由阿旗赔款五万两银子，当时，先交了一万三千两。其余因无现款，商定以十一处（包括补隆淖尔、渡口堂、东堂、

天兴泉、三盛公、圣母堂、兴盛洋等处)总面积六十六顷土地顶偿, 订立了合约, 以六十年为期, 在六十年内, 地无租, 银无息。这些年来的土地收益全被教堂夺去。

达理札雅执政后, 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对此案进行了清理, 通知教堂派人前来重新订立合同。三盛公教堂派了包德恩神甫来旗政府商谈。包德恩提出: “以前的问题完全不谈。教堂现有耕地五万亩, 再请求阿旗王爷宽限数年。”阿旗原拟重新订立合同, 但当时因磴口隶属问题正与宁夏方面在国民党中央打官司。为争取援助力量, 经同意暂缓收地, 以后因抗日战争爆发及与马鸿逵的斗争更趋尖锐, 遂予搁置, 到了抗战胜利后, 方彻底解决。

## 第六节 七世班禅到阿拉善旗

### (一) 喇嘛教流传到阿拉善旗

喇嘛教是在我国西藏地方传播的一种佛教, 有红教和黄教两派。黄教在元朝时(1280—1368)传入蒙古族统治上层, 以后逐渐在蒙古族人民中传播。明崇祯十五年(1643年), 霍硕特部首领顾实汗在西藏扶持黄教派, 两年后(1644年)明亡, 顾实汗引导达赖喇嘛归顺清朝。康熙五十六年(1697年), 黄教已成为阿拉善旗蒙古族信仰的宗教。到乾隆年间, 全旗的喇嘛曾达到三

千多名，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信奉喇嘛教。寺庙发展到八大寺，以后又发展到二十四个大小庙宇。八大寺是：延福寺、广宗寺（南寺）、福因寺（北寺）、昭化寺、承庆寺、宗庆寺、旺听寺、妙华寺。大寺庙下有小寺庙。如，延福寺下属有沙尔札庙、额尔布海庙、吉兰太庙、宗乃庙、树桂庙、巴尔达胡庙和阿贵庙共七个庙。大寺庙（称主庙）与小寺庙（称属庙）的关系有组织上和经济上的关系两种。组织上表现为隶属关系，即各属庙的负责喇嘛得主庙委派。经济上是遇事共同摊派钱财。

## （二）向第七世班禅额尔德尼发出邀请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各寺庙的喇嘛、活佛和许多民族上层，向达理札雅申请，派人邀请第七世班禅额尔德尼西陲宣化大师来阿旗诵经。达理札雅允准，决定由南寺大喇嘛巴拉登，北寺、延福寺的喇嘛代表，连同旗政府派的陶·米希格尔勒一同到百灵庙去邀请。他们春季到了百灵庙，向班禅大师献了哈达，并代表达王爷和喇嘛教徒恳求班禅大师到阿拉善旗诵经，当经班禅行辕堪布厅全体堪布同意，决定待秋后在伊克昭盟鄂托克旗西尼乌素召，再定去阿旗的日期。代表们回来时带回班禅给达理札雅的信件和礼物。

### (三) 筹备迎接班禅大师

达理札雅接信后，即由旗政府全力进行准备，首先是准备会费，由旗财政拨出五万元现洋，另向牧民每人摊派一元，又献款两万八千元，争取达到十万大洋。

其次是住房安排。此次班禅大师的随员和卫队有五百多人，另有汽车三十二辆。最应注意的是对堪布的住房安排，一个堪布只能安排一个独家小院。旗里须派一个勤杂人员和看门人。班禅大师下榻的房屋更要按宗教的规程部署。屋顶全部用金黄色琉璃瓦顶，远望金光闪闪，房厅内的墙壁全用绣花的大花帐挂满，地上铺满二龙戏珠的大地毯，人到里面要有到了神殿般的感觉。一般喇嘛教徒不能到大师的住处，如王爷和旗里的协理、章京要见大师，也须与堪布厅事先联系安排。堪布厅内要铺有数十条厚厚的栽绒坐垫，中间放条桌子，堪布们一面喝酥油奶茶，一面谈论问题。所有堪布厅的布置一定要华丽整洁。此外，还有卫队的营房和汽车停放的大院，还要有储藏金银财宝的非常保险的房屋。由于上述需要，阿旗政府腾出了五百七十间房屋，定远营城内的大仓房、庙里的“吉萨”房，以及喇嘛住家，全都安排为班禅随员的接待房所了。

其三是准备食物，共向牧区各巴格摊派了一



千多只肉羊和一百多头肉牛。从宁夏农村买回大米五十多石和白面三万多斤。燃料方面，由各巴格摊派骆驼驮运煤炭五百余担。

这些准备情况经过班禅堪布厅派来的官员检验之后，方回伊盟鄂托克旗西尼乌素召向班禅大师报告。

#### （四）班禅大师在定远营

一切准备工作安排就绪之后，达理札雅又派陶·米希格尔勒和各寺庙喇嘛代表到伊盟鄂托克旗西尼乌素召向班禅大师敬献哈达，邀请驾临阿拉善旗。班禅堪布厅决定班禅大师将在阿旗过旧历年。于是，阿旗又作了一番准备，通知各大庙喇嘛仪仗队于腊月二十日在定远营集中。旗府官员亦不得下班回家，全旗上层喇嘛活佛都作好准备，隆重欢迎西陲宣化大师班禅的到来。

1934年腊月二十三日，班禅及随员到达阿旗长城三关。阿旗的协理、章京和八大寺的负责喇嘛立即坐汽车到三关防卡迎迓。达理札雅率领旗府其他官员到城外十里地方献哈达。班禅下了汽车与达理札雅头碰头，表示宗教礼节。班禅又向达理札雅回敬了哈达。然后，达理札雅的汽车，引着班禅大师的汽车向部队和喇嘛仪仗队及群众排成长达五里路的欢迎人群中走过。定远营全城住户及班禅下榻之处，都悬灯结彩，延福寺

的喇嘛通宵吹奏乐器。全城沉浸在肃穆的宗教气氛及欢乐之中。

班禅大师在定远营期间，向喇嘛教徒们诵经念佛达三个月之久，收到信徒们献的哈达、元宝和金银等不可胜数。班禅离开时，阿旗将班禅的行李送往青海塔尔寺时，派了六百多峰骆驼驮运，并将其它金银元宝等装上汽车运往西藏。据统计，这次收的哈达就有三万多条，向班禅磕头的喇嘛教徒和外地来的佛教徒即有三万余人次。

班禅大师在阿旗期间，还向国民党蒙藏委员会谈到阿旗的情况。蒙藏委员会派了一位姓罗的专员来阿旗同达理札雅商议阿旗的隶属问题，罗专员回京后，由蒙藏委员会报请国民政府，批准阿拉善旗为特别旗，直属行政院和蒙藏委员会，并发给“阿拉善霍硕特旗印”新的印章。

#### （五）班禅大师到阿拉善旗的影响

七世班禅额尔德尼在阿拉善旗住了三个多月，于1935年农历三月底离开定远营。达理札雅一直送到宁夏。班禅给达理札雅送了一辆福特牌小轿车，以示感谢。

达理札雅这次迎接班禅到阿旗，取得了重大的多方面的收获。

首先是，班禅大师给了达理札雅政治上的支

持，由于班禅的关系，使达理札雅与国民党中央的关系，特别是与蒙藏委员会的关系更加密切，以后的事情更能顺利进行。

其次是，达理札雅邀请班禅大师到阿旗诵经，深得喇嘛、教徒的信任和拥护，提高了达理札雅在群众中的威信。

第三是，通过班禅大师在宗教中的宣教，扩大了达理札雅在蒙藏宗教界的影响，使青海塔尔寺著名阿嘉大活佛等对达理札雅有了特殊的印象。因而在1939年，达理札雅在兰州被软禁期间，有青海塔尔寺的许多活佛和甘南拉布楞寺的大庙主事活佛等，都到兰州向朱绍良长官为达理札雅请愿求情。

以上说明，这次邀请班禅到阿旗，是达理札雅继上次承袭大典后又一次政治上的大成功。

## 第四章 同日本人周旋

### 第一节 与张学良旧友重逢

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东北三省陷入敌手。国民党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电令张学良率部撤退关内。张学良到北平，达理札雅适亦在北平，见面之后，悲喜交集。悲的是东北沦陷，大好河山易人；喜的是旧友重逢，正好盘桓叙谊。于是两

人经常聚会，互相慰勉。翌年，达理札雅离平回旗，承袭王位。张学良亦于不久调到西北。东北军到达西北时，达理札雅闻知东北军缺乏食盐，于是将阿旗出产的吉兰太食盐数千担供给东北军军用，并通知张学良派人从一条山盐场运走。张学良亦补助阿旗保安队枪支弹药若干。此后，两人还时常鱼雁往还，互诉衷怀。一次，达理札雅遣人给张学良送去食品数种。张学良收到后，甚为感激，乃于1935年农历九月四日，趁飞往银川视察之际，专程飞到阿旗定远营，意欲下机与达理札雅联欢，但当飞机到达定远营上空，环绕数圈，发现无可降落之处，不得已遂从空中投下一沙袋，内装致达理札雅书信一封。信中说：

“锐荪亲王勋鉴违阔积时弥殷翘企适展惠书就维勋猷式换履祉增绥为颂无量伏来承赐珍味多品甘芳滑润观我朵颐拜示敬登感激无似良忝膺艰重时凜冰渊远荷饰序并深愧慚端泐布谢祇颂勋绥张学良启四日”（现此信仍存阿左旗档案馆）。

不久，发生“双十二事变”，张学良与杨虎城兵谏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蒋介石应允。但在返回南京时，心怀鬼胎，向张提出以盟兄弟之请，陪送他到南京，能让他在情面上过得去。张学良是重义气之人，答应亲自送他，便和蒋同

行，迨飞抵南京后，即将张学良扣留软禁，迄今未释。从此天各一方，无法晤面。达理札雅每一言及，辄黯然神伤，叹息不止，可见二人交谊之深。

## 第二节 以物资支持抗战

达理札雅从北平回来的第二年，福晋要生第四个孩子，同时，三弟达穆林旺楚克也要结婚，达理札雅陪同母亲和福晋一同回到了北平。这时华北局势已趋混乱不安，汉奸和日本浪人在北平到处寻衅闹事，达理札雅不敢多事逗留，在三弟办完婚事，福晋分娩后，便又带着金允诚和子女们回到阿拉善旗。他三弟和母亲依然留在北平。时隔不久，日本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达理札雅又回了一次北平，为其母太福晋祝寿，并想把其母亲接回旗内，以避开北平那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战争气氛。无奈太福晋和达穆林旺楚克执意不肯离开北平，达理札雅只好只身回来。从此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地发动起来，魔爪逐渐伸到绥远，继之西进到河套地区，开始逼近宁夏和阿拉善旗的边沿地带。

为了支援抗日战争，达理札雅回旗后便增加了阿旗境内的食盐开采，运往河套、包头及中卫、一条山一带销售，以供应军需民食，打破

日本侵略者的食盐禁售政策。接着又给阎锡山赠送吉兰太盐千担以上，由磴口装船运往包头转运他的军队驻地。

1938年，又捐献给宁夏马家军队三千担盐。

1940年冬，给胡宗南部队支援军马二百匹。

1942年春，给傅作义支援运输骆驼一千峰及驮鞍等运输工具俱全。

宁夏马鸿宾的八十一师于1939年冬开往河套抗击日本侵略军，阿拉善旗又捐献军马五十匹、骆驼一百峰。

由于在抗战时期作了以上贡献，抗战胜利后由国民政府颁给达理札雅一枚抗日胜利青天白日乙级勋章。

### 第三节 与“蒙政会”的关系

1934年四月二十三日（一说二月二十八日），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在百灵庙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电请达理札雅莅临参加。达理札雅乃召集旗政府的新旧章京、协理、参领、佐领、南寺活佛等在一起商讨对策。老章京图布吉尔格勒、杨·尼木资尔、吉仁太等坚决反对参加，说：“我们阿拉善旗是亲王特别旗，非内蒙四十九旗所能比拟。

今天那些郡王们出来给我们当上司，我们不能接受。”大多数人的意见也是我们阿拉善旗不能受“蒙政会”的管辖，不能去参加。于是只以达理札雅个人名义写了一封贺信寄去，没有派代表参加。一直到“蒙政会”成立一年，才派参领陶·米西格尔勒、佐领陈·那笋巴图去百灵庙参加例行大会。

“蒙政会”成立后，德王便与日本关东军拉扯到一起，互相利用。德王为了尽快当上“蒙古国”皇帝，在日本人的支持下，于1936年2月12日竖起了红黄白三色条旗，改用成吉思汗年号纪年，成立了“蒙古军总司令部”，走上了公开叛国投日的罪恶道路。日本人利用“蒙政会”开辟新绥公路。从百灵庙出发，沿外蒙边境，经阿拉善旗、额济纳旗到新疆的运输路线很快被打开了。

德穆楚克栋鲁普为讨好达理札雅，于1934年秋，由“蒙政会”通知阿拉善旗，分给一部电台和“七九”步枪一百支。阿旗对此甚感兴趣，即派副章京吉仁太、参领宋布尔嘎嘎等人，带着骆驼前往百灵庙接运，于1934年十一月底运到定远营。随电台派来台长王枕华、报务主任徐厚田和报务员杨秀英等。从此阿拉善旗变成德王和日本人的侵略对象，魔爪也伸进了定远营。

#### 第四节 日本特务在阿旗的活动

1935年12月，德穆楚克栋鲁普到“伪满洲国”新京（长春），会见“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和参谋长西尾，继而同“关东军”参谋副长坂垣征四郎、参谋田中隆吉等会谈，决定：

“日本帮助德王在内蒙古西部地区盟旗先搞一个独立局面，然后再建立独立的蒙古国”（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根据这个决定，日本关东军派出驻阿拉善旗特务机关。当年冬，便秘密派田中久信以皮毛洋行商人的身份来到阿旗，住定远营大商号祥泰隆，往来于银川和定远营之间。宁夏和阿旗都知道他是特务，并报告国民党中央，得到的复电是“注意日本人的活动”，别无其它明确指示。1936年春天，田中久信突然返回包头。过了两个月，于1936年农历三月二十几日，他从百灵庙带着二十多个日本人，驮着一部无线电台和食品，经草地来到定远营，直接到祥泰隆商号把电台架起来，与日本“关东军”总部联系。

德王的“蒙政会”还派了一名翻译官达喜端地布跟随日本特务们工作。他先到旗政府说：

“我们是‘关东军’总部派来进行资源开发的，我们的官长恒田六郎、滕银宝要拜见阿拉善亲王。”当时接见的是旗府管印官爱尔登达赖，他



答复说：“王爷近来身体欠安，改天再见吧。”把他们打发走了。

随即，达理札雅召集他的主要官员和师爷于长东、蒙藏委员会派驻阿旗调查专员陈永治、电台台长王枕华等商议对付日本人的办法。决定（1）请陈永治调查专员向中央写个报告，请中央急速派军来旗驱逐日本特务机关。（2）派章京陈·爱尔德尼巴图到宁夏向马鸿逵主席报告。（3）分别给蒙藏委员会、国民政府、兰州朱绍良、绥远傅作义打电报，请派兵驱逐日本特务。（4）确定以后日本人再来时，先说一声“谢谢诸位的拜访。”再说：“你们在草地路上辛苦了。”“阿拉善旗的事情，应由中央来决定。‘蒙政会’与阿旗没有隶属关系，我们不接受‘蒙政会’的指挥。”（5）指定阿旗稽查局派便衣人员监视日本人的活动。（6）派旗政府老梅林官爱尔登达赖专负接待日本人的责任。（7）接见特务机关人员时，要由旗府官员集体接见，并由王枕华出面讲话。调查专员陈永治以旗政府秘书名义出面。

第一次到王府拜见达理札雅的日本人有恒田六郎、田中久信、滕银宝等。接见时，他们穿着太和服，向达理札雅深深鞠躬，向其他官员略许点头。接着他们自己介绍自己的名字，但没有提

官衔职务。阿旗方面由王枕华分别介绍了王爷、协理、章京等人的姓名。达理札雅就按事先商议好的言辞向日本人表示谢意和问候。然后，恒田六郎说：“奉‘关东军’总部的旨意，来贵旗帮助开发资源，请求贵王指教。”达理札雅说：“阿拉善旗隶属中央政府。大小事情须请示中央后答复。”三言两语，会见结束。日本人从此在阿旗继续干起他们的特务活动来。

#### 第五节 与坂垣征四郎的会见

1936年农历四月十七日上午十时许，突然有一架淡黄色有日本国旗标志的飞机出现在定远营上空，盘旋许久降落在老陵滩上。日本特务机关派人通知爱尔登达赖说：“‘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来了，要会见亲王达理札雅。”达理札雅和旗政府官员接见后，日本特务机关头头恒田六郎介绍坂垣参谋长等来的五个人。王枕华也把旗府官员作了介绍。坂垣说：“我是例行游历，顺便拜访亲王阁下。”达理札雅表示谢意，并问：“今天从哪里起飞的？”翻译说：

“从东北佳木斯起飞。”达理札雅说：“还是飞机快，阿拉善旗整个是沙漠戈壁，没有什么美好的风景可供游览。”寒暄之后，坂垣向达理札雅提出以下几点要求：（1）经济援助，开发资源；（2）武装蒙旗部队，装备由“关东军”总

部支援；（3）邀请达王和福晋在适当时候到“满洲国”访问，日本方面派飞机负责接送；（4）在阿旗建立战略空军设施，由阿旗派蒙古兵把守；（5）日本在阿旗的特务机关的安全，由阿旗负责维护，不受任何袭扰。达理札雅听了坂垣提出的要求后，未作正面答复，只说：“我旗是隶属中央的特别旗，大小事情须请示中央以后再作答复。”坂垣等看到达理札雅表情不太热情，也不愿多说话，又没有挽留他们吃饭，就出门上飞机走了。

当天，达理札雅就把坂垣来阿旗以及会见的情况，向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宁夏马鸿逵主席作了汇报，并且呼吁中央速派军队保卫阿旗这块国土。

#### 第六节 日本人在阿旗修飞机场

坂垣走后，几乎天天有一两架日本飞机来阿拉善和额济纳旗，卸下汽油和军用物资又飞回东北。在阿旗的日本人增加到了二十多人，有蒙汉翻译官、建筑工程技术人员等。从六月开始，便雇工在定远营西面五里地修建双山子飞机场，每天来的飞机也多了起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闻知后，派来了侦察人员对飞机场观察后，认为不是一般民用机场，而完全是供军事用的。从这个机场起飞的飞机，在

二十分钟内，可以完全轰炸银川以及宁夏境内的所有目标。在一小时之内可以轰炸兰州和青海的军事目标。意识到是相当严重的一件事。

### 第七节 陈诚来宁夏

日本人在阿旗修建军用机场一事，引起国民政府的重视和关切。不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陈诚乘飞机来到宁夏秘密召集马鸿逵、马鸿宾、达理札雅等开会，就日本特务和飞机在阿旗活动问题，作出决定：中央派兵驱逐阿旗日本特务机关；宁夏派兵驱逐额旗的日本特务机关。

陈诚这次是初次见到达理札雅。他对达理札雅的明朗态度颇为赞赏，认为他是个爱国的王爷，同德王卖国求荣迥然不同。因而决定积极支持达理札雅在阿旗建立地方武装，成立阿旗区防司令部，把旧的地方兵卡改编为保安队，以增强抗御日本侵略的武力。他回南京不久，便任命达理札雅为阿旗区防司令部中将司令。司令部下设保安总队部，辖八个大队，相当于骑兵师的编制。

陈诚考虑到如果日本增派部队到阿旗，阿旗抵御不了，便打算订立个向南转移的计划，由阿旗政府派劳登喇嘛在头道湖、二道湖、三道湖各庙安排仓房，以备万一。此计划因以后日本特务被驱逐而未施行。

## 第八节 关麟征率兵驱逐日特

1936年9月20日左右，以师长关麟征、副师长杜聿明率领的中央军二十五师开进阿旗定远营一带。迅即包围了日本飞机场，架起高射机枪，限令日本特务机关撤走。日本人怕得要命，跑来找达理札雅，请予转告关师长，他们保证在三天内全部撤离，关师长同意了。日本来不及拿东西，只把人运走了。把汽油、无线电器材全部丢下。十月一日那天，清理了日本特务在定远营的全部设施，破坏了他们修的飞机场。对与日本人交往的人，也流放到沙漠戈壁中去，以清除日本人造成的影响。关麟征在阿旗还举行了军事演习，邀请各族各界人士参观，以壮军威、国威，提高人们的民族自尊心。

关麟征听了达理札雅关于日本人到阿旗的活动情况，以及他对日本人的应付态度，肯定了达王是一个爱国的王爷。立即从部队中抽出步枪150支、机枪4挺、迫击炮两门、子弹一万发，拨给阿旗保安队。并且答应再向南京军事委员会要求发步枪500支，装备阿旗保安队。

这年12月，发生“双十二事变”，关麟征所率二十五师星夜开往西安赴援。日本特务经过这次打击，以后再没敢到阿旗来。

## 第五章 与马鸿逵抗争

### 第一节 冲突的由来

日本人走后不久，达理札雅就遇上了与宁夏省主席马鸿逵的矛盾。可以说这是达理札雅一生中最为棘手的问题。达理札雅素以继承祖业，保境安民为己志，而马鸿逵则对阿旗土地和财富垂涎欲滴，必欲得之而甘心。于是便生出这场矛盾和冲突，先是政治上的侵略与反侵略，继之是经济上的掠夺与反掠夺，终至兵戎相见，酿成战端。按说，两人的父辈，即塔王与马福祥，本是结义兄弟契若金兰，而达理札雅又是马鸿逵母亲的干儿子，若按旧的伦理道德来说，两代人的情谊，本应和睦相处，勿生事端，谁知反目成仇，互相争斗，竟达十年之久。其故安在？根源在于：

#### （一）根源在于磴口设县

磴口这个地方，原是黄河水运道上的一个码头。元、明、清以来，是杭锦旗的牧场。清康熙元年，开放为长城内外物资交流的一个点，内地农民经水路来此卖农副产品，而草原牧民则到此卖牲畜、皮毛和盐碱。大家把这个地方叫“海流其”。康熙三十六年，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拉塔呼设阿旗建制时，将这块沿河草地连同当地牧民全

部划归阿拉善霍硕特旗为该旗的属地和草场。嘉庆二十三年，划为阿旗的三十六巴格之一，并定为亲兵马队的牧场，派了一千名蒙古骑兵疏浚了乌拉高勒（即乌拉河子），大量放水灌溉种草放牧。

以后，根据河弯形势，将磴口以下的扣克套海（傅家弯子）、阿木吉林套海（云付井弯）、巴音套海（坝楞弯）、沙金套海（公地弯）等地划成四个巴格、两个总管公署，专管农牧业生产。

磴口地区的开垦历史也很悠久。从阿旗第二代王爷阿宝于康熙四十八年承袭王位后，即开始开垦七百三十顷地，至第四代王爷玛哈巴拉亲王于嘉庆九年袭爵，前后共开垦一千一百八十顷地。嗣被清政府发现，下谕禁止开垦。由此可见，从清康熙三十六年以来，磴口是阿旗的地方就更加肯定无疑了。

到了民国十五年（1926年），冯玉祥兵败退据西北一带，曾在磴口建立过兵站，并派于来堂和吴某等筹建县治，迄无成就。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马鸿逵统治宁夏以后，又派李振国等筹建磴口县。因此，阿旗状告到国民政府和蒙藏委员会，据理力争，并请求派员调查处理。以后派来了唐柯三委员，在宁夏和阿旗之间

斡旋了几个月，提出了八条磴口事件解决办法：  
1，保障磴口等处土地主权均为阿旗所有；2，磴口设县治一案暂作悬案呈报中央，于相当时期撤出本旗境外；3，遇有关于地方特殊事件，须商征阿旗同意，广庆源县府办事处即行撤销；4，磴口县各区区长须由人民公选，不由省旗两方委派；5，磴口县境内除旧有正捐外，其他一切苛捐杂税一概不得征收，并不得增加任何名目；6，宁夏省在阿旗境内土克木大水沟道卜鲁等处所设税局，暂仍其旧，以二年为期；7，中央每年津贴阿旗大洋三万六千元，令由宁夏省政府拨给；8，遇有特殊情形，宁夏省必须派兵到磴口县境内驻扎，事先通知阿旗。这八条办法并没有认真施行，因而没有起到什么作用。1938年，马鸿逵进攻定远营之后，乘胜在磴口强行建立了县政府和保甲组织，夺取了阿旗对磴口的管辖权，开始抓兵要粮，摊派皮毛，形成了旗县并存的局面。于是这个问题便成了达理札雅与马鸿逵之间磨擦和冲突的根源。

## （二）特务的挑拨离间

1937年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派郑子献为驻阿旗军事专员。宁夏马鸿逵也以防守阿旗为名，派马鸿宾部三十五师张海禄步兵团来阿旗驻防。郑子献到阿旗后，大搞特务活动，与达理札



雅关系处得很坏。此时，达理札雅的电台同德王“蒙政会”在北平雍和宫设的电台时有联系，为的是和居住在北平的三弟达穆林旺楚克互通情况，事被郑子献查出，立即向马鸿逵告发，说是达理札雅与日伪秘密联系。马鸿逵闻此大喜过望，遂与郑子献勾结在一起，共同向中央告发达理札雅。在此时期，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到西北视察，在兰州接见了马鸿逵。听到马鸿逵汇报这种情况后，指示必要时可以军事占领阿旗，朱绍良也表示同意。马鸿逵从此有恃无恐，便积极作攻占阿旗的准备。

阿旗亦有所觉察，一面向行政院和蒙藏委员会报告恶化的局势，请求派员调处；一面亦作防范准备，将在旗政府库存的一部分枪支弹药、金银财宝和历史档案，转移到牧区沙漠戈壁地区，准备一旦有事，好与马鸿逵打游击战。当双方戒备森严，剑拔弩张之际，蒙藏委员会派来委员刘伯石调解争端，但并无什么效果，双方仍在准备战斗，处于一触即发的势态。特务、官僚、政客的挑拨离间，对于达理札雅与马鸿逵间的争斗，确实起到了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作用。

## 第二节 定远营之战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旧历正月二十五日，马鸿逵趁人民过春节之机，以军队换防为

名，暗地调集大批步、骑、炮兵，并在一架飞机的助战下，向定远营发动了突然袭击。这次调集的兵力有：省警备第一旅马宝林部的王有禄、何玉魁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营、一个炮兵营，由马腾蛟为总指挥，并配合原驻定远营的三十五师张海禄团，重重包围了定远营并进行了炮击。阿旗侦知这一情况，即于驻城的两连保安队中抽出十几人守卫后营盘山制高点，其余全部登城据守。攻城的马家军遭到城上军民的奋力抵抗，激战一昼夜，仍然没有攻入城内。进攻营盘山的马家队伍，亦遇到坚强抗击，没能冲到山上。马家军恼羞成怒，扬言要用炮攻城，在此危急时刻，达理札雅召集旗府官员紧急磋商，认为敌我兵力过于悬殊，势难久守，为避免城中居民惨遭伤害，不如言和。此时，马鸿宾亦自银川赶到定远营，劝告双方停战议和。于是阿旗方面遂由商会会长郭殿魁、马金虎、周生祥出面，到马腾蛟处谈判。同时给马腾蛟送去白洋一千元、骆驼二十峰、马十匹。马腾蛟提出：1，将阿旗保安队全部解除武装；2，牧区的蒙古兵不得袭击宁夏的军队，以及路截等零星干扰；3，将札萨克达理札雅移住银川。达理札雅不得不全部接受这些条件，于正月三十日被押往银川。这次战役共向宁夏交出电台一部、迫击炮三门、炸弹两箱、炮弹十一箱、高

射机枪一挺、轻机枪一挺、手提式及冲锋枪十九支、手枪三十四支、各种杂式步枪四百五十支、各种子弹四十七大箱、二十七小箱又四麻袋半、刺刀两箱另七十一把。阿旗只留下供站岗用的步枪二十支。

与进攻定远营的同时，宁夏马德贵骑兵团从石咀山向驻守亭子（四坝）的阿旗保安队第八中队杨富存部进攻，亭子未被攻破，因众寡悬殊，第八中队不得不撤到乌兰布和沙漠一带。

事后得知，马鸿逵原来的计划是用五个团的兵力占领定远营和王爷府；用一个团的兵力攻占吉兰太盐池；用一个团的兵力攻占磴口全部地区后，向阿旗北部图克木巴格、红格尔玉林巴格的大水沟进军；另以一个团的兵力由中卫县向阿旗南部头道湖、二道湖、三道湖和察汗盐池进攻；此外，又向甘肃马步芳请援，派兵从河西走廊武威县，经民勤县向阿旗的腹地巴音诺尔公地区进攻。这是全面占领阿旗的计划。但是这个计划首先就遭到马鸿宾的反对，他说：“这是无事生非捅马蜂窝的计划。这样一干，就要惹起游击战，蒙古人打起来，日本人也要打进来，岂不是引狼入室吗？纵然那时达理札雅在我们手里，我们也无所作为，还是适可而止为上策”。兰州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得知马鸿逵已攻占定远营后，

也给马鸿逵打来电报说：“再不能扩大军事行动。”因此，这个全面攻占阿旗的计划未能实现。

### 第三节 马家势力涌入阿旗

紧接着军事进攻之后，马鸿逵即企图在定远营设置县治，以达到他的政治统治的目的。

#### （一）设立“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

这个办事处的最初名称是“宁夏驻定远营办事处”，并以阿旗政府的大小协理任命为办事处正副主任，并宣传说，办事处将筹设县治，以后蒙古人仍由旗政府管辖，定远营汉人归县管辖。企图第一步先形成一个旗县并存的局面，然后再图长远部署。但由于遭到蒙汉人民的坚决反对而未能得逞。以后又于同年秋天在定远营设立了“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派其心腹张朝栋、高中第等为主任。首先在定远营清查户口，编制保甲，填发身份证，登记壮丁，并对商号及各行业摊派苛捐杂税。当时定远营有居民二千余户，人口七千余人，共编了八个保，一百二十个甲，后又改编为十三个保，并设立各保联合办公处，派首席保长数人，在办事处指使下，对人民进行直接压榨和征兵。马鸿逵的征兵给阿旗人民特别是定远营人民带来了莫大灾难。从1940年秋季开始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先后征兵

七次，每次征兵八十至一百名。同时还经常征补逃兵，跑一个兵向原地罚三个壮丁，并把家属抓去关押吊打；逃兵如被抓回，轻者非刑拷打，重者就地枪毙。有些商号和手工业作坊为了自己的店员和学徒免于抓兵，只好雇人顶替，这种顶替的壮丁如有逃跑，即向原主要兵，还得再雇，如此雇了又雇，反复压榨，最后只有破产倒闭。到无兵可抓时，就实行以马代丁或以驼代丁的办法，规定以五匹马或七峰骆驼代替一个兵，以后减少到马两匹、骆驼四峰。这样先后征去骆驼一千多峰、马八百多匹。另外，还强迫旗政府从牧区征走马两千多匹、牛五百多头、骆驼五千多峰。

### （二）加强军事控制

定远营战后，马鸿逵将他在定远营驻军作了调动，把原驻定远营的马鸿宾部三十五师张海禄团调回宁夏，改由马宝林部王有禄团驻定远营。马家军一到，便霸占民房，强买强卖，征集牲畜，强拉民伕无偿地为马家军服役。一直到阿旗解放前夕，在定远营仍驻有一个工兵营（加强营）。国民党特务横行时，工兵营随意抓人，例如该营营长于1948年将一个患疯病的青年抓走，硬说是装疯的共产党侦探，伙同中统特务头子刑讯后，秘密送往宁夏。

### （三）设立“军警联合督查处”

为了迫使阿旗就范，马鸿逵在1942年派宋清珍、雷震霆等人，在定远营设立了“军警联合督查处”，组成骑兵“缉私队”，沿着旗境昼夜巡逻。在定远营各路口也设卡巡查，严禁粮食入境。抓到贩运粮食的商贩和驮户，人即治罪，车马骆驼和粮食充公。因此造成阿旗粮食奇缺，粮价暴涨，人心惶恐不安。

#### （四）设立“富宁公司”

“富宁公司”是马鸿逵榨取阿旗人民血汗的经济机关，其后改称“宁夏省银行驻定远营办事处”。负责人是邢椿年（外号邢大头）。以其雄厚的官僚资本及军阀势力，垄断控制了全旗的皮毛及其他土特产品的购销业务。他们的垄断方法是用贷款、赊欠、欺骗等手段进行的。即在冬春季节农牧民生活和生产有困难的时候，或各中小商号资金周转不灵的时候，以月息八分放出大批贷款，到夏秋季皮毛上市时，便以官价驼毛每斤两角四分，羊毛每斤八、九分钱，进行掠夺性收购。在这残酷剥削下，贷款的人把所生产的和经营的全部皮毛交给宁夏银行办事处，还不够偿还贷款和利息，只得再向其贷款。这样年复一年地在重利剥削压榨之下，贷款永远偿还不清，农牧民赖以生活和生存的牲畜皮毛，便完全掌握在宁夏银行办事处的手中。使阿旗牧

民濒临破产。

### （五）设立税卡、木材厂等

1932年，马鸿逵在音昌堵等地设置税卡，专司对过往商人收取捐税。阻碍了阿旗与内地的物资交流，给阿旗人民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在定远营，苛捐杂税层出不穷。如南大街有一屠户因交不起摊派羊皮，而被逼得抹脖子自杀。此外，对贺兰山的森林资源大肆砍伐，在定远营设立木材厂一处，每到伐木季节，即派其驻军成连成排入山乱砍乱伐，致使内蒙古西部地区珍贵的大片森林遭到破坏。对于冰碱、甘草、苁蓉等药材，只要能获利，亦千方百计进行垄断收购，每年达一百万余斤。总之，在马鸿逵的抓兵、派款、压榨掠夺、横征暴敛的残酷统治下，全旗农牧业生产凋蔽。定远营原有一百五十多户中小商号及手工业作坊，到1949年解放时只剩下五十余户，市面变得萧条冷落。

## 第六章 兰州七年

### （一）银川小住

定远营一战，马鸿逵大获全胜，踌躇满志。这时，达理札雅亦被押解到银川。两人见了面，马鸿逵对达理札雅说：“上面（指白崇禧）命令嘛！不是我马鸿逵存心与老弟过不去。”达理札雅尴尬地笑了笑。马派人把达的一家安置在一个

大院里，门前有警察站岗，说是保护，实系监视。马鸿逵为了软化达理札雅，几乎天天派他的四太太刘慕侠、五太太葛云霞和他母亲，还有省政府主要人物白建华等轮流到达的家里打牌、看戏。金允诚为了缓解他丈夫与马鸿逵的关系，也在马鸿逵的五位太太中间往来周旋，强颜欢笑，陪着她们吃吃喝喝，还要不时地送些礼物，以博取他们的同情和欢心。这时达的三女儿因病夭折，达的心情沉痛已极。他感到与其在银川这样受窝囊气，莫若到兰州去住还要好些，于是派大协理罗·恩凯巴图等于1938年8月乘飞机到兰州，将达理札雅的亲笔书信交给西北军政长官朱绍良，要求澄清是非，允许回旗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或允许他移住兰州，以便在朱长官的领导下，为抗战救国奉献忠心。经朱绍良请示中央之后，同意达理札雅移居兰州。随后派第八战区总参议张舜臣（春浦）到宁夏征得马鸿逵的同意，于是年九月将达理札雅接到兰州。

## （二）移居兰州

达理札雅到兰州不久，金允诚也带着子女们乘坐飞机到兰州，他们被安置在司令长官部门前裴建华的别墅里，代号为玉泉山14号。由八战区总参议张舜臣、总务处长拜襄华负责接待。住宅前有一班警察驻守，夜间尚有岗哨。后门外边



便是特务头头陈益民的办公楼房，出入的人都被监视得一清二楚。因此，达理札雅住在兰州七年之久，虽然摆脱了在银川时那种生命时刻受着威胁的境地，但依然处在被监视、歧视、怀疑的地位，处事待人必须曲意承欢，以取得国民党官员们的好感。达想到自己虽然身在兰州并出入豪华的官场之中，但阿旗的乡亲父老还受着马家军阀的欺凌压迫，生活上、精神上还受着折磨。他时常对家人们说：“咱们现在是不怕半夜鬼叫门了，但何年何月才能回旗呢？！”有时还自慰地说：“监视就让他们监视吧，时间一久他们就会对我了解的。”以后，第八战区长官司令部的总参议张舜臣、长官部秘书长翁燕翼，每天或隔几天就来找达理札雅谈话，达理札雅也经常到朱绍良家里谈话，经过一段时间了解之后，认识到达理札雅是位拥护抗日的王公，因此，对达理札雅的态度也好了许多。

为了搞好与当时西北战区最高长官朱绍良的关系，金允诚也充分发挥了作为达理札雅贤内助的作用，经常陪同朱绍良的夫人一块玩乐。以及奔走于这些达官贵人之间，投其所好，甚至节衣缩食用来应付各种礼仪酬酢。后来，达理札雅由阶下囚跻于座上宾，也确实得力于这种帮助。

达理札雅在兰州应付国民党上层，确实是很

艰难的事情。一方面，朱绍良是第八战区的司令长官，一方面，谷正伦是甘肃省政府的主席。这两位军政头目，虽然同是蒋介石的嫡系骨干，但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矛盾，对权益各不相让，各有一派力量，这样在两大派之间，最难应付，必须顾此及彼。何况达在兰州的生活一切都由战区方面供应办理，而有些具体问题，也脱离不了甘肃省政府的隶属范围，因此就必须两方兼顾，左右逢源，方能应付自如，免生枝节。

在环境稍为好转之后，达理札雅向朱绍良提出两点要求：一是请朱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联系，他想到重庆觐见蒋委员长；二是要求个人回旗整顿旗务，安定人心。当时朱答复：去中央的问题，请示解决；回旗的问题，可以通知旗里官员来兰州，达可听取汇报和指示工作。必要时可由兰州经过一条山直接到阿旗辟一条路进行联系。达理札雅听了极为高兴。于是于1938年冬召集旗府官员陈·爱尔德尼巴图等人从草地来兰州，经商议对旗里工作做出几项决定：（1）全旗的工作重点放在牧区，严防马家势力向各巴格渗透，坚决反对在牧区建立保甲制度；（2）建立从定远营直通一条山的驿站，由定远营到一条山骑马只用二十四小时，然后再用电话向兰州玉泉山十四号联系，并由南部总管陶·塞尔布吉

派专人常住一条山张钦武家，负责传递联系工作；（3）从盐池租金中拨半数留在兰州（合计现洋一万元），作为达礼萨克的每年活动费用；（4）每年由旗里派出由喇嘛、商会各界组成的请愿团到兰州请愿，要求让达理札雅回旗主持旗政，以鼓舞旗民支援抗战救国的积极性；（5）暂停全旗的牧业税收，并大力动员蒙民骆驼完成运盐任务，以免减少财政收入；（6）派管理生活的官员、厨师、管马的人，连同好马十余匹到兰州来，以便照料寄居异乡的生活。由此，达理札雅在兰州的枯燥生活中，又增添了一些情趣，侍弄爱马、走马，又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项内容。

在此期间，由于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的关系，青海塔尔寺的活佛喇嘛、甘南拉卜楞寺的活佛喇嘛、以及天祝、卓尼等地的藏族头司，都来兰州探望达理札雅，并向朱绍良请求让达理札雅回旗，使国民党官员们看到达理札雅不仅是位抗战爱国的王爷，而且在蒙藏地区有很高的声望，于是逐渐放松了对达理札雅的怀疑和不信任。大家（包括第八战区长官部及甘肃省政府的大员在内）对达理札雅都尊称“王爷”。朱绍良、张舜臣、翁燕翼等人对达都有了好感，就支持他到重庆谒见蒋介石。

### （三）两谒蒋介石

1939年冬，达理札雅在朱绍良的帮助和支持下，坐着第八战区的专机，从兰州飞到重庆，同行的有协理罗·巴图孟柯、秘书王枕华、随员李树德、金·巴图道尔吉等。这次去重庆是晋见蒋介石的。他们到了重庆后，拿着朱绍良的介绍信，先到蒙藏委员会见到委员长吴忠信，经向军事委员会办公厅联系无结果，遂又找关麟征向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张治中联系，在张治中的帮助下，首次见到蒋介石。

达理札雅自幼在北京长大，过惯都市文明生活，读书不多，却颇有教养，讲排场，重礼节，善于交际应酬，而且仪容大方，谈吐文雅，初次见到蒋介石，颇得蒋介石的青睐。

谈话时蒋很和气，说：（1）中央保证你将回旗执政，不过目前在抗战时期，还是住在后方比较安全；（2）你个人每年可以回旗两三次，上坟扫墓，指挥旗务；（3）你同马少云（马鸿逵）的关系，中央给你们调解。又问了些家里和旗内一些情况，就送客了。对于宁夏马鸿逵肆意污蔑达勾结日本，投敌卖国和马鸿逵派兵镇压阿旗人民的事情，只字不提，达理札雅自然也不能再说什么。这次召见后，赏了一桌酒席，招待住了几天。达理札雅就利用这几天时间，向张治

中全面汇报了阿旗的处境，请他给予帮助，并设宴酬谢了张治中、关麟征等军委要人。除此之外，又和蒙藏委员会及边疆党务处的负责人吴忠信、白云梯、李永新、何兆麟等研究了阿旗的问题，确定：（1）请何兆麟兼任阿旗驻渝办事处处长；（2）由白金山到阿旗担任国民党阿旗区党部书记。离开重庆之前，又专门谒见蒋介石稟辞。蒋介石送给达理札雅一张放大的戎装彩色照片和一些云南白药等礼物。照片的题款是：上款“锐荪亲王惠存”，下款“蒋中正赠”，并加盖了私章。由此，达理札雅在清代皇封的亲王尊号，复得到民国领袖蒋介石的认可，其尊宠优惠可谓无以复加了。

蒋介石对达理札雅的第二次召见，是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八月，那是蒋介石到兰州视察的时候，与宋美龄同来，住在兰州四墩平九间楼。在对部属例行接见之后，蒋介石夫妇特地邀请达理札雅夫妇吃了一顿饭，虽然没有交谈什么重要的事，但达理札雅和金允诚待人接物的清雅忠厚的风格，给蒋介石夫妇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 （四）阿旗人民思念札萨克

1938年定远营一战，阿旗以失败告终之后，达理札雅被胁迫去银川，阿旗人民除了恐惶

不安外，到处都在议论纷纷，反应十分强烈。阿旗政府考虑到达理札雅的安全，在1938年3月3日，只有忍辱发布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禁止谣言，稳定社会秩序的布告。布告说：“此次军队奉令来旗换防，因深夜前来，后营盘山守营骑兵不明真相，兼蒙汉语言不通，遂致发生误会，小有冲突。后经查明真相，彼此一家，业已和平解决，恢复旧好。乃竟有无知之徒，捏造种种荒谬之谣言，扰乱人心，妨害地方治安。查谣言惑众，向干例禁，为军法所不容，本应严究重惩，以儆效尤，姑念愚民无知，宽恕既往。自此次布告之后，蒙汉各界人等，宜各安生乐业，切不得再履前辄，造谣扰乱，致干罪戾，倘有不法之徒，无视不遵，本政府言出法随，一经查知，定行重惩不贷，勿谓言之不预也。”

布告虽出了，但明眼人一望便知，这是旗政府不得已而出的，从而对马鸿逵更加痛恨，对达理札雅王爷更加怜惜和怀念。特别是牧区，每逢互相串家走舍，寒暄之后，紧接着便互相问闻达札萨克的消息，结果是怅然叹息一番，郁郁而去。

如今，王爷已经走了几年了，尚没有回来的消息，怎么不叫人悬念呢？于是便有些人编了一首歌儿，以抒发对王爷的思念之情。说也奇怪，

这首歌儿一唱开来，便不胫而走，不久便传遍牧区。每逢放牧归来，大家围聚在蒙古包里，不由得便唱起来，越唱越伤心，甚至有的妇女泣不成声。

这首歌儿的歌名是“阿拉善王”，共四段，用的是阿旗民歌《栗红马曲调》，歌词如下：

1，栗红骏马世无双，犹如神龙降下方。王爷大驾镇朔漠，具有菩萨慈心肠。

2，贺兰山貌似卧龙，松柏相映翠又青。王爷英名传遐迩，功德原与观音同。

3，战马长嘶天地动，贺兰隐在征尘中。王爷劲旅威风大，讨逆除叛居首功。

4，大风呼啸旌旗飘，王师健儿斗志高。所向无敌如摧枯，凯旋归来庆功劳。

#### （五）两次回旗探望

民国三十年（1941年）阿旗群众纷纷要求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允准达理札雅回旗看一看。经过朱绍良征得马鸿逵的同意，达理札雅由第八战区总参议张舜臣陪同，从兰州乘汽车回了一次定远营，这是达理札雅被软禁兰州两年来第一次回旗。路过银川时，张舜臣陪达理札雅对马鸿逵作了礼节性的拜望，并到在宁夏各故旧处应付了一番。在定远营住了一个多月，又由张舜臣陪着返回兰州。回兰州时，为了避免宁夏马鸿逵找

麻烦，就由定远营骑马经过沙漠草地到一条山，然后换乘汽车转返兰州。这次张舜臣总参议陪同达理札雅到阿旗，表面上看是“陪同”，实际是了解达和阿旗的真实情况，结果并没有发现有投靠日本的事，从此，国民党当局对达理札雅又放松了一些。

达理札雅在兰州期间，工作也相当繁忙，几乎每天都接待国民党中央和省一级的官员，如胡宗南、戴笠、傅作义、马步芳等等高级将领。由于一条山驿道畅通，同阿旗互通信息也较前频繁，还得处理一些旗里的工作。例如：为了打破宁夏对阿旗的粮食封锁，他指示旗府官员同甘肃的景泰、民勤、张掖、武威等县联系购粮。为了谋求阿旗今后的发展，他还指示旗里注意保送有相当文化水平的青年，不分民族，只要是阿旗居民，有机会都可以到外面学习深造，并由旗里付给学习费用。从1940年开始，向黄埔军校保送的学生有三十多人。向兰州警官学校保送十余名。兰州师范十余名，绥宁师范三十余名。另外，兰州中学、市中学等也都有阿旗学生读书。他还暗示旗里的官员，以后对马鸿逵的喜庆生日等，要派员前去庆贺，以逐渐缓和同宁夏的关系。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达理札雅从



兰州第二次回旗看望。这次回旗，兰州方面没有派人跟随，金允诚有病没有同来，只是偕同他大女儿，从兰州坐汽车到达银川后，看望了马鸿逵两代人，就直驶定远营王府。旗内王府的大小官员，远在各地的牧民群众，也纷纷前来看望。达理札雅同大家畅谈终日，诉说离别后的情况，真是感慨万千，催人泪下。他劝谕大家今后要团结一致，密切联系，安心等待他回来。这样住了一个来月，分手时依依惜别，久久不忍离开。走时由旗里派人护送从沙漠草地回兰州。

#### （六）离开兰州回旗

达理札雅在兰州度过七年之久惴惴不安的岁月，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和折磨，承受了各种方式的审查和考验，逐渐取得了国民党当局的了解和信任。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呼吁和阿旗官民的请求下，终于在1944年夏被批准回旗，从而结束了他多年流亡生涯。消息传到阿旗，闻者莫不欢呼喜悦，传到牧区，人们奔走相告。1944年9月初，阿旗的官员、喇嘛、护卫人员一百余人，携带骆驼、马匹、车辆等运输工具，出了长城，翻越腾格里沙漠，经过头道湖草地，行程千余里，费时半个多月，专程来到兰州，迎接他们的札萨克回旗。

在离兰州之前，达理札雅在兰州军官招待所

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宴请第八战区长官部和甘肃省府厅局长以上的军政要员三百余人，感谢这些年大家对他的关怀、照顾。并分别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蒙藏委员会去电致谢。诸事完毕之后，他才偕全家登程，同行的还有新聘请的秘书主任李宪。沿途不论是宿营或歇息之处，都有远道而来的牧民群众和边官、喇嘛在迎候。不少老年人看到他们久别的王爷时，个个长跪在地，泣不成声。达理札雅连忙亲手扶起他们，连声说：我也很想念你们。当他们到达距离定远营十里的周家田时，这里早已搭起了十几顶蒙古包，五颜六色的彩旗，迎风招展，俨然如盛大节日一般。等候在这里迎接的有旗政府的罗协理、陈章京和其他官员、喇嘛和机关代表数百人。按照事先的安排，在这里要休息一夜，次日才正式入城。次日正值中秋佳节，等候在南梁迎接的有保安队官兵、机关干部、学校学生、喇嘛和群众千余人。达理札雅和夫人金允诚步行向欢迎者频频招手致意，然后进入城内。这时守候在街道两旁的群众情不自禁地报以热烈掌声。接着由延福寺的喇嘛仪仗队为前导，簇拥进入空闲多年的王府。此情此景，将铭刻于阿旗人民的记忆之中。

## 第七章 和国民党打交道

### 第一节 开始经营阿旗

僻处西北边陲的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在清代是直隶于理藩院的特别旗，俾为西北屏障，捍卫京师。民国而后，先后历经北洋军阀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两个时期，国外帝国主义侵略，国内军阀混战，内忧外患，国无宁日，中央政权极不稳定，对于边远的蒙旗地方，实际不能进行有效的统治。北洋政府的蒙藏院和南京政府的蒙藏委员会软弱无力，政令不能贯彻，清代蒙旗制度大体原封未动，任其自流，较之清廷理藩院对于蒙旗之严密统治，实不可同日而语。

1931年“九·一八”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首先吞并东北（满洲），随之渗入内蒙，适至1937年“七七”前后，阿旗即已发现日本特务前来活动，其后公然乘坐飞机降落定远营，进入王府与达理札雅公开“谈判”。1938年马鸿逵派兵攻陷定远营，俘虏达理札雅到银川后，国民党政府始大为震惊，开始重视阿旗，调来军队一个师对阿旗镇摄监督。此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包头，与偏安河套一隅的傅作义部隔河对峙，阿旗成为绥、宁两省后方，战略地位更加重要，国民党政府遂大力经营统治阿拉善旗。与此同时，外蒙与苏联亲善，脱离中国而独立。阿旗亦可依为外援以抗衡国民党势力。而外蒙、苏联都可借重阿旗向中国腹地渗透，西北

即将成为多事之地，后患无穷。因而国民政府为了巩固西北国防，亦即大力经营阿拉善旗。经营的主要目的，其初是反日、反奸（汉奸、蒙奸）；继而是反共、反苏。经营的主要方式，一是设立各种机构，以加强中央对阿旗的控制；二是施行怀柔与羁縻，以巩固阿旗与中央的关系。概括起来为八个字：“巩固边疆，拥护中央”。

## 第二节 设立“军事专员办事处”

1937年8月，国民党以防止日本向西侵略为名，设立了军事委员会派驻阿拉善旗“军事专员办事处”，它的任务除了防范日本外，监视阿旗保安部队的活动，防范蒙古人民共和国间谍活动，防止阿旗人民与外蒙来往。还有调查外蒙情况，搜集外蒙情报的任务。实质上是设在阿旗的一个反苏、反蒙、反共的据点。

“军事专员办事处”有专员、副专员、秘书、参谋、副官等，并设有电台。第一任专员为郑子猷。郑到阿旗后刚愎自用，看不起达理札雅，并大肆造谣，破坏阿旗与中央的关系，深为达理札雅所嫌憎，上告中央，将郑子猷撤职调离。

郑子猷被赶走后，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立即派专员，到1939年秋，才派来李子才为军事专员。李子才是马家旧部，到任一年，国民党以

嫌非嫡系而免职。并派路帮道继任军事专员。路是个旧军人，曾留学法国，北洋政府时代，曾随徐树铮驻外蒙。不难看出，国民党派他为专员，主要是为了加强对外蒙的工作。1942年有一个在外蒙侨居多年的叫董云娃的人，被外蒙派在沿国境线一带做阿旗的工作，路帮道闻之派人把他抓来，关押多月，后异想天开，把董放出，派为少尉副官，要他为中国做外蒙的工作，谁知董一去即杳无音信。

在路帮道任期内，另一次比较重大的政治案件，即李子元案。李子元原在国民党部队中工作，后脱离部队留在定远营阿旗小学当教员，李好文娱活动，又有吸食鸦片嗜好，常和一些唱戏的和瘾君子来往，因而为“军事专员办事处”特务蓝怀青和白文玉所怀疑，于1942年8月，以共产党嫌疑逮捕，在定远营关押审讯一个多月，无何口供，后由“军事专员办事处”命令阿旗保安队解往兰州第八战区司令部，以后又送往劳改营，1945年方恢复自由。

1942年9月路帮道调走，崔翼继任。崔原在山西工作，与傅作义、陈长捷等关系较深。到任后加强了反苏、反共的特务活动，曾派漆河槐、阎道让等参谋测绘人员深入牧区和边境绘制可供军用的阿旗地图。1944年冬带领其妾阎

翠兰往沿国境线各防线，巡查特务电台布置情况，并了解阿旗北部人民的思想动态。抗日战争胜利后，大肆进行反共宣传活动。

1946年10月，崔翼调走，继任者为吴宗周。到任后除继续进行反苏、反共活动外，又在专员办事处设立政治室，加强反动宣传，并将阿旗的军事、政治情报以及阿旗政府向行政院和蒙藏委员会诉告马鸿逵的事完全转告马鸿逵，因此与达理札雅关系闹僵，不适宜在阿旗工作，立即调走。

吴宗周于1948年8月调走，由罗大焯继任军事专员。罗是中央军校六期毕业，原为吴宗周的特务参谋，多年在阿、额之间搞特务活动。1947年春调往额济纳旗工作一年后，又调回阿旗。当时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为加强其在阿旗的军事力量，由第八战区增派一个特务工作组，并配有电台到阿旗，负责人为章文治，助手包跃东；他们配合阿旗稽查局、宁夏驻定远营“军警督查处”和宁夏驻军，加强对外地来人的稽查工作。1948年8月，查到一个由榆林路经伊盟来定远营行乞的乞丐梁德山，先由第八战区特务阎振东和苏效勤发现后报告章文治，经章文治与罗大焯商议后，将梁德山逮捕送“军事专员办事处”，严刑审讯三天，又在梁德山身上搜出麻钱

七个，串了一条红线，认定是共产党的侦探。在非刑拷问下，梁德山又供出两个乞丐胡开山、胡开科两兄弟。“军事专员办事处”要将这三个乞丐转到阿旗区防司令部管押，罗大熠对达理札雅说：“共产党的侦探在牧区大有人在，你们牧区巴格的防范工作非常麻痹，这三个人还是我们查到的嘛！”达理札雅说：“各巴格都平静无事，弄到三个讨吃的，有什么大惊小怪！审判应由你们负责，我们无能为力，要不就送到兰州长官部审理。”经章文治与长官部联系，答复是要查清事实，再报来处理。在此情况下，罗大熠再三向上反映，阿旗有共产党活动，兰州长官部乃电令阿旗区防司令部将梁德山案件审清上报。于是阿旗区防司令部与“军事专员办事处”联合组织审讯梁德山案小组，组长由蒙藏委员会派驻阿旗“协赞专员”兼区防司令部政工室主任戚涛担任；副组长由“军事专员办事处”参谋阎振东担任；组员由区防司令部参谋处、副官处、经理室和稽查局、理事官厅的负责人担任，使用了各种残酷的刑法审讯，梁德山当即死在牢狱，胡家兄弟供不出口供，遂作为悬案。阿旗临解放时，将胡家兄弟交给杨·嘎娃和巴音爱尔克在解往外地途中被秘密杀害。

### 第三节 设置“协赞专员”

在设立军事专员的同时，蒙藏委员会也派了驻阿旗的“协赞专员”。说是协助札萨克处理旗内军政大事，并调查旗内民族事务，思想动态，以及经济文化等情况。实际是对阿旗政治的控制和监督。“协赞专员”一共派来三个，首任陈永治，继任顾信武，第三个是戚涛。达理札雅和阿旗仕官对“协赞专员”并不特别欢迎，只是上级派来，岂有拒不接纳之礼？惟有优礼有加，待以客卿，不予实权，以免干预政事。久而久之，达认为这些下来的有文化的汉人，若能量才使用，亦可对阿旗有所裨益。于是初则给予对外联系，陪伴宾客等事务，继则酌予行政职位，逐步予以有限的信任。例如：首任“协赞专员”陈永治来旗时，正赶上日本人来阿旗捣乱，经旗政府邀请，陈永治即以旗府秘书的名义，参与了对日本人的会见，并以“协赞专员”和达理札雅的名义向上面反映了日本的特务活动，请求上面派军前来驱逐日特。其后戚涛继任“协赞专员”，初不见重用，后则委以旗府教育主任，兼蒙文学校校长职务，继而又委以阿旗中学校长职务。1948年又令兼任阿旗区防司令部政工室主任，并参与政治案件的审讯。1948年8月发生的所谓共产党嫌疑犯梁德山及胡开山、胡开科案件，即系由戚涛担任各单位联合审讯组组长进行审讯的。



#### 第四节 建立国民党党团组织

国民党在阿旗建立党的机构，是1939年冬达理札雅到重庆谒见蒋介石时，有机会见到国民党中央“边疆党务处”处长李永新和副处长何兆麟，由李永新提出在阿旗建立党团组织，达理札雅当即表示同意和支持。1940年8月，达理札雅第一次由兰州回旗时，在定远营亲自主持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直属阿拉善旗区党部。”在此之前，国民党宁夏省党部曾乘宁夏势力涌入阿旗之机，在定远营设立过“定远营县党部”，但遭到国民党中央的否定，勒令撤销。

国民党阿旗区党部首任书记白金山，蒙族，是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边疆党务处”总干事调任的，任期二年（1940—1942）。继任书记王枕华，蒙族，原在阿旗任电台台长，后任书记三年（1943—1945），以后又任特别党部书记长二年（1946—1947）。后因当选为国民政府监察委员而去京。王去京后，书记长职务由张文第担任。他是由额济纳旗区党部书记调任的，1949年5月到阿旗。当时国民党政权已趋土崩瓦解，党部经费停发，他没有办理正式交接手续，即向达理札雅（特别党部主任委员）辞去书记长职务，到阿旗政府担任秘书，9月随达理札雅起义。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建立，最早是在1939年，当时甘肃省直团部派叶建军来阿旗活动，发展了罗·巴图孟柯、张元忻、于培根、张元懋、辛文秀、王国宝等六名团员，建立了一个小组。到1942年，正式建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阿拉善旗分团部，成立了由罗·巴图孟柯、陈·爱尔德尼巴图、张元忻、李文钦、李树德、于培根、陈·江布勒等七人组成的干事会，李文钦任书记，下设总务、组织训练、宣传三股，以后建立了三个基层组织即区队。1948年，与国民党合并。

国民党中央直属阿拉善旗区党部，在1944年召开了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特别党部，人事编制亦比区党部有所扩充，计有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一人，书记长、副书记长各一人，下设组织训练、宣传两个科。主任委员由达理札雅担任，副主任委员由罗·巴图孟柯担任。从此国民党部实际上成了阿旗地方办的党部，阿旗的党政军大权也集中于达理札雅一身。

特别党部成立后，在达理札雅的直接领导和旗政府的行政命令推动下，各项党务都较前有了发展。国民党员发展到一千一百多人，据熟悉内幕的人说，这些党员的绝大多数是一声令下，集体加入，徒有其名，而无其实。有的是被迫的，

有的是拉伕的。党的基层组织区分部增加到四十一个，这些区分部除了定运营的以外，牧区的区分部大都设在寺庙。除此之外，特别党部还附设有阿旗简报社和卫生所。

#### 第五节 国民党在阿旗的特务组织

国民党在阿旗的特务组织，大体上可以分为“军统”、“中统”、“国防部二厅”、“西北行辕二处”等四个系统。

“中统”全称“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中统宁夏站在阿旗设有特务组，以王君惠为组长，备有专用电台。

“军统”全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抗日战争胜利后改称“国防部保密局”。阿旗的军统组织先是“蒙疆查缉所”，负责人宁自强，后是“情报组”，负责人魏文锦，备有专用电台和武器。

“国防部二厅”（原称军令部二厅）阿旗情报组负责人先后有周国良、叶志祥、罗大涓、李海平等，备有专用电台。

“西北行辕”全称“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由第八战区长官部改组而来），设在兰州。后又改称“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该行辕或公署第二处（政工处）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至三年内战期间，在阿旗设有情报组，负责人先后有

张开绪、燕振东等人。

上述各系统特务组织，都属秘密工作性质，一般都另有掩护身份。如魏文锦是阿旗区防司令部少校参谋，阿旗政府磴口总管。周国良、叶志祥、李海平都是“军事专员办事处”参谋。张开绪、燕振东则是西北长官公署参谋。王君惠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阿拉善旗办事处”处长的名义为掩护，表面看来从事的是党务工作，实际上作的是特务工作。这些人的特务身份，以后都一一暴露，为人们所共知。他们同阿旗军政领导往来应酬。相互之间也往来结交，他们虽不设置公开的特务机关，王君惠的办事处还被达理札雅迫令撤销。但“蒙疆查缉所”是财政部缉私机关，“军事专员办事处”是国防事务机构，本身都不是特务机关，但都是特务利用作为掩护身份的机关，对外不谈论各自的业务和内部情况，在阿旗都是公开存在与公开活动，人们也习以为常，既不畏惧躲避，也不引以为怪，这是其它地区的特务组织所未见的特殊情况。这是因为国民党政府对阿旗的政策，只是消极地防止通敌（日本）或靠拢接近外蒙，其次防止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而对阿旗的内政则避免干涉，力求维持王公贵族的权益，对阿旗内部的封建落后和腐败无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决不横加指责，

何况达理札雅及其主要官员如罗·巴图孟柯等，在国民党内也得到宠信。阿旗常受宁夏的欺凌，这些特务组织也和宁夏之间有矛盾，所以特务组织虽多，并不可怕，甚至有时还可利用他们在中央政府为阿旗申张正义，主持公道。因而在阿旗的特务组织大都与阿旗统治阶层私情交厚，能得到阿旗的谅解和某些照顾，所以他们以公开身份讨好阿旗上层活动更加方便。

这些特务组织以“军统”组织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最大。“军统”进入阿旗始于抗日战争初期，著名的“李子元共产党嫌疑案”即发生在这一时期。后来阿旗领导人鉴于可以利用“军统”力量抗衡宁夏马鸿逵，遂同意本旗人魏文锦、张元忻等先后参加“军统”组织到重庆（陪都）接受培训后回阿旗建立阿旗情报组，并掌握阿旗政府稽查局等单位，协同旗政府各级仕官，与马鸿逵展开各种形式的反吞并斗争，终于取得国民党政府的谅解，保全了阿旗的独立性。从此阿旗愈益依靠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支持，与宁夏分庭抗礼。

1948年以后，“军统”在阿旗形成两个据点，一是张元忻负责的定远营，另一个是魏文锦负责的阿旗政府磴口总管，长期住在磴口，这个局面一直维持到“九·二三”和平解放为止。

“西北行辕二处”在阿旗的情报组发挥的作

用并不显著。他们不受地方长官达理札雅和罗·巴图孟柯欢迎，与其他地方人士又不熟悉，活动范围较小。1948年该组负责人燕振东曾在定远营擅自逮捕梁德山、胡开山、胡开科三人，诬为共产党密探，临解放时不明不白杀害的就是他们。至于“国防部二厅”在阿旗的情报组（他们的名称即叫银根组），主要是针对外蒙，以外蒙军政情报为主，兼防备阿旗政府与外蒙接近和往来，但因交通闭塞，中蒙关系断绝已久，该组人员甚少，经费不足，本应驻在边境银根等地，却因生活不便，长期住在定远营，工作无法开展，仅以道听途说或杜撰假情报，向上级敷衍塞责，虽曾数次揭发阿旗政府勾结外蒙，都因证据不足，情况不实，未被国民党政府重视。

1948年初，西北长官公署中将高参郑明轩来阿旗视察防务，在阿旗住了十几天，对阿旗协理兼骑兵保安总队长罗·巴图孟柯十分赏识，曾建议长官公署聘任为少将参议，并由公署推荐中央增补为蒙藏委员会委员，但未实现。

#### 第六节 教育和卫生设施

194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阿旗定远营创办一所小学，初名“国立宁夏定远营实验小学”，其费用设备及师资都由教育部筹派。达理札雅曾建议这所部办的实验小学应名为“阿拉善

旗实验小学”，未被采纳，后定名为“国立定远营实验小学”。校长张永成，教员有贺诚、广聚等，均由上面派来。

阿旗过去只有间私人开设的诊疗室，设备简陋，收费昂贵，不能解决医疗问题。达理札雅在兰州期间，曾多次向中央卫生署建议在阿旗设立卫生医疗机构，但迟迟未能实现。1944年卫生署才责成甘肃卫生处在阿旗开办卫生所一处，并派宋子安、王增堂负责筹备。在旗政府的协同下，这个卫生所于同年即成立开诊。达理札雅主持了开幕典礼。他讲话时说：卫生所今后工作应预防重于治疗。要向牧区开展巡回医疗。但因受经费、设备及医务人员少的限制，巡回医疗未能及早实现，因而受到医疗实惠的多是定远营的少数居民。

### 第七节 监督、羁縻、控制、怀柔

达理札雅和国民党原本无任何渊源，抗日战争以前，关系非常淡薄，其后由于日本特务在阿旗活动，达理札雅与马鸿逵交恶，阿旗方为国民党所重视。达理札雅亦由受到最严密的控制和监视而逐渐被重视。在移居兰州七年中，国民党政府一面加强对阿旗的监督和渗透；一面对年轻的达理札雅进行拉拢和怀柔。首先是保持达理札雅的“亲王”尊号，保留阿旗札萨克的职衔，准许

达理札雅与本旗仕官保持联系及下达指示，由阿旗按时供应费用，保持清代亲王驻京遥控旗政的待遇规格，每年春秋两季可以回旗扫墓。达理札雅所以能够与国民党从陌生而走向熟谙，从被怀疑而走向被信任，除了七世班禅大师等人的善颂善祷，国民党军政要人张治中、朱绍良等的说项外，尚有一重要线索，即靠电台台长王枕华的穿针引线。王枕华是“蒙政会”在1934年秋送给阿旗一部电台的台长。他是喀喇沁蒙古人，他的乡亲何兆麟、白云梯等人都在蒙藏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负责边疆蒙旗的党政工作。达理札雅原先同蒙藏委员会的人们不太熟悉，通过王枕华的关系，又认识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和国民党“边疆党务处”处长李永新（李永新是国民党C.C的骨干），由此而逐步与国民党接近起来。

1946年7月17日，中央组织部函请达参加国民党，并发给两张入党表格，以后达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先后被任命为蒙藏委员会、行政院顾问、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参议、宁夏省政府委员等职务。而达理札雅由于形势所迫，只得依靠国民党政府支援，以寻求自己的政治出路，也开始结交国民党人，熟识了许多国民党党政军大员，数年之间即得到了国民党统治阶层的信赖，可以直接在党内发



言，如马鸿逵多年屡次呈请在阿旗设置“紫湖设治局”一事，因为达理札雅的有力抗争，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慎重从事，一再延缓宁夏省的要求。因而使达理札雅当时更加依附于国民党，而国民党亦对达理札雅更加器重并寄予厚望。不管谁真谁假，或者皆真皆假，不管谁利用谁，或者互相利用，情况就是如此。

## 第八章 励精图治

### 第一节 改组阿旗政府

1944年，达理札雅获准回旗执政后，虽经周折他不但没有心灰意冷，而且励精图治的决心很大，首先是对阿旗政府进行改组。札萨克下设办公室，由正副协理、正副章京及秘书长、秘书等组成，为札萨克的办事机构。办公室下设置秘书处、政务处、教育处、财政处等四个处，各处设正副处长各三人。每处设三至四个科，除科长外，有若干办事员和练习生。练习生将来逐级提拔为政府职员。包括王府“包衣达”在内的旧职员共有二百零五人。除政府职员以外，还有三十六个巴格、四个总管公署的基层人员二百人左右。另外，稽查局设总务股、税务股、警卫股和警察队。理事官厅置“达尔嘎”（法官）若干人，下设法警一个分队。

在各级官员中，除协理、章京、王府总管、各处正职外，其他职员、兵士均两个月换班一次，都是义务制，生活有困难的给予补贴金。下班期间，生活自理。

经过改组后的旗政府，建立和健全了一些规章制度，办公秩序和效率都出现了新气象。

## 第二节 一次多种意义的庆祝会

达理札雅从兰州回旗后，第二年（1945年），正赶上他的四十寿辰。这一年，日寇投降，八年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达理札雅获得了抗战胜利青天白日乙级勋章。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旗政府改组完毕，政府办公新址也已经落成。所有这些都是当时的大喜事，颇值得大大庆祝一番。于是在这年的腊月十二日（达理札雅诞辰日）在王府举行了庆祝会。

到了这一天，各巴格的牧民代表、巴格“达木尔”、八大寺庙的活佛、上层喇嘛、商会和群众团体代表、旗里军政官员共七百多人都来献哈达，庆贺达札萨克的四十大寿。

这一天来祝寿的各地贵宾有：宁夏马鸿逵派他的大儿子马敦厚；额济纳旗札萨克塔旺嘉布派他儿子额尔登格日勒；三盛公天主堂主教王守礼；宁夏驻定远营和国民党驻定远营的机关官员们也都来向达理札雅祝贺寿辰。

# 改组后的阿旗政府组织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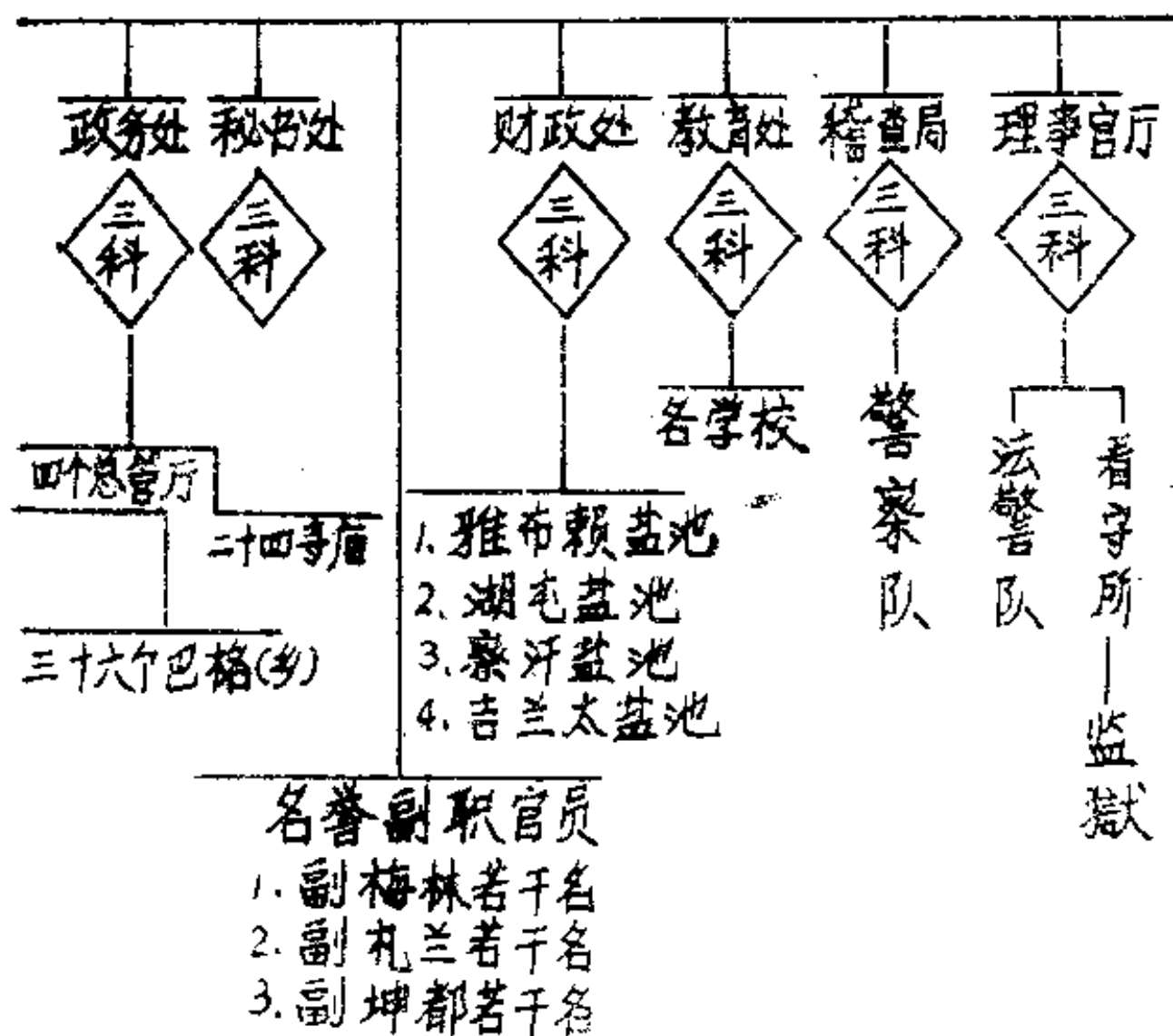
扎萨克(和硕亲王)

阿拉善盟阿拉善旗政府

扎萨克办公室(旗务会)

协理(正副各一人记名一人)

管旗章京(正副各一人)



众人祝过寿后便摆上了盛大的宴席。主人和客人们入席之后，首先摆上招待贵客的羊乌查（羊背子）。然后，又端上来阿拉善名肴“烤羊”。一时觥筹交错，刀叉并举，各种奶酒纷纷呈上来。大家一面品尝烤羊美味，一面饮酒，有的唱歌，有的猜拳，有的还猜起蒙古拳来，好不热闹，一直到杯盘狼藉，大醉方休。

宴会之后，达理札雅向全旗各族人民、军人、防卡卡兵、退职官员们表示敬意，称赞他们在卫旗抗日反马斗争中团结一致，英勇奋斗，做出的重大贡献。

### 第三节 “约法三章”

达理札雅回旗后，一反过去的看公文听汇报的工作方法，经常接见宾客，座谈访问，对阿旗的内部和外界的情况和问题作了初步的了解。

1945年春，在旗政府召开首次旗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协理、章京等和处、厅、局的负责人员外，还有区防司令部、保安总队和各学校的负责人。会议由达理札雅亲自主持，首先讲了当前抗日建国的形势（当时日寇尚未投降），接着肯定了在他离旗住兰州期间，在协理、章京及各级人员的共同维持下，没有出大的问题，令人满意。然后提出阿旗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安定人心，加强团结。要求大家对这方面的问

题发表意见。会上提出了两项具体措施：（1）上自旗政府及所属各机关、部队和各学校，下至各巴格边官的人员，一律照旧供职，不作调动；（2）所有现行的一切行政措施和各项规章制度，一律照旧执行，未经旗政府明令决定，任何人不得擅自改变。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同意达札萨克的讲话和这两项措施。会后，达理札雅指示秘书处立即把会议的决定发下去执行。经过这次会议，清除了许多人的顾虑和不安，澄清了许多的流言蜚语，粉碎了一切挑拨离间阴谋，约法三章收到了安定民心，团结大多数人的效果。

#### 第四节 举办边官训练

在达理札雅离旗几年里，有些旗政陷于混乱状态，特别是各巴格的边官中，不但不能及时反映下边的情况和问题，而且在执行旗府政令上存在着贯彻不力甚至阳奉阴违的现象。达回旗后通过了解，发现基层问题严重，乃决定分批调训各巴格在职边官，借以了解下情，布置工作，达到统一思想，加强旗政之目的。具体办法是将三十六个巴格的一百五十多名边官分三期进行调训，每期半月时间，训练班设在旗政府，由协理、章京及政务处处长负责。训练课程有总理遗教、抗战建国纲领、抗战形势、旗政设施、各巴格当前任务等。训练班于1945年4月开学，在每期

开学结业典礼上，都由达札萨克亲自主持，并接见受训人员个别谈话。经过三期的边官调训，了解了下情，密切了上下级关系，统一了认识和行动，更重要的是调动了基层人员的积极性，推动了旗政各项措施的贯彻执行，其意义是多方面的，效果也是显著的。

### 第五节 重整地方武装

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全面进行扩军备战，国民党为了军事部署的需要，又重建阿旗区防司令部，重新装备阿旗的骑兵保安总队，列入西北军事部署体系之内，由西北长官部直接派张辅庭教官督导训练。1946年9月1日，正式恢复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任命达理札雅为中将司令，陈·爱尔德尼巴图为少将参谋长。设司令部办公室，朱门为上校办公室主任，陈·那笋巴图为中校副主任，金·巴图道尔吉为少校秘书。设政工室，戚涛为上校主任。设参谋处，李文钦为上校主任。设副官处，张仁为上校副官长，张元忻为上校主任。设军需处，郑礼范为中校主任。设医务室，王增堂为上校主任。设驻兰州办事处，张德熙为上校主任。

区防司令部下设骑兵保安总队，罗·巴图孟柯任少将总队长，罗锐光任上校副总队长，罗永

寿任中校总队副兼参谋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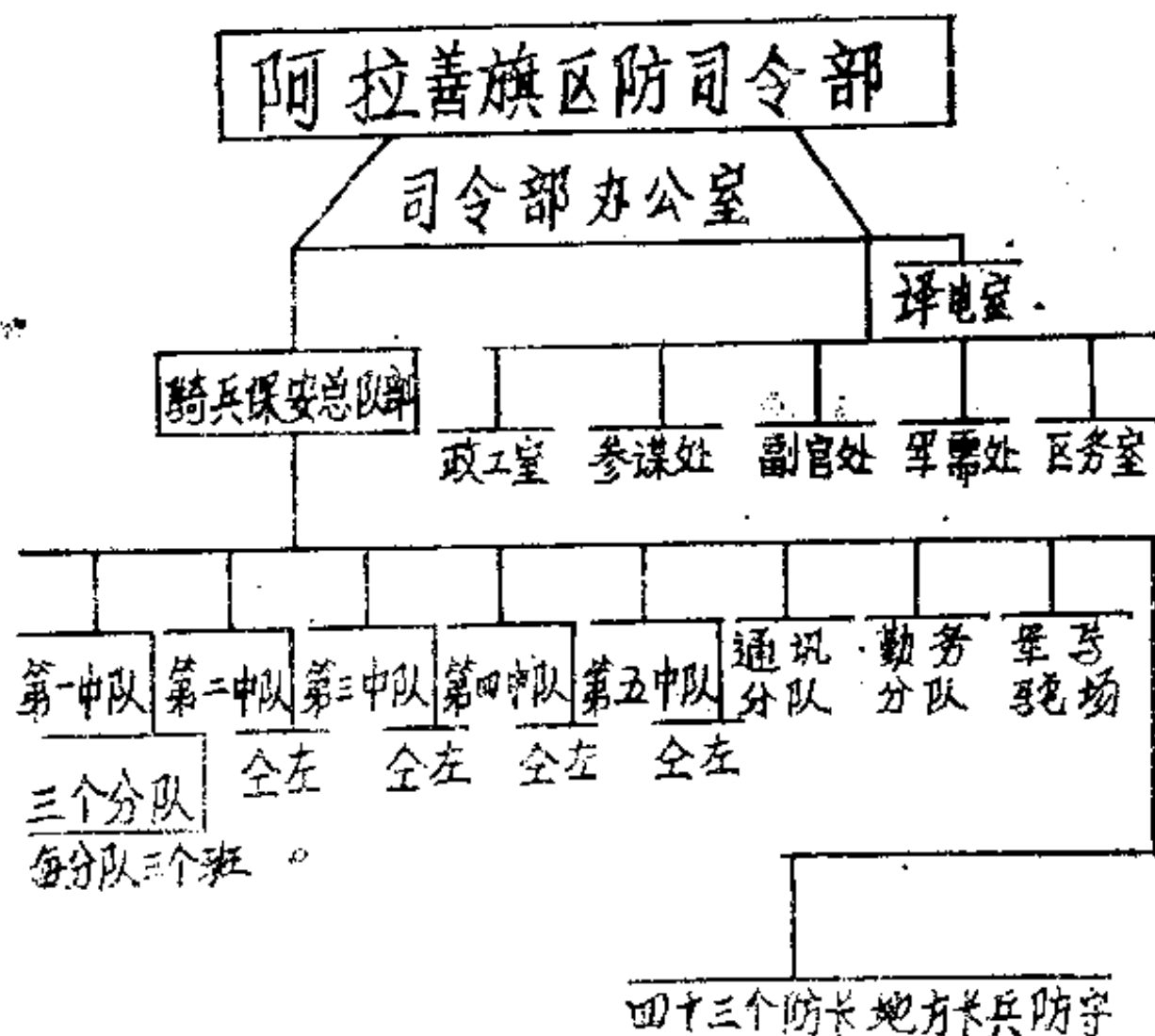
骑兵保安总队是一个地方部队。但是军官须由西北长官部任免，并报请国防部备案。军饷、粮秣、武器装备全由国防部批示后，由西北后勤处供应。它的原定编制是一个骑兵团，后来又计划扩编为一个骑兵师，达理札雅认为地方兵员奇缺，如果扩编势必影响牧区劳动力，使生产受到影响。因此，扩编计划未能实现，仍保持一个骑兵团的编制。

骑兵保安总队下属五个中队，一个通讯分队和一个勤务分队。第一中队少校中队长为杨富存，上尉副中队长为罗福禧。第二中队少校中队长为陶光锐，上尉副中队长为马怀章。第三中队少校中队长为范·乌图那笋，上尉副中队长为陶意乐。第四中队少校中队长为罗·都古尔札布，上尉副中队长为毛得功。第五中队少校中队长为罗步云，上尉副中队长为杨宝福。通讯分队上尉分队长为张元懋。勤务分队上尉分队长为王振华。

骑兵保安总队总队部的官兵不轮换。每中队下属四个分队，士兵四个月轮换一次。遇有紧急任务时，全部回营待命。骑兵保安队在册的现役兵额为三千余人，马一千二百余匹、骆驼一千五百余峰。配备无线电台七部，电话若干，主要军

事部门都能通电话。

骑兵保安总队的武器，1938年正月被马鸿逵部劫去大部分，后经八战区出面调停，只交还了一部分，而且都被换成了废旧步枪。这次重建武



注：骑兵保安总队部官兵不轮换，各中队官兵四个月轮换一次，一旦有紧急任务时，全部回营待命，骑兵保安总队现役兵三千余人轮换服役。

各防卡、各巴格服兵差役名额为五千人。



装后，曾有人主张按编制充实骑兵总队，并集中训练，但遭到达理札雅的反，他说：“上次的伤疤还没有好，又想给人家送礼了吗？”坚持把主要力量放在各巴格和边防哨卡上，总队部只留两个中队、通讯分队及勤务分队。

阿旗北部与外蒙接壤，边界线长五百余里，为严防外蒙入境活动及旗民越界外出，阿旗政府原在沿边境设有防卡巡逻，以防不测。达理札雅回旗后，除加强原有边卡哨所外，还另外增设了两处，边境事件明显减少。

#### 第六节 整顿财政经济

阿旗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牧业包道税、盐租、皮毛生产、冰碱及土特产的生产等。达理札雅整顿财政经济的主要手段，一是改革财政制度；二是减免包道税以苏民困；三是增加盐池租金以充裕财政；四是经营煤矿、碱矿、增加皮毛出境税等，以增大财政收入。

##### （一）改革财政制度

1932年以前，阿旗政府（印房）有两仓（仓即管理财政的单位），即旗仓和军需仓。

1945年改组政府时，将旗仓和军需仓合并为财政处。此外，并将王爷的财产与旗财政分开。王爷的财产叫“木图尔仓”，为私人财产，有牲畜、房产、佃地、商号等，由王爷和王府总管，

指派专人管理。王爷每年有三千元（现洋，下同）的补贴，由旗财政处拨付。福晋、阿哥、格格，依靠财产收入维持用度。王府的使用人员及厨师、饲马等人员的工资，另由财政拨款。卫士、副官在区防司令部编制内发饷。从此，结束了旗政府财政与王府财政不分家的老规矩。使旗财政开始步入了正轨。

## （二）收回三盛公天主教堂侵占的土地

三盛公天主堂占据的大片耕地，在1935年进行清理时，因当时正值与马鸿逵为磴口设县的问题进行斗争，故未收回，且允诺教堂继续使用，已逾十年。为收回全部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增加旗财政收入，1946年6月10日达理札雅指派以梅林章京陈·那笋巴图为主任，旗政府政务处处长白诚禧、副处长罗永寿为副主任和四坝、磴口总管、四坝防卡“达木尔”、中队长杨富存以及巴格边官、防卡官兵共七十余人，组成收地仗地工作团到达三盛公，与教堂本堂神甫樊静安、主教王守礼、包德恩、郝鹏汉（都是比国人）等举行会谈。樊神甫向工作团交待了他们所占的地段和耕地面积，除了沙边地、河滩地、盐碱地外，可耕地面积约四万亩左右。提出要求收地时给三盛公、补隆淖、渡口堂三处教堂留地三十顷维持用度。经报请达理札雅同意后，

将其余耕地全部收归旗政府所有，分给农民耕种。决定每年按四六分成向巴格政府缴纳地租。

丈量土地是用骑马拉绳的办法，根据农民的要求除留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的草边、碱边地外，其余作为实有耕地。总之，这次收地、丈地工作，使阿旗收回了土地主权，也增加了财政收益。

### （三）发展盐业生产

阿拉善旗有号称“聚宝盆”的大小盐湖多处，犹如璀璨的明珠嵌在广阔的大地上。盐湖皆天然形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已开采的较大盐池有吉兰太盐池、和屯盐池、察汗盐池、雅布赖盐池等四大盐池。其中以吉兰太盐池盐质最佳，产量亦最高。据传吉兰太盐池开采已有一千多年历史，清朝康熙年间曾将吉兰太盐池赏给鹅掌公主为私有财产，一直到达理札雅时期，均由阿旗自行开采，以后始由旗财政管辖。其它三个盐池多年来都是由官商合资的西北盐务局经营开采，阿旗只收取池租（与旗府签订租用合同），绝大部分利润均为盐务局所得。对此，达理札雅也采取了措施，他设立了自己的盐务所，派陈·爱尔德尼巴图为所长，自行经营开采。其它盐池因资金、人力不足，无力开采，仍租给盐务局经营。

盐池租是阿旗地方主要财源之一，达理札雅一贯重视盐务工作。盐务上挖盐、运盐两项占牧民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占旗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因此，达理札雅即使在移居兰州期间，也从不放松对盐务的管理。例如：1940年8月20日他给旗政府的电示说：“旗政府公鉴：农历8月31日函禀均悉。兹特按原禀各条分别示复于下：关于西北盐务局来函，规定入仓吉盐每担给予成本洋一元八角等语。此乃于局长利用政治手腕的挑拨办法。试思较之过去仅增二角，如何以维持？现既未经本旗承认，自不能为定案。本王在兰为吉盐事，迭经向陈局长、赵帮办交涉争持，已承慨允增加吉盐每担五角，计共合成本洋二元一角。本王意关于蒙驼脚价除由盐务所照过去规定照付外，并将此项增加之洋五角，悉数加入蒙驼利益计，于盐务所方面并无好处。但盐务所为保全本旗权利，不得不委曲求全，勉力办理。详情已面告大协理等，到时自能明察一切也。至宁夏盐务局实派盐巡至吉兰太盐池一事，应予严行拒绝。除本王向总局交涉制止外，并仰速向新任董局长接洽，请其令飭将盐巡调回，因董局长此次赴宁，系为以和平方式办事而去，如有问题，自较于局长易于解决也。……”

由此可见达理札雅对于盐务和牧民在盐务上收益

的关心。

驮盐是牧民一大收入。有些驼户是专门为了驮盐的，若一家每年出十六峰好驼去吉兰太至磴口间驮盐，一年驮四次，每次每驼可驮三百斤盐，每一百斤得脚钱一元九角，十六峰骆驼驮一次便可得脚钱九十多元，一年四次计收入三百六十多元（都按银元计算）。

没有骆驼的贫牧民，也有到盐池捞盐作副业生产的。捞一驮盐的工资为一角，一驮盐约六桶左右（每桶约五十斤），有一天能捞三十驮左右的，可得三元收入。

#### 阿拉善旗十三盐池方位表

名称	距巴音浩特里程方向	种类	所属苏木
吉兰太池	距巴音浩特一百五十里	红盐	吉兰太苏木（吉兰太镇）
雅布赖池	西五百余里	青盐	雅布赖苏木（阿右旗）
察汉布鲁克池	西南三百余里	白盐	察汉布鲁克苏木（阿左旗）
包鲁池	西南三	白盐	察汉布鲁克苏木（阿

	百余里			左旗)
哈拉增	东北二	红	盐	乌伦布鲁克苏木(阿左旗)
桃立池	百余里			
和屯池	西北二	红	盐	好斯布尔都苏木(阿左旗)
	百余里			
同湖池	南部四	白	盐	腾格里苏木(阿左旗)
	百余里			
吉诺古	西南二	白	盐	察汉布鲁克苏木(阿左旗)
图池	百七十			
	里			
巴音达	南一百	白	盐	巴伦别立苏木(阿左旗)
赖池	余里			
大鼓海	西七百	青	盐	巴丹吉林苏木(阿右旗)
池	七十余里			
下浪图	西一百	白	盐	察汉布鲁克苏木(阿左旗)
池	五十里			
巴音奴	西一百	白	盐	察汉布鲁克苏木(阿左旗)
尔池	八十里			
札嘎图	西南二	红	盐	察汉布鲁克苏木(阿左旗)
池	百七十			
	里			

(四)开发煤矿、碱矿和其它土特产  
贺兰山一带煤的储量十分丰富。多年来也是

由富户、把头承包开采，从中牟利，而旗上则没有什么收益。因此，达理札雅便对煤矿加以整顿，将产量最大的河拐子即乌达煤矿收回，由旗政府派员经营开采。其它几处较小的如呼鲁斯太、古拉本煤矿，仍以合理租金包给私人开采。所以，煤是阿旗又一个财源。

巴丹吉林沙漠中蕴藏着丰富的土碱（即冰碱），由于四周环沙，交通困难，从未开采利用。1945年春，方由阿旗政府组织人力勘查开采，并成立土产商行经营土碱产销业务，运往甘肃河西各县及兰州等地销售。

阿旗还盛产中药药材：苁蓉年产约五十万斤；甘草年产约一百二十万斤；锁阳产量也很丰富。

另外，本旗野生资源很丰富，大的有野牛、野马、野骡、野驴、野骆驼等，还有獐鹿野羊种类很多。所以还可以打猎当作副业生产。一般允许的猎物有狐、兔、獾、狼、獐、猓、黄羊、盘羊、青羊、天鹅、鹤、雁、野鸭等。但一般不准打鹿和麝。较难打的是猓，价廉的是青羊，较多的是黄羊、狐、兔和野雉。

1945年以后，旗政府对这些方面也加强了领导，鼓励牧民从事狩猎生产。

#### （五）减免包道税

阿拉善旗的包道税（牧业税），原来以大畜和小畜的头数决定税收。达理札雅时期改变税收的办法为：（1）牧业税以牲畜若干划分税额，贫困牧民免税；（2）牧民自己报包道税数额，“巴格达”（边官）评议，派去官员作决定后，记入包道税收帐目，每次收包道税时评定一次。收包道税的款额，根据旗财政情况和年景，由旗政府决定当年税收。达理札雅由兰州回旗（1944年）那年，正赶上干旱，牧业生产遇到困难，即由旗府派人分赴各巴格去实际调查，接受灾轻重，分别减免包道税一年（1945年）。与此同时，对过路草头税，即对由新疆、青海过境至包头的骆驼，年约八百峰左右，每峰骆驼收草头税二角，年收一万六千元。外省牲畜草头税，羊约四十万只左右，每只收税五分，计二万元，牛马骆驼十万头左右，每头上税一角五分，合洋一万五千元，亦根据草场情况予以增减。总之，达理札雅对财政问题的想法，是以增加盐租和各种税收为主要措施，尽量减收包道税，以减轻蒙民的经济负担。例如：1945年为防止畜产品走私，规定皮毛出境，一律以价征收百分之五的出境税。再如对定远营市场，也参照邻近各地税收办法，制定合理的税率，向商民征收一定的税金。



由于采取了上述各项措施，使阿旗的财政面貌大为改观，收入增加，生产亦随之发展。

### 第七节 兴办学校

在达理札雅执政前的阿拉善旗，从来没有过学校，识字的人也非常少。除政府官员一般能粗通文字外，在全旗牧民中有文化的人不多。民国初年，只在定远营有三四名蒙汉文私塾老师，设立私塾授徒；再就是旧印房有“达司呼尔”（即练习生制），选拔旗里青年到衙门学习蒙文，成绩好的可充当下级官吏。除此再无别的教育设施。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起，达理札雅着手兴办教育事业，在定远营设旗立完全小学一所，内分蒙汉两部分，学制为初小四年，高小二年。任命蒙汉文兼优的公爷塔旺策林为校长，聘用蒙汉文教师数人任教师。所授的课本，汉文是教育部颁行的白话文标准本，蒙文教材仍用旧本教读。在王府内设初级女子小学一所，由福晋金允诚亲自担任校长。其后在定远营又设立了一所蒙文小学，专收牧区儿童。另在磴口设立了磴口小学一所，在渡口设渡口小学一所，在四坝金堂庙也设了一所小学。

1944年达理札雅由兰州回旗后，提经旗务会议研究决定：（1）将蒙文学校和女子小学

合并于旗立小学，集中力量，办好学校；（2）筹设初中预备班，以解决小学毕业生升学问题；（3）保送有条件的青年赴内地升学；（4）修建一所由小学到初中可容纳五百名学生的校舍。这些决定经过两年的努力，都已先后实现。旗校合并后，除原有教师八、九人外，还向绥宁师范聘请了五名教师充实了教学力量。1945年冬，初中预备班正式开学上课，先后保送十余名学生分赴兰州、西安、黄渠桥等地升学。1946年，在定远营西花园修建的可容纳五百学生的新校舍完工落成，定名为“阿拉善旗蒙文学校”，从此，阿旗教育事业开始发展起来。

#### 第八节 改革宗教

阿旗的牧民在清王朝统治下，蒙族人民都信奉喇嘛教。全旗有大小二十四个寺庙（其中有名的有八大寺），喇嘛三千余人。达理札雅执政后，遵循其先父塔王的遗训，“限制喇嘛，以繁衍人口”，在1945年以后，采取了以下措施：（1）牧民独子不得当喇嘛。有二子者须经旗政府批准，方能有一人入寺当喇嘛。有三个儿子以上者，由其父母自愿可送一人入寺；（2）在寺的年轻喇嘛自愿还俗者，由本人或其父母申请旗政府核批；（3）凡年龄在三十岁以下的喇嘛申请还俗者，旗政府鼓励优先批准，寺庙不得

阻挡。在此政策影响下，各寺庙的喇嘛人数有减无增。

1946年秋，曾抽调各寺庙的年轻喇嘛（十八至二十五岁）分期参加军事训练，每期三个月，由骑兵保安总队担任训练任务，三期受训喇嘛共三百余人。采取这一措施，是为保境安民，培养后备兵力。除此之外，旗政府还明令废除寺庙的奴隶制，保障了人权；解放了劳动力。

### 第九节 被召进京述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0月，达理札雅被召进京述职。他到达南京后，由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罗良鉴和蒙事处长楚宝青陪同谒见了蒋介石及其他军政要人如蒋梦麟、陈立夫、陈果夫等。会见中达理札雅要求中央给阿旗补助教育经费，充实骑兵保安总队武器。蒋介石虽然当面允许给予解决，但事后经与有关部门多次接洽，都无任何结果，落了个空手而回。达理札雅不满地说：“什么建设边防，什么民族平等，都是空话。”

### 第十节 其它政治活动

#### （一）处理与甘肃省划界问题

阿旗边界于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初次划定。1686至1953年二百六十七年中又划界七次，但边界纠纷仍时有发生。与阿旗

界线有纠纷的县有民勤、张掖、武威、山丹、高台、永昌等六县，其中以民勤县纠纷最多。因民勤地瘠民贫，人口众多，而阿旗有大片水草丰腴的土地，被民勤县群众放牧耕种。县政府便实行行政管理，并说阿旗属地为民勤县属地，因而经常发生纠纷，甚至动枪抓人。1938年达理札雅到兰州之后，曾与甘肃省主席谷正伦进行协商，双方议定，对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应以抗战救国大局为重，只能由各县与阿旗商洽分期分段解决，并决定自1943年开始办理。进行了划界，暂时缓和了纠纷。

1944年，民勤县又派来县参议长王伯龙等到阿旗协商放牧、打草、打柴问题，双方议定将苏武山、二狼沟山、马山、半个山、马王庙、红沙岗子线向阿旗伸展的部分暂作为民勤县牧场，具体边界线的划分，嗣后由省旗县派人调查后再作决定。但问题并未就此结束，纠纷仍不断发生。1947年，阿旗上诉于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派军令部边务处上校参谋楚宪禄为代表前来仲裁，使纠纷又趋于缓和。

## （二）举办国大代表选举

1947年七月，国民党政府举行全国大选，除选举总统、副总统外，还应选出国民大会代表两千余名，立法院委员四百余名，监察院委

员六十余名。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为全国蒙旗选举的总监督，地处边远的阿旗亦成立“选举事务所”，以达理札雅为选举监督。按名额分配，阿旗应选出国大代表一名；立法委员一名；与额济纳旗会同选出监察委员一名。全部候选人由达理札雅指定。结果选出达理札雅的亲信部属陈·那笋巴图为国大代表，达理札雅的三弟达穆林旺楚克为立法委员，达理札雅倚为心腹的国民党阿旗特别党部书记王枕华为监察委员。

## 第九章 率领阿拉善旗和平起义

### 第一节 北平和平解放对阿旗的影响

#### （一）王府会议

一九四九年元月三十一日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将军起义了。傅将军的行动，给愿意摆脱国民党反动统治，希望弃暗投明的人们，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当时，全国的形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军事上的有生力量，正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全国进军，所向披靡，势如破竹，迫使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向广州、台湾方面逃跑。

在这风云变幻异常迅速，全国解放迫在眉睫

之际，国内各阶层有识之士，逐渐地看清了国民党丧失军心，丧失民心，失败已成定局，而全国解放，早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时候。对于当前局势所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每个人无不认真地在进行思考。

但是，国民党残存在西北的反动势力，他们坚持反动立场，企图进行负隅顽抗，垂死挣扎。宁夏军阀马鸿逵之子马敦静就是其中的一个。马敦静将他指挥的十万兵力，分布在宁夏境内黄河两岸，妄想抗拒宁夏省的解放。同时，他还加强了驻在阿拉善旗定远营的兵力，由过去的一个工兵营，重新部署成为加强特务营。这个营配备了具有新式装备的五个整连，还附属一个小炮排。这部分兵力，在营长孙明楼的指挥下，执行着防备阿拉善旗人民在他们后方发动游击战的任务。

面对当前形势，阿拉善旗札萨克达理札雅也在认真地考虑自己将如何办？当时，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他率部同全旗各族人民起义，站到人民这方面来；一条是自己携眷外逃，追随国民党反动派到底，走与人民为敌的道路。何去何从？他感到犹豫、徬徨，举棋不定。但在思想上，他倾向于前一条道路。

一九四九年刚过春节后，达理札雅与本旗协理罗·巴图孟柯、章京陈·爱尔德尼巴图三

人，在对时局交换意见之后，决定召集本旗军政人员，共同商讨阿拉善旗的前途和命运。农历正月二十一日（二月十七日），他们召集了达穆林旺楚克（达的三弟）、罗瑞光、段·巴图尔、左·甲木英、罗永寿、白诚禧、陈·那笋巴图等旗府官员在王府里开了一次重要会议。

会上，达理札雅说：“当前国共两党的战争，越打越明显。总的来说，国军失利，共军胜利，国民党最后逃往台湾的趋势，已了如指掌了。今年北平的和平解放，这是人们意料不到的变化，但这给人们指明了今后该走的方向。近据我旗驻北平联络员徐厚田托人向我汇报，北平解放后，全国各界知名人士、各民主党派和起义将领都表示拥护共产党，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其中有很多人，是我的亲朋好友。这些人具有远见卓识。既然他们拥护共产党，自动地站到共产党那方面去，这就充分地说明了共产党的作为是深得人心的。从这里，我们多少也能了解到一些共产党的情况。面对当前的局势，我旗究竟应该怎么办？走哪条路好？请大家谈一谈。”

会上陈·爱尔德尼巴图说：“我旗自从1938年被马鸿逵占领后，始终处于受军事管制的地位。目前的形势虽然对国民党十分不利，但在宁夏地区，马家军利用贺兰山这道天然屏障，进行

挣扎的可能性大，这样一来，我旗人民恐怕要遭受涂炭，我们不能不早作防备。”

“其次，我旗的官府和人民，一向没有和共产党作过对，也不是什么反共势力。至于李子元与胡开科（二人均系共产党嫌疑）被捕事件，完全是在国民党‘军事专员办事处’的指示下，由特务们下手干的。此事不仅有案可查，而且有的人还活着，足可以证明我们是没有任何责任的。”

“再说，我旗一向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保持着友好关系，他们的侦察人员，经常进入我旗探听情况，我们始终都在保护他们，使他们胜利完成任务”。

“另外，马鸿逵军事占领定远营，并将我旗札萨克软禁在兰州达七年之久，致使我旗旗政陷于瘫痪状态，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我想共产党不会不知道这些历史吧。因此我认为共产党来了，对我旗的军政人员不会有什么伤害，我们应该准备迎接共产党。”

罗·巴图孟柯除表示赞成陈章京的意见外，并说：“现在怕就怕马家军在贺兰山以北拉开战场。要是那样的话，我旗的老百姓就要被吃光、抢光了。至于共产党来的话，我们怕也不行，跑也不行，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共产党投诚，热烈地欢迎人家，只有这样，才能不使人民生命财产遭



受损失”。他又说：“据从山西和北平来的买卖人说，共产党并不象国民党说的那样可怕”。最后他提出：“根据形势的发展，我们要有两手准备：一方面要秘密、认真地作好迎接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准备；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记取马家军的突然袭击定远营的教训，要严密的监视马家军的动向，作好防范工作。当务之急，应该把府内的财产、粮食、武器弹药、历史档案等重要物品，立即向巴丹吉林大沙漠内转移。估计马敦静的队伍由黄河沿线败退下来，一定窜入贺兰山作垂死挣扎，这样以来，定远营就成为必争之地，以作他们的当然司令部了。现在马家军以换防的名义，把原来驻在定远营的工兵营换成特务营，这个营管辖着五个整连，相当于一个团的建制。在他们阴谋诡计面前，我们绝对不能丧失警惕。当前，对付好马家军，就是保护了阿拉善旗。”

紧接着达穆林旺楚克发言。由于他受国民党反动派宣传的毒害较深，对共产党心存疑惑，因而始终主张逃走。他说：“我看能走的话，我们还是早些走嘛；不要等共产党来了，谁也走不出去，那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最后，左·甲木英表示：“在我们牧区，除了牲畜以外，再没有什么财产，想走也没有地方

可走。我们和从东北来的蒙古人不同，他们同共产党对立打仗，惹下了人家，结下了冤仇，人家进来哪能不收拾他们呢。我看过成吉思汗西征的历史，凡与成吉思汗为敌的国家，战败后都要遭到杀戮，但向成吉思汗讲和投降的国家，不仅原封不动地保持了疆土，还受到大汗的封赏”。

“北平和平解放了，听说傅作义仍然是傅作义，仍不失为上宾之位。这说明，只要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诚起义，就会有出路的。因此我主张，我们阿拉善旗争取和平解放。至于打仗一节，那是马家军的事情，我们不去管它。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尽量设法避免使全旗人民大众遭受灾难，以等待人民解放军的来临。能做好这些事，就是我们给全旗人民立下的功劳”。

会议结束时，由达理札雅归纳出四项意见，请大家遵守。第一，要努力保持稳定，旗政府、旗区防司令部绝对不能迁动，必须坚守定远营；第二，关于迎接共产党的事情，要绝对保守秘密。如走漏了风声，国民党特务机关和马家军是有足够的力量来收拾我们的；第三，要想法与北平的载涛联系，听一听北平方面的动静；第四，要紧密地观察形势的发展，绝不能轻举妄动。

在这次王府召开的商讨会上，大家一致的意

见都是不愿意离开家园，抱有死也愿死在故土的决心。共同的希望是：阿拉善旗能够早日得到和平解放，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就算万幸了。但由于对共产党了解不深，对党的政策也不清楚，究竟共产党来了将是什么样的局面，大家心里还是惴惴不安，在表情上，都流露出一种惶惑、迷惘的神态。唯达穆林旺楚克坚持怀疑态度，他始终认为走为上策。

## （二）坚定地与反动势力作斗争

从王府会议后，阿拉善旗政府的主要官员们，心里都有了底，从而沉着冷静地应付各种事态，这不能不引起驻在定远营的国民党人员的怀疑。他们看到阿拉善旗政府对共产党的态度非常沉默，既不造反共声势，也不作反共准备，感到其中大有文章。乖滑一些的，如“蒙古自治政府”部分官员德古来、乌古廷、扎奇斯钦、吴鹤龄等人，预感到大事不妙，乘机飞往兰州一带逃跑。死心踏地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的特务分子，则企图阻止阿拉善旗起义，他们大造谣言，蛊惑人心。说什么：“蒋介石在重庆重整军事力量，三个月内反攻回来”；“美国要出兵了，英国军舰已经开到了吴淞口”。还有个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曾出面召集阿拉善旗军政人员训话。在训话中，他指天发誓，痛哭流涕地说：“你们不

能动摇，坚持就是胜利。蒋总统绝有神策……”。

随同德穆楚克栋鲁普来定远营搞蒙古自治活动的反共分子敖木巴特尔等人，到处张贴反共标语，歇斯底里地狂喊：“戡乱必胜”等陈词滥调。这些反共活动，造成的影响极坏。后来达理札雅通过白海风向他们提出警告，才制止了这种反共行动。

美蒋特务达瓦敖斯尔，携带电台若干部，经常与美国新闻处联系，大搞情报活动，乃至在定远营立脚不住时，他又跑到阿拉善旗边界上，企图在牧民中间煽动反共情绪。但由于旗府控制的严密，他的活动未能得逞，最后逃往蒙古人民共和国去了。还有一些没有来得及外逃的特务分子在阿拉善旗起义后的1949年9月25、26日，将国民党阿拉善旗特别党部的文件、档案全部烧毁，企图给阿拉善旗和平起义抹黑。

尽管一小撮反共分子在定远营街头声嘶力竭地制造反共气氛，张贴反共标语，但在阿拉善旗政府的严密控制下，反共谣言止于市区，没有散布到牧区去。因而，广大牧民听不到反共宣传，仍然安安静静地从事着生产与生活。

控制城镇，稳定牧区，这是一件重要的事，对为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做准备，不能不说是一个

精明的决策。但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阿拉善旗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仍然处在被各种反动势力包围之中，上下左右的反共势力不断地纷至沓来，以达理札雅札萨克为首的旗府官员们，无时无刻不在竭尽全力与之周旋、应付，甚至开展斗争。举其大者约有：

### 1、巧避马敦静纠缠

一九四九年六月中旬，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打来电话，请达理札雅去银川面商要事。对此，达理札雅当即召集协理罗·巴图孟柯、章京陈·爱尔德尼巴图，以及段·巴图尔等旗府官员十余人开会，会上大家共同研究和分析了马敦静的意图。

最后，达理札雅表示：“马鸿逵要到兰州接任甘肃省省长或者西北副长官的职务。老子走了，儿子继位，马敦静当然要执掌宁夏省的军政大权了。现在马家军在三边失利，已退回宁夏。这次准是重新作军事部署，估计找我去，一定是在阿拉善旗身上打主意，现在我去顶住他”。

考虑到马敦静与达理札雅会谈时，一定涉及到有关军事方面的问题，因此，他带领旗区防司令部参谋主任李文钦、骑兵保安总队副罗永寿二人去银川。乃至抵达银川时，马敦静因去吴忠不在，由省政府交际处李处长出面接待。

第二天下午，马敦静来会见了达理札雅。见面时，他很谦虚，寒暄过后，他说：“主席（指马鸿逵）已经到了广州，不久即将去兰州接任。关于宁夏的军政事务，仍然按照主席原来的部署进行。今天请阿叔（达与马鸿逵为盟兄弟，故称阿叔）来银川，主要是商议两件事：一件是，请贵旗给我们支援军马三百匹。因为胡宗南部队在关中一带失利，派马继援的兵力去支援还不够，又要调宁夏兵团的两个师增援关中地区。由于部队马匹不够用，请予支援。另一件是，请贵旗给我们支援运输工具，我们准备在贺兰山里构筑防御设施，为了使军用物资预先向阿拉善旗的三关、南寺、北寺、代开、定远营等处输送，要求贵旗承担起这项紧急任务，支援全副鞍具的骆驼一千峰。”接着他以命令的口气又说：“由于战线太长，运输工具奇缺，为保证战争顺利进行，贵旗有责任，也有义务派出驼马支援前线，以便取得最后胜利”。

达理札雅在听了马敦静的谈话后，经过半天的思索，才答复说：“关于军长的要求，我个人不便作主，等我用电话与旗府人员商量以后再行答复。”随后，达理札雅与罗·巴图孟柯通了电话。在电话中，罗·巴图孟柯说：“这事情我看不能完全拒绝马敦静的要求，因为怕事情闹僵

了，双方都不好下台，会给我们招致更大的压力。我认为现在只有采取应付和拖延的办法来对付他们。咱们可以先答应给他们支援军马一百匹，其余的事，慢慢再说。”

第三天，马敦静带领他的辎重团长马文炳一块来拜会达理札雅。一阵客套后，达理札雅对马敦静说：“关于军长要求我旗支援驼马一事，昨天我在电话中已经和旗里人员商量过了。现在从牧区征集骆驼和马子，确实有困难。因为天旱，大畜膘情奇乏，拉不回来。再说，目前正在放场抓膘季节，骆驼也不好收集。我们的意见，等秋后牲畜膘情好转时，当尽量给以解决。为了支援当前的战事，我们设法先从旗骑兵保安总队部的军马场里，给支援军马一百匹，以应急需”。听了达理札雅的话后，马敦静思索了一会。才说：“既然如此，暂时也只好这样吧”。后来，在交付马匹时，保安总队部只交给他们七十匹战马，不足之数，说明到秋后予以补齐。

为了给在贺兰山搞防御设施作准备，马家军使用了自己的运输骆驼，断断续续地向阿拉善旗南寺、北寺，运来了军粮四十余石。其后，由于运输力缺乏，没有再运。这样以来，马敦静企图在贺兰山修筑防御设施，负隅顽抗的计划，在阿拉善旗的应付、拖延下，没有能够实现。同时，

也使广大牧民避免了一千峰骆驼与二百三十匹马子的损失。

## 2、同徐永昌周旋

一九四九年七月份，国民党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由广州飞到宁夏地区活动。他来到银川后，用电话请达理札雅去银川和他见面。当时：达理札雅和白海风、达穆林旺楚克等人去银川与徐永昌会晤。

见面后，徐永昌首先谈了一下当前国内的形势和他视察宁夏地区军事部署的情况，即向达理札雅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关于马家军在贺兰山的设防问题。这事至关重要，阿拉善旗必须予以大力支持，以便使贺兰山的防御设施早日建成。第二，关于阿拉善旗保安部队与新一旅的配合问题。此事必须抓紧进行，以期在贺兰山以北开展草原游击战。至于武器弹药以及一切军用物资，可以空运补给。只要坚持三年，国军便能反攻回来。最后，徐永昌再三拉拢达理札雅去台湾，并强调，住在大陆上有危险，人身、财产都不安全。

当时，达理札雅表示谢绝去台湾外，并分别答复了另外两个问题。对第一个问题，他说：

“贺兰山里没有人家，而且饮水奇缺，大军入山，吃水问题无法解决。依我看军事设施不易建立，



如若建立，必先开发水源。可是即便军事设施建立起来了，假如黄河防线失守，贺兰山也无法把守”。第二个问题：“贺兰山以北，那是一望无垠的戈壁沙漠，吃粮、饮水万分困难，绝对开展不了什么游击战。”

会见时，马敦静和宁夏省的一些要人也在座。达理札雅发言后，马敦静也发表了意见。他说：“你们蒙古人在生产和生活上流动性很大，不象农民稳定。假如牧民搬走了，留下来四无人烟的草原和滚滚袭来的流沙，对军事行动大有阻碍。再说，沙漠中的地理复杂，气候变化无常，首先是交通不便，这对开展游击战争极为不利。此事要从长计议，不能冒然从事。”

徐永昌在听到这些不利因素后，默默沉思，没有作出什么反应来。同时，对于宁夏地区的军事部署，也没有再提什么新的意见。他只是劝告宁夏省的军政人员们要坚定信心，不要动摇，把“戡乱”大业进行到底，坚持三年，就是胜利。

经过这次商讨，关于在贺兰山里设防和开展草原游击战等问题，便被搁置起来，以后没有再提。

九月十九日，徐永昌由绥远回到了宁夏。达理札雅又去银川拜会了徐永昌。他们这几次见面没有谈政治和军事问题，徐永昌只是一个劲地拉

拢达理札雅去广州，但都被达理札雅婉言谢绝了。可是达理札雅的三弟达穆林旺楚克却被徐永昌的甜言蜜语所迷惑，表示愿意去台湾，于1949年9月19日，带上小老婆与徐永昌同机飞走。达理札雅在送走徐永昌后，才返回阿旗。

## 第二节 “蒙古自治政府”的开锣与收场

1949年春末夏初，德穆楚克栋鲁普来到了定远营。随之，一些蒙旗的王公、喇嘛以及在国民党地区的蒙古知名人士白海风、巴文峻、何兆麟等人，也都接踵而来。他们来阿旗的目的，主要是利用当时在西北各蒙旗具有崇高威望的达理札雅的地位和当时尚称平静，而地位又适中的阿拉善旗定远营，继续搞“蒙古自治”活动。

四月中旬，这些人在定远营正式举行了内蒙各旗代表会议，会上决定成立“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筹委会建立后，经过多方活动，七月间，才由蒙藏委员会转来由国民党行政院院长阎锡山签署的准予召开“蒙古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蒙古自治政府”的命令。于是，他们在八月五日至十日召开了“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并选举了德穆楚克栋鲁普为“蒙古自治政府”主席，达理札雅为副主席；吴鹤龄为参议会议长，陈·那笋巴图为副议长；正式成立了“蒙古自治政府”与“参议会”。出席代表一百七十五人，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宁夏省主席等西北军政机关都派来代表，以来宾身份参加了大会。

关于德王在定远营成立“蒙古自治政府”这件事，达理札雅曾向旗府官员们表示：“他们（指德王一伙）没有地盘了，才跑到我们阿拉善旗来搞蒙古自治。在这里需要我向大家说明的是，德王来我旗，不是我请来的，是他们自己自动来的。由于他们是搞蒙古民族的自治运动，题目光明正大，对我们来说，支持他们的活动，也是义不容辞的事情；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他们。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我们支持蒙古自治活动的同时，要绝对保持阿拉善旗的独立性，不能让他们插手或参与我们的旗政。”基于上述观点，当时阿拉善旗只派出达穆林旺楚克充当全权代表，参加了“蒙古自治政府筹备委员会”，其他人员没有参加这件事。

实际，对于德王一伙的到来，确实给达理札雅添了两种心病：一种是，在全国行将解放之际，他怕以反共出名的德王在定远营把事情闹大了，搞坏了，影响阿拉善旗的和平解放，这对全旗人民不好交待；再一种是，他怕德王喧宾夺主，用兵力强占阿拉善旗地盘，使之沦为战场。为此，他只好与德王虚与委蛇，并告诫属下提高警惕。

德穆楚克栋鲁普原是一个野心极大的大蒙古主义者。他一向仇视共产党，反对解放军，对当时在中国出现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意孤行，顽固到底。乃至处于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才跑到阿拉善旗来成立了“蒙古自治政府”，妄想利用达理札雅的威望。企图最后在阿拉善旗境内的西北戈壁中，开展游击战争，与人民为敌到底。

德穆楚克栋鲁普的观点与达理札雅所持的和平解放阿拉善旗的观点格格不入。由于看法不同，认识不一致，他们中间常常发生激烈的争论，争论的双方，以德王等人为一派；达理札雅、白海风、巴文峻、何兆麟等人为另一派；各持己见，互不让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向兰州进军，西北地区的局势趋于紧张之时，“蒙古自治政府”人员出现了三种去向，开始分道扬镳。这就是：德古来、吴鹤龄、札奇斯钦等人，搭机飞往台湾逃离大陆；德王一伙奔赴图克木庙，企图在沙漠中负隅顽抗；达理札雅则坐镇定远营，准备全旗起义。

九月二十日下午五时，德穆楚克栋鲁普亲自来到达理札雅母亲的住宅，向太福晋（太夫人）请安并告别，然后带上“蒙古自治政府”的木质印章和木制机关招牌，从定远营东城门出走。对

于德穆楚克栋鲁普的出走，达理札雅未表示挽留。

德穆楚克栋鲁普出走后，蒙古自治政府的人员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追随德穆楚克栋鲁普去拐子湖，在沙窝里打起了“蒙古自治政府”的招牌；另一部分留在定远营，在新改头换面的“西蒙自治政府”，（德王出走后，经白海风等人 与达理札雅商量，把“蒙古自治政府”改为“西蒙自治政府”）里工作。

关于这个“西蒙自治政府”，西北野战军和宁夏军管会一直没有承认，宁夏省领导人，也未对“西蒙自治政府”表态，后来只好把牌子摘掉了。至于“西蒙自治政府”的负责人员，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等人，他们不仅是达理札雅的老朋友，私人关系非常密切，而且在抗战时期，对阿拉善旗有过帮助。这时，看出形势的急转，就积极支持达理札雅所持的和平解放阿拉善旗的立场。因此，在解放以后，达理札雅分别推荐他们担任阿拉善旗人民政府委员和秘书长。

### 第三节 李守信率部西窜与德王会合

1949年9月初，李守信属下的新一旅，由宁夏省陶乐县败退到伊克昭盟的鄂托克旗。九月中旬，他们强渡黄河，进入了阿拉善旗的宗别立、乌达、磴口等地区，并向北寺、水磨沟、定

远营的方向移动。企图利用这块有利地形，与人民解放军继续顽抗。

当达理札雅得知此事后，立即派总管杨宝山（大虎藏武），去新一旅驻地，向旅长苏和巴特尔表明阿拉善旗的态度。杨宝山说：“阿拉善旗已决定和平起义，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早派出代表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去了。因此，不容许你们在我旗境内打仗，要求你们离开此地。”杨又劝告他们说：“希望你们认清形势，早些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降，乃是正路一条。实话告诉你们吧，我们阿拉善旗绝不会与你们妥协，你们休想在我们身上得到什么便宜。”

但是新一旅的头头们，并没有听取杨宝山的话。九月二十日，该旅参谋长白广卿亲自跑到了距定远营不远的水磨沟、薛家佃一带，并打发人到定远营来向德穆楚克栋鲁普请示：“部队已渡过黄河，打算向阿拉善旗北部地区移动，可否？请指示。”当天晚上，达理札雅派罗永寿为阿拉善旗代表，刘桐轩、洛布登为“西蒙自治政府”代表，连夜赶到水磨沟，会见了白广卿。见面时，代表们首先表明了阿拉善旗坚持和平解放，反对在旗境内作战的立场，又告诉他们，德穆楚克栋鲁普已于今天下午由定远营出走，奔赴图克木庙去了。

白广卿答复说：“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听从德王的指示。至于阿拉善旗政府不同意在旗境内打仗一事，我们也保证不了突然发生的情况”。代表们又劝他说：“阿拉善旗札萨克已经派出代表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我旗，你们是否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希早作抉择。”最后，白广卿表示：“德王既然去了图克木庙，那么，我们部队也只好向图克木庙一带集中。至于最后的决定嘛，也只能听德王的，我们作不了主”。第二天，白广卿带上队伍向吉兰太方面出发，奔往图克木庙一带去了。

随着，新一旅的部队也全部向图克木庙一带移动。此时，宗别立、乌达、磴口等地区解除了新一旅部队的扰害，而阿拉善旗北部地区的十个巴格，却又遭受到他们的骚扰。为此，阿拉善地方保安队经常与之发生小规模的战斗，以阻止他们的扰民行为。这样，新一旅的士兵称旗保安队为：“阿拉善八路。”

#### 第四节 宁夏特务营哗变

1949年9月21日晚，宁夏马敦静派驻定远营的特务营士兵发生了哗变。当时，阿拉善旗的骑兵保安总队第二中队、第三中队、勤务分队、通讯分队以及总队部的全体官兵，共有六百多人（全为蒙古族），立即进入阵地，严阵以

待，保卫旗府、王府和定远营市区七千多居民与商号的安全。

在哗变那天的下午，旗区防司令部少校参谋魏文锦侦察特务营的动向后，立即向达理札雅和罗·巴图孟柯报告说：“据住在西花园一带居民反映，特务营的士兵今天十分忙乱。有的兵公开地说：‘要回家的时机已到等语’。看来特务营的士兵要发生哗变。”对此情报，达、罗非常重视，当即命令旗骑兵保安总队部组织人员，部署兵力，要切实保卫定远营市区内机关、单位和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根据上述命令，旗骑兵保安总队部部署兵力如下：

（1）命令通讯分队上尉队长张元尉，立即把各个电话联系线重新进行检查，通讯兵要坚守岗位；

（2）勤务分队由上尉队长王振华，少尉分队长杨宪忠指挥，占领营盘山要害点；

（3）第三中队由少校中队长范·乌图那笋、上尉副中队长陶·恩克那笋、中尉分队长张宏达指挥，全部兵力部署在西关至双山一带，扼制特务营的背后；

（4）第二中队由上尉副中队长马怀章指挥，部署在城墙上的各个掩蔽部内，以防特务营



攻城；

(5) 派出上尉参谋范立宪带队占领南大街至三道桥一带的据点，阻止敌人进入市中心；

(6) 总队部的官兵，由上尉副官王励德、上尉军需主任任春林和中尉分队长魏昭福指挥，保卫旗政府、王府和骑兵保安总队部；

(7) 稽查局的全部武装警察，由上尉队长聂正书指挥，按居民区进行分配，执行保卫居民、商号的任务。

当晚九时，在二更炮响过后，驻在定远营西花园的特务营开始鸣枪哗变。他们原打算在起事后，先抢掠商号、居民，然后再四散逃跑。及至哗变以后，他们感觉到气氛不对，似乎蒙古兵有所准备，自量怕惹麻烦，自讨苦吃，没敢向市区、城里进攻，只在附近稍事掠夺，就分头逃跑了。

当特务营鸣枪哗变之际，该营营长孙明楼曾打电话向达理札雅告急。他说：“我的特务营已经哗变了，请求派兵来帮助稳定局势。”达理札雅答复说：“这件事需要你们自己先作工作，劝告士兵稳定下来。至于别的事，明天我们共同商量解决。”从此，孙明楼再没有来电话。因为士兵要杀死他，他不得不找地方躲藏起来了。

过了一个小时之后，又有人给达理札雅打电话说：“特务营士兵已经哗变了，他们要求旗政

府当夜给每个人发点路费回家。”当时，达理札雅的答复是：“告诉你们的士兵，他们要回家，我们不阻拦，尽管放心走好了。但有一点必须说明，他们不能乱打枪，否则，我就派蒙古兵出城打他们。至于发放路费的问题嘛，那好办，我保证明天给他们解决。”

及至午夜时分，枪声疏稀，人声消失，西花园一带逐渐趋于寂静。这时，总队部派出少尉侦察员范志德带领侦察小组，化装成特务营散兵模样，走进西花园的特务营房内进行察看，然后回来报告说：“在特务营的五个营房内，士兵们绝大部分都逃走了；只有外省籍的士兵，因无处可走，现在还在忙乱着，不知所措。在院内、屋里，枪支弹药丢的遍地，如不及时前去接管，怕被坏人抢去为非作歹。”

据此情况，达理札雅和罗·巴图孟柯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了个紧急会议。在会上，他们分析特务营里的宁夏籍士兵都跑光了，虽剩下些外省籍兵丁，但也自顾不暇，没有什么抵抗能力了。为此决定，派区防司令部副官处上校主任张元忻、骑兵保安总队部军械室上尉主任胡萼业，带领保安队士兵，乘汽车去特务营收集散兵丢弃的武器弹药。计共收回：小连珠步枪二百余支，六零小炮六门，轻机枪二十余挺，另有手榴弹、子

弹一汽车。这部分武器弹药则交区防司令部。由上尉军需科长谢文彬负责保管，以后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移交。

自从特务营哗变，马家军纷纷逃离定远营之后，结束了自一九三八年马鸿逵攻占阿拉善旗定远营达十年之久的屈辱地位，人人无不喜气洋洋，拍手称快！

这次特务营的哗变，由于阿拉善旗骑兵保安总队部事前部署周到，防范严密，致使变兵们的企图没有得逞，只是乱打枪，瞎闹哄，给定远营市区增加了些恐怖气氛，使人心惶惶不安，但没有受到损失。

#### 第五节 防止牧民逃往外蒙

阿拉善旗解放前夕，仍处在被反动势力包围之中，由于形势复杂，处境险恶，旗府当局时刻都在想方设法，竭尽全力，在如此恶劣环境中周旋，与恶势力斗争，以致放松了对边缘牧区人民的安抚工作。

1949年秋季，阿拉善旗北部境内，在巴图吉尔嘎朗等人与德王勾联，鼓动黄·孟和乌力吉和朝格乌其日勒二人出面煽动牧民离旗投奔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计：言鲁乃、拐子、巴丹吉林三个巴格，共走了三十余户，一百多人，赶走了大小牲畜三千多头。

当达理札雅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气愤。他立即召集协理、章京以及旗府官员开会。会上他很难过地说：“由于我们安抚工作做得不够，注意力全放在定远营，以致牧区各巴格的人心还是惶惶不安。近来北部一些巴格的负责人员，在外人的煽动下，未经旗府的同意，竟把一部分牧民和牲畜迁移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去，这完全是不应该的。旗府应立即下令制止，以防止此类事件的再发生。”与会人员一致同意这个主张，随即由旗府拟出训令，发往各巴格、防卡，并要求他们坚决执行。

训令的大意如下：

各巴格、各防卡“达木尔”：“值此非常时期，本旗札萨克与旗政府以及骑兵保安总队部仍在坚守定远营，照常办理旗务，等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到来，以期实现本旗和平解放。

近据报告，本旗边境牧民，轻信谣言，盲目搬迁外流，赶走大批牧畜投入蒙古人民共和国。此种行为实属破坏活动，小则对牧民生产、生活，大则对本旗和平解放，均有不良影响，害处甚大，亟应制止。

为此，飭令各巴格、各防卡达木尔，除在牧区广泛辟谣外，并望切实防止牧民搬家外逃。切切！”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制止了牧民盲目外流行动。

## 第六节 阿旗在迎接和平解放前的准备

### (一) 成立阿旗解放指挥部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加深。达理札雅在王府会议后，一直注视着时局的变化。经过一个阶段的观察与思考，他的思想认识逐渐得到提高，政治态度，也日益趋于明朗化。特别是，当他听到老朋友张治中将军脱离国民党政府，参加到革命阵营中来的消息，这对他的思想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49年3、4月间，达理札雅曾向旗府主要官员们，发表过这样的议论：“根据现在的局势来看，无论走到哪里也是要解放的。目前，西北的大军阀胡宗南已经失掉西安，向汉中一带撤退；西北长官马步芳也准备向酒泉转移；宁夏的马鸿逵正在搬家，准备逃跑；其子马敦静外表上虚张声势，扬言确保宁夏，其实他早已作好了逃跑的打算。现在时局形势瞬息万变，根据形势的发展，将来恐怕任何人想走也走不了啦”。

“我们阿拉善旗与西北军阀们所处的地位不同。他们与共产党仇深似海，不共戴天，所以怕共产党、怕解放军，其实他们怕的是在解放后，

共产党清算他们对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我们和共产党无接触，无冤仇，没有什么可怕的。西北军阀可以逃跑，我们是不能跑的。因为阿拉善旗是我们祖祖辈辈世守的基业，假如我们弃之而去，试问哪里是我们的归宿呢？好在傅作义将军已经给我们作出了榜样，我们要稳住全旗的局势，争取来一个和平解放”。

达理札雅的看法，博得了全体官员的赞成。他们一致认为：“搬家逃跑，绝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只能使全旗陷于混乱，人民受害更深，后果不堪设想。这是愚蠢的行为，是西北军阀们干的事，我们绝不去干。当前我们必须保持全旗的稳定，不能轻举妄动”。达理札雅看见他的意见受到众人的支持，当时高兴地说：“为了阿拉善旗的和平解放事业，我们来一个风雨同舟吧。”

达理札雅的议论，更加印证了春节后王府会议所作决定的正确，争取阿拉善旗的和平解放，已成旗府官员们的共同信念。为了将希望变成行动，在旧历六月二十日（七月十五日）达理札雅提议由旗札萨克、协理、章京和军政官员们秘密成立了一个阿拉善旗和平解放指挥部。其任务是，分头分片负责，稳住全旗局势，为有步骤、有秩序的和平解放作好各种准备。其组成人员为：总指挥达理札雅，副总指挥罗·巴图孟柯、

陈·爱尔德尼巴图。指挥成员有：陈·那笋巴图、罗瑞光、左·甲木英、段·巴图尔、李树德、罗·恩凯巴图、白诚禧、张仁、罗永寿、金·巴图道尔吉等，并分头进行准备工作。

(二)作好全旗和平解放准备工作。

指挥部成立之后，主要作了以下几项工作：

(1)派遣旗骑兵保安总队第一中队长杨富存和副中队长罗福禧负责领导磴口、巴音套海、道兰素海、沙金套海四个巴格和平解放的准备工作。并防备散兵游勇以及不法分子的袭扰和破坏。中队部配备无线电台一部，随时与旗指挥部保持联系。

(2)阿拉善旗西部的雅布赖、艾力布盖、巴丹吉林等巴格，由总管乔英“达木尔”、希日布、布拉兑等人负责加强各防卡的防范工作，并作好所属各巴格牧民的安抚工作。没有旗政府的命令，任何人不得擅自搬家迁移。遇有情况，要及时用无线电与旗府联系。

(3)位于定远营以南的十个巴格，由罗·恩凯巴图、陶·赛尔布吉、马·巴图毕力格，后于九月初，又加派骑兵保安总队二中队少校队长陶光锐，分别负责十个巴格的安定民心工作和加强民防工作。同时，要切实注意加强与甘肃、宁夏两省毗邻各县的防范工作。

(4) 陈·爱尔德尼巴图、金·巴图道尔吉，负责加强克白尔以北八个巴格的民防治安工作。并和第一中队配合，作好磴口、巴音套海、道兰素海、沙金套海四个巴格的治安防范工作。

(5) 白诚禧、图布忻孟柯、苏门地等人，负责吉兰太、宗别立等七个巴格的民防治安工作。

(6) 段·巴图尔、巴格尔、孟和等人负责巴彦诺尔公等四个巴格的民防治安工作。

(7) 左·甲木英总负责、指挥西部古鲁乃、拐子、巴丹吉林、艾力布盖、雅布赖等五个巴格的民防治安工作。

(8) 指派金·对岱和达端都布等人，负责将阿拉善旗库存的银洋三万元和旗府的历史档案，以及其它财产、枪支弹药、粮秣补给，全部运到库列图庙保存，以防马家军的袭击抢掠。并派骑兵保安总队部所属的金藏伍少尉分队长，带领一个分队，坚守这个沙漠古刹——库列图庙。

(9) 由于马家军驻在定远营，因此，将保卫定远营列为重点，全旗精锐部队都部署在这里，以防马敦静新派来的特务营的突然袭击。当时，抽调骑兵保安总队中的第二、第三两个中队，勤务分队、通讯分队，总兵力约为六百余人，驻守定远营，以加强防务。



此外，并紧急通知驻在牧区的各保安中队充实人员，备足枪支弹药，严阵待命，听候调遣。还命令全旗四十二处防卡的士兵，暂不换班（阿拉善旗保安队士兵为义务制，由青壮年牧民轮换执勤，每两月换班一次），以加强民防工作。与此同时，还通知各寺庙青壮年喇嘛，待命服兵役。

防守定远营的两个骑兵保安中队的士兵训练素质好，有较强战斗力，他们都是本旗的蒙古族士兵，能够坚守战斗岗位，不会出现逃兵现象。至于保安部队的装备方面，虽然没有重型武器，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算称得上比较精良。计有：步枪六百支、马克沁重机枪四挺、轻机枪二十六挺、七九步枪子弹五万五千余发。

（10）由旗稽查局长李树德，负责定远营地区的民防工作。当时驻在定远营的各族居民有二千多户，七千多人，设立了十三个保，一百二十个甲。为了保卫定远营居民的生命财产，旗府给警察部队增发了枪支弹药，使他们时刻处在戒备之中。

另外，在各保甲组织里，定了民防规定，并建立了情报组，一旦发现情况，立即向稽查局报告。还派司令部上尉政工干事达林和上尉参谋辛文秀负责监视国民党的“国防部军事专员办事

处”、“宁夏驻定远营办事处”；以及德、李人员和国民党在定远营的特务机构。严禁一切反共标语的出现，并动员各保甲居民，涂抹掉原来书写在墙壁上的反共标语。

(11) 派第五中队少校中队长罗步云，专门负责监视从三关至定远营公路线上马家军的军事动态。如发现有紧急情况，除命令第五中队出动阻击外，还可以集合南寺的青壮年喇嘛兵出来拦截敌人。他们是保卫定远营门户的前哨。

(12) 第四中队，由少校中队长罗·都古尔札布指挥，以吉兰太盐池、北寺为中心，防范新一旅向阿拉善旗中部窜犯，必要时，从北面支援，保卫定远营的战斗。

#### 第七节 派员赴兰州欢迎解放军

1949年6月天水、宝鸡等地相继解放，马继援部队全线溃退，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向兰州进军，这时达理札雅派旗区防司令部正、副主任陈·那笋巴图、朱门二人，代表阿拉善旗和达理札雅本人，去兰州欢迎西北野战军解放兰州，并向彭德怀司令员递交达理札雅的亲笔信。当时，旗财政上拨给他们银元五百元，供他们公出使用。

朱门在七月中旬先期到达兰州，陈·那笋巴图因事晚走一步，及至八月中旬上路时，兰宁公

路已被散兵游勇所干扰，交通中断，汽车不通，陈·那笋巴图未能及时赶到。为此，达理札雅又重新派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驻兰州办事处的官员代替陈·那笋巴图会同朱门欢迎了西北野战军。他们的工作进展情况，随时用无线电与达理札雅联系。开始了与解放军直接联系。

## 第八节 阿旗向北平及西北野战军发出致敬电

### （一）派代表晋见彭总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阿拉善旗代表朱门等人，随同兰州的各界民主人士和起义人员，在兰州欢迎了西北野战军，并晋见了彭德怀总司令，递交了达理札雅的手书。彭总见了很高兴，当时说：“对达理札雅先生脱离国民党反动派，站到人民方面的行为，我们表示欢迎。”随后，彭总又指示他的联络部长范明，让他转告朱门等人跟随十九兵团赴宁夏，以便早日返回定远营。

在朱门等人临行前，彭总又让范明部长向他们转告以下指示，让他们回去向达理札雅转达。彭总说：“对于达理札雅先生提出和平解放阿拉善旗的革命行动，我们感到十分满意。现经研究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向阿拉善旗进军。”朱门他们在接受指示后，于九月二十七日

随同十九兵团来到银川，然后连夜返回了定远营。

九月二十八日，朱门把在兰州欢迎西北野战军的情况和彭总的指示，原原本本地向达理札雅及旗府官员作了详细汇报。大家都是头一次听见共产党的声音，感到亲切、温暖，从此，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消除了疑虑。

## （二）向毛主席致敬电

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之际，达理札雅于九月二十三日，以阿拉善旗札萨克的名义，向会议主席毛泽东发去了致敬电。电报的内容大意是：“我谨代表阿拉善旗各族人民向您致敬。并热忱拥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现在，我郑重宣布，我旗各族人民从此脱离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束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电报发出后，过了两天，收到了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的名义，邀请达理札雅到北京参加会议的复电。达理札雅对此感到无比的欣慰、高兴，但因耽误了时间未能出席会议。

后来查明，全国政协是在接到达理札雅的电报后，立即发电邀请达理札雅参加会议的。因阿拉善旗电报局局长尤剑秋是一个国民党军统特务分子，他收到电报后，为了破坏阿拉善旗的起

义，曾勾结其他特务，有意将电报扣压了两天。

与此同时，达理札雅亲自指示他的秘书主任张文第拟出电报，以阿拉善旗政府的名义又分别向西北野战军总司令彭德怀和解放宁夏的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发出了电报。电报中表示：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来阿拉善旗。

电报发出后不久，就接到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的复电。现接来电原样，照抄如下：

交通部第八区电信管理局

抄报时间	发报局名	字数	日期	时间
3 / 1 0	宁夏	8 5	3 / 1 0	09.00

备注 定远营

阿拉善霍硕特旗政府札萨克达理札雅来电敬悉对阿拉善旗脱离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表欣愉望努力维持阿拉善旗秩序共同建立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新中国新宁夏杨得志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日

九月二十二日，阿拉善旗政府派出代表罗瑞光（罗·曹格图盖立勒）、张光耀、司鹤鸣（司·乌图那筭）译员蒙太，星夜前往银川迎接解放宁夏的十九兵团。为了让代表们顺利完成任务，临行前，达理札雅给他们签发了一六四号的通行

护照。护照上写有：“兹有本旗代表罗·曹格图盖立勒、张光耀、司·乌图那笋等三人，因公前往宁夏，携带行李等件，希沿途军警关卡验照放行，毋得留难，致滞行程。”等语。同时，又给宁夏省的马鸿宾（子寅）致电：“兹派罗·曹格图盖立勒等三人于申（九月）漾（二十三日）赴宁转往前方代表本旗与人民解放军会晤一切请烦转电解放军知照为感。”

### （三）派代表欢迎十九兵团

九月二十三日，阿拉善旗三代表，会同宁夏地区的起义人员，一同前往任春渡，欢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和司令员杨得志。当时，由十九兵团联络处处长甄华出面接待了阿拉善旗代表，并由兵团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李志民带领他们晋见了杨司令员。

在晋见杨司令员时，罗瑞光等向杨司令员当面呈递了由达理札雅、罗·巴图孟柯署名的阿拉善旗政府代电。代电原文如下（电稿现存阿拉善左旗档案馆）：

阿拉善霍硕特旗政府代电（善字第120号）为派代表罗·曹格图盖立勒等前行宁夏欢迎解放军由。

西北区人民解放军代表先生勋鉴并转呈彭司令员毛主席钧鉴蒙旗荒漠地方瘠苦并以年来灾

襁褓见人民生活愈益艰困渴望解放已久今幸我人民解放军神武鹰扬所向无敌解西北万众腾欢而本旗亦同沾雨露无任忭慰特电致敬并申贺忱兹谨派罗·曹格图盖立勒张光耀司·乌图那笋等三人代表本旗政府及全旗人民前来谨致敬意并面陈一切敬请惠予延接指导为禱阿拉善特别旗旗政府札萨克达理札雅协理罗·巴图孟柯暨全旗仕官率全旗人民叩申（九月）漾（二十三日）

罗瑞光等在迎接十九兵团后，于九月二十六日，发回来电报详细报告了他们欢迎十九兵团和会见杨司令员的情况。他们说：“杨司令员对阿拉善旗的行动甚表满意。并又重申了不向阿拉善旗进军的决定。同时，他要求蒙旗的地方部队，当前在确保地方治安保卫人民生命财产方面，要起到积极作用。最后，杨司令员希望在适当的时候，请阿拉善旗札萨克达理札雅先生来银川会面，以便晤谈。”

对于杨得志司令员的邀请，达理札雅未能及时应邀前往。这是由于：一方面，在旗境内，马家军散兵、游勇的滋扰和新一旅在北部地区的盘踞，需要达理札雅坐镇指挥，安定人心；另一方面，达理札雅在革命形势的逼迫下，对共产党虽已有了初步的认识，但对党的方针、政策知道的不多，了解的不深，加之和共产党人员没有亲自

接触过，关于他们的举止行动如何？心里不托底。因而，顾虑重重，不敢贸然前往。

#### （四）到腰坝欢迎解放军徐团

九月二十四日，解放军十九兵团的一个团在团长徐成功的率领下，为追击马敦静兵团的散兵进入了阿拉善旗境内。在行抵腰坝时，罗步云中队长和杨·乌如根达来边官代表阿拉善旗政府和札萨克达理札雅，向解放军和徐团长表示欢迎，并汇报了旗里的情况。这个团在到达腰坝后，再未前进。他们此行的任务是，除了追击散兵，收缴枪支以外，还负责接收马家军在阿拉善旗南、北寺的军粮仓库。

罗步云在接待解放军的同时，派专人向达理札雅报告解放军来腰坝的情况。当天下午，达理札雅派“西蒙自治政府”代表何兆麟、旗区防司令部办公室中校副主任胡·爱立佐巴依尔、政工室上校主任戚涛、上校参谋主任李文钦、稽查局长李树德等人为代表，带上达理札雅的慰问信，去腰坝向徐团长和解放军全团战士进行慰问。旗骑兵保安总队部也派上尉副官王励德，在巴伦别立巴格收购绵羊数十只，以旗政府的名义，送给了解放军，表示慰问。旗区防司令部派出上尉军需谢文彬，将马家军特务营哗变后丢下的枪炮弹药，用汽车运到腰坝，如数移交给解放军。



徐团长也于九月二十五日，派出三名代表到定远营拜会了达理札雅，并了解马家军在定远营哗变时的情况。由于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来定远营，当三位代表到来时，达理札雅与军政官员、部队、学校、商会、喇嘛等一千多人列队在定远营城门外欢迎，并在大街小巷张贴标语，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晚上由旗政府举行宴会，学校演出了新排练的革命话剧，用以招待解放军代表。事后，派人协同解放军到南、北两寺交待了马家军的粮库。

接着，达理札雅派汽车去腰坝接徐团长来定远营会面。及至徐团长到时，除举行盛大欢迎仪式外，达理札雅还进行了热情招待，并向他介绍了马家军哗变的情况，以及国民党中央和宁夏省马家军阀在定远营设立的机构、人员情况。临分别时，徐团长与达理札雅互相赠送了手枪。作为纪念礼物。徐团长回到腰坝后，不久，即带领部队返回银川。

有关阿拉善旗和平解放事宜，达理札雅与各巴格、防卡以及驻在下面的保安中队官员，随时用无线电进行通报、联系，作到上下通气，互相了解，虽然在偏僻遥远之外，也能及时得知全旗情况。现举达理札雅答复陈·爱尔德尼巴图的电报，便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电报原文如下：

磴口陈章京来电悉(1)此间安定如常  
(2)朱主任(门)返定曾代表我旗向解放军接洽并见彭副总司令对我旗甚表好感(3)解放军一营从石空抵腰坝由徐团长率领任务为搜索马家队伍徐团长经余邀进城洽谈今晨返腰一切甚好  
(4)派赴宁代表罗瑞光等三人约日返定(5)现一切待商望速回返为盼锐荪申(九月)艳(二十九日)

在解放军驻在腰坝期间，阿拉善旗政府曾接到宁夏省军管会的电话，通知旗政府迅速把国民党中央和宁夏省驻定远营各机关的头目，押送宁夏省军管会。接电话后，旗政府责成稽查局长李树德派出股员马怀成带警察，搜查、传讯了蒋、马派驻定远营的军政人员和特务分子。午夜时分，这些人被集中在旗稽查局。他们是：“国防部军事专员”罗大熠，“国防部二厅”情报组长李海平和马家驹，国民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驻阿拉善旗调查专员王君惠，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主任马丽山，马敦静派驻定远营特务营营长孙明楼，原宁夏工兵营营长冯大庆，宁夏省驻定远营银行行长邢椿年等。当夜除将罗大熠、李海平、马家驹连夜送往腰坝，交与解放军带走外，其余王君惠等五人，则于次日，由阿拉善旗派人送交宁夏省军管会。

这时，名义上充任阿拉善旗区防司令部少校参谋，实为国民党“军统”特务负责人的魏文锦，即自动携带电台、武器，去银川宁夏军管会自首投诚。

为了清除国民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阿拉善旗所属各机关、部队、学校以及居民、商号，销毁了国民党的国旗，扯掉了国民党的帽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连夜赶制了五星国旗，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家家门前悬挂国旗。处处墙壁上张贴标语，大街上舞龙灯、耍狮子、踩高跷、跑旱船，以及接连不断地秧歌队，载歌载舞地热烈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 （五）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在新中国成立的当天，阿拉善旗政府，给毛主席和国家领导人发去了致敬电。电文如下：

毛主席暨各位副主席钧鉴：我们在定远营边疆，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不胜庆幸。谨电庆贺，并申竭诚拥护之忧，恭请鉴察。

阿拉善旗政府

十月一日

（原载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内蒙古日报头

版)

为了使牧区人民深入地了解阿拉善旗和平解放的重大意义，并安心从事生产、生活起见，在十月二日，达理札雅派出巴得玛道尔格、善巴却得尔、曹格札雅、巴图巴依尔等四人，分赴各防卡向牧民大众宣布阿拉善旗脱离广州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毛主席领导的起义经过，并给各防卡发出了第三次训令。训令的原文如下（原稿现存阿拉善左旗档案馆）：

阿拉善霍硕特旗政府训令

195

定秘字第196号

197

事由：为派该员等前往各防卡宣布脱离广州政府，服从毛主席领导，以安地方闾阎由。令蒙  
员

巴得玛道尔格

善巴却得尔

曹格札雅

巴图巴依尔

查本府为安定地方，早日促进民主建设起见，业经宣布脱离广州政府，服从毛主席的领导，并以指派代表与解放军当局进行接洽，结果甚为圆满。现解放军业已开抵旗境，清除逃入本旗之散兵游勇。该军纪律严明，爱护人民，对于

地方秋毫无犯。仰该员至各防卡，转达各边官、卡长，应严守岗位，密切协助，以靖地方，而安闾阎。并希转知蒙胞，各安生业，勿相惊扰，是为至要。切切此令！

札萨克 达理札雅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日

#### （六）到银川会见党政军领导

早在庆祝国庆之前，达理札雅曾在九月二十九日召集阿拉善旗和平解放指挥部全体成员开会。当时除在牧区执行任务者外，参加会议的有：罗·巴图孟柯、罗瑞光、段·巴图尔、左·甲木英、李树德、白·图布巴依尔（白诚禧）、张仁、罗永寿。会上讨论决定事项如下：

（1）同意达理札雅去银川，拜会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和宁夏省党政首长潘自力、邢肇棠，并代表阿拉善旗各族人民，向党、政、军首长献旗致敬。

（2）听取了罗瑞光在银川欢迎十九兵团和杨得志司令员热情接见的情况。

（3）决定再次向各防卡发出命令，命他们进一步做好民防安定民心工作，并大力协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清除散兵游勇的扰害。

（4）由于李守信残部盘踞在图克木庙一带，以致造成克白尔、磴口等巴格人心惶惶不

安，情况混乱。决定由陈·爱尔德尼巴图前往进行安抚，稳定局面。

会后，关于随同达理札雅去银川的人员问题，曾有过一番争执。原来在会上没有讨论到这件事，会后达理札雅在与白海风等人闲谈中，竟确定了由白海风、何兆麟、巴文峻、戚涛、李文钦等人作为随员去银川。这五人都是外籍人。这种做法，惹得旗府官员大为不满。他们认为：阿拉善旗的和平解放，是在当地人民、政府、军队一致努力下取得的，功劳属于阿拉善旗人民。但现在到了出头露面，享受荣誉的时候，不相干的人物纷纷出场，却把本旗人员排斥在外，这是不公平的。对此，达理札雅感到左右为难。他只有叫李树德等人出面向旗府官员解释，他说：“在这五名人中，有的人代表“西蒙自治政府”，有的人交游广、神通大，应对有方，带他们去，对我们有利。”等等。经过多方解释，旗府官员才算勉强同意。

十月十一日，达理札雅一行携同随员赵智华到达银川，受到了十九兵团杨得志司令员和宁夏省党政军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达理札雅等人深受鼓舞，从此，彻底消除了疑虑心理，内心感到无比的温暖：在银川期间，他们多次同省委书记潘自力，省主席邢肇棠进行会谈和个别

谈话。据达札理雅返回旗后，向旗里军政人员传达会谈内容，大致如下：

（1）关于阿拉善旗和平起义，宁夏省领导人表示全盘接受。

（2）阿拉善旗的行政机构暂不变。

（3）阿拉善旗的军队建制暂不变。

（4）尊重阿拉善旗的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5）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在阿拉善旗逐步实行民主建政。

（6）保护阿拉善旗各族人民的财产、牲畜不受侵犯。

（7）阿拉善旗原有的军政人员，一律按革命干部对待。

（8）达理札雅继续主持阿拉善旗的军政事务，直至民主建政以后。

在会谈中，宁夏省党政军领导人，对留在定远营的“西蒙自治政府”没有表示什么态度，但对德穆楚克栋鲁普和李守信的军队与“政府”却非常注意。他们主张采取用和平的方法把德、李争取过来。为此，当时研究决定，由达理札雅负责争取德、李早些回来，宁夏方面不派军队进攻。为了做这项工作，宁夏省派省军区曹友参副司令员来阿拉善旗协助工作。

## 第九节 争取德李部属投诚

达理札雅返回旗后，选派左·甲木英为阿拉善旗代表，负责与德穆楚克栋鲁普接触，争取他们弃暗投明，早些与宁夏军区对话。

左·甲木英于十月间到达图克木庙会见了德穆楚克栋鲁普，当即向他转达了宁夏省党政军领导人的意见和要求，并交给达理札雅写给他的信件。不想处在日暮途穷、无路可走的德穆楚克栋鲁普，竟不正视现实，狂妄地说什么：“我宁愿投降苏俄，也不投降毛泽东。”又说：“宁愿与北平对话，也不跟宁夏和谈。”气焰非常嚣张。对宁夏方面提出来的和平争取意见，一点也听不进耳内。后来，他虽然派出陶布新为代表，会同彭总派到阿拉善旗的和谈人员张钦武（达的长婿），在宁夏进行和谈，但他本人却与蒙古来的巴图吉尔嘎郎积极联系，跑进蒙古人民共和国。与此同时，他的部队也向西北方向移动。

为了争取德、李早日投诚起义，达理札雅由银川回来后不久，曾接到杨得志司令员和李志民主任打来的欢迎李（守信）、包（宝贵廷）和德王参加新宁夏之建设，并准予自新的酉（十月）銑（十六日）电报。电文如下（原电现存阿拉善左旗档案馆）：

定远营达理札雅（锐荪）先生对前宁陕边区



游击司令李包等欢迎其自动前来参加新宁夏之建设请速派人接洽一事已经函达近闻德穆楚克栋鲁普先生现在乌盟亦请派人前往转告如德先生能与李包部队同来亦欢迎准予自新万勿自误杨得志李志民酉铕。

十月底，德李部队与“政府”人员由图克木庙动身，途径准沙尔扎庙、巴伦沙尔扎庙，到达了拐子湖，并在那里驻扎了下来。在他们西窜途中，有些散兵流窜出来，抢掠牧民的财产、牲畜，扰乱了阿拉善旗北部六个巴格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生产。据统计当时被抢掠破产的牧民达二百余户。在他们驻扎拐子湖期间，由于无粮可食，不得不大量宰杀骆驼，用以充饥。事后统计，他们共宰杀骆驼五千余峰。

为了保护牧民的生命财产，阿拉善旗的地方卡兵在段·塔拉腾岱、爱尔德尼比立格、赛钦别立格、帕拉嘎代等人的率领下，和流窜出来的散兵打过三次仗：第一次在哈拉木嘎太，第二次在库库尔太，第三次在塔本阿拉德。计在三次交锋中，共打死散兵十余人。

对盘踞在拐子湖的德李部队，根据宁夏省委“政治争取、妥善解决、防止流窜、保护人民”的指示精神，经达理札雅召集协理、章京和旗府官员研究决定，指定由阿拉善旗骑兵保安总队副

总队长罗瑞光为北部地区前线指挥员，段·巴图尔、左·甲木英、罗·都古尔札布为辅助指挥，以骑兵保安总队第四中队为主力（队长罗·都古尔札布），并召集沙拉布尔都、吉兰太、克白尔、红古尔玉林、巴音诺尔公、雅布赖等巴格的民兵，和沙尔扎庙、图克木庙、库列图庙的喇嘛，共计五百余人的民防队，对拐子湖部署了半月形的防御包围圈。以后，又从杨富存指挥下的第一中队里抽出两个分队，协助民防队，加强包围体系。

保安队和民防队的任务是：“大造声势，加紧包围，避免接触，防止伤亡。”对敌的口号是：“停止抵抗，放下武器。”

经过左·甲木英和陶布新双方代表穿梭般地奔走，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1949年底，驻在阿拉善旗拐子湖的“蒙古自治政府”和“蒙古议会”的全体官员，在政府秘书长吉尔格朗（吉致祥）、“物资统筹委员会”主任王亲札布、议会副议长诺尔布、副秘书长阿穆恩和（张世杰）等人的倡导下，宣布起义。而部队中绝大多数官兵，也在指挥官孙明海等人的率领下，宣告起义。其中除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宝贵廷、苏和巴特尔、都古仍仓、敖木巴特尔、达喜等人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韩·沙格拉札布、葛万拉

希反对起义，率部逃往额济纳旗和向乌兰察布盟流窜外，全体人员一致表示愿意起义投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由于天寒地冻，人饥驼乏，起义后，他们当时无法成行。延至1950年2月间，天气转暖，才由拐子湖动身，向定远营进发。一路上走走停停，进度不快。行至中途，当他们接到军粮，吃饱肚子后，这才加快了步伐，于四月初来到了定远营。

当这部分部队在孙明海、塔力巴喇嘛、吉利占太等人率领进入定远营时，受到了阿拉善旗前线指挥部的热烈欢迎。接着，在曹友参副司令员的具体指导下，将部队进行了整编。塔力巴喇嘛所属的一百八十多人，大部分安排到阿拉善旗努尔盖各防卡里，有的在那里落了户。孙明海等人带来的九百多人，有四百多人编为两个保安中队，受阿拉善旗保安总队部的领导，其余四百人要求回家，由宁夏军区送到内蒙，由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予以妥善安置。对于“蒙古自治政府”的工作人员，也都作了适当的安排。这次收缴的武器弹药无数，全部移交给宁夏军区接收了。

从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后，达理札雅依照宁夏省委处理阿拉善旗问题的八条意见，着手积极作

好政府体制改革和军队整编工作。为了提高干部的理论知识，作好革命工作，首先指定由巴文峻负责组织定远营地区军政干部学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毛主席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使大家开始接受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新中国方针政策的教育。

#### 第十节 中共阿旗工委成立

1949年11月间，宁夏省党委派云祥生、郭全德带领工作组来到阿旗工作。不久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阿拉善旗工作委员会，由曹动之任书记，云祥生为副书记。从此，阿拉善旗在中国共产党阿旗工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了民主建政和民主改革工作。

##### （一）成立阿旗自治区人民政府

1950年5月间，在宁夏省委的关怀和旗工委的领导下，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原则，将原阿拉善旗政府，改组为宁夏省阿拉善旗自治区人民政府。任命达理札雅为主席，云祥生为第一副主席，罗·巴图孟柯为第二副主席，陈·爱尔德尼巴图为第三副主席。委员有曹动之、左·甲木英、白诚禧、段·巴图尔、胡·艾立佐巴依尔、陈·那笋巴图、金·巴图道尔吉、李树德、罗瑞光、巴文峻、何兆麟、白海风、张仁、罗·恩凯巴图、李文钦、罗永寿。秘书长由巴文峻兼

任，副秘书长为李文钦、朱门，秘书主任张文第。

在旗人民政府下，设置的职能机构有政务处、财政处、文教处、秘书处、生产事业处、公安处，由胡·艾立佐巴依尔等分别担任处长。另设有人民法厅，基层三十六巴格也建立了巴格人民政府。

达理札雅还兼任了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

原阿旗骑兵保安总队，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阿拉善旗人民保安总队，归宁夏军区直接指挥。总队长为罗·巴图孟柯，政委朱子春，副总队长罗瑞光，参谋长罗永寿。

阿拉善旗自治区人民政府的诞生，标志着统治阿拉善旗已有二百六十余年历史的封建制度的结束。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全旗各族人民充分地享受着民族平等和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

## （二）开展各项民主改革工作

从阿拉善旗人民政府成立后，在省委和旗工委的领导下，顺利地开展了各项工作：（1）相继消灭了包括郭拴子在内的残余股匪，镇压了反革命分子，维护了社会治安。（2）在旗与巴格之

间，建立了区一级的六个苏木公署，成立了苏木工委，加强了党和政府对牧区的领导。（3）在牧工、牧主两利原则下，规定了牧工的合理报酬，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4）配合宁夏土改，将旗属半农半牧的磴口等四个巴格的旗地、庙地、户口地共十七万多亩土地，分配给了农民。（5）八大寺的大喇嘛、僧官，由寺庙自由选举，政府不再任命。（6）开展抗美援朝的捐献活动，全旗各族人民共捐献七亿元（旧币），价值一台高射炮。（7）动员全旗牧民，支援修建青藏公路骆驼六千余峰。（8）调整了定远营市区的房租，并承认了汉族居民有房屋所有权。（9）在达理札雅的带动下，政府官员与富户，自愿献出他们所有的七千多亩土地分给农民。实现了定远营及附近巴格的农业合作化。（10）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带动下，又实现了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1）召开了历次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旗人民政府的组成人员。

### （三）举行那达慕大会庆祝解放

在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基础上，于1952年7月，召开了全旗那达慕大会，用以庆祝阿拉善旗的和平解放。会上除了赛马、摔跤、射箭等民族形式的运

动项目外，还有球类及田径赛等新式体育项目；有牲畜、皮毛、日用商品等贸易市场；有戏剧、电影等娱乐活动。大会举行了七天，参加大会的共有一万五千余人，其中牧民八千多人，占当时牧区人口的三分之一，占参加大会总人数的一半还多。这些来自牧区的人，许多是全家全户携带蒙古包、帐篷来的。他们夜以继日地纵情歌唱，歌唱新生活，歌唱共产党。宁夏省党政领导对此非常重视，副主席孙殿才、马腾蔼都来大会参观，还带来省歌舞团、电影队为大会助兴。这次大会，盛况空前，确实是阿拉善旗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盛会。

## 第十章 新的荣誉 新的征途

### 第一节 新的荣誉

1954年，宁夏省决定成立“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区”（巴音浩特系定远营改称）管辖阿拉善旗、额济纳旗、磴口县，达理札雅任主席。同年秋，宁夏省建制撤销，“巴音浩特蒙古自治区”划归甘肃省，按宪法规定改称为“巴音浩特蒙古族自治州”，达理札雅担任州长，并兼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当选为甘肃省第一届人大代表。1958年划归内蒙后，又改名为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达理札雅任盟长，并兼任内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还被选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

### 第二节 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关怀

毛主席、周总理对达理札雅十分关心，曾多次接见过他，听取他的意见并对他进行教育和鼓励。他也曾亲自向毛主席、党中央敬献锦旗，以表示对党中央、毛主席的忠心和爱戴。达理札雅每次职务的变动、提升都经过中央领导同志的认真研究并征得他的同意。在他担任巴彦淖尔盟盟长，迁来巴盟盟府原址三盛公工作时，周总理亲自指示，为他建立了一套宽敞的住宅，为了便于达理札雅工作、生活，还专门赠送给他一部小汽车，在当时传为佳话。

### 第三节 努力学习 改造思想

达理札雅从一个旗的札萨克，连连升到一个州、一个省的副主席，又荣任全国人大代表，使他深深认识到这种种新的荣誉，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下取得的，因而他更加勉励自己，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职守，努力工作，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特别是民族政策，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达理札雅在勤奋工作的同时，也加强了自身的思想改造，除努力钻研、刻苦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各种理论书籍外，还积极参加了原巴盟中级理论班的学习，密切联系实际，做出笔记，写学习心得，使自己的政治理论和思想水平，有了不断的提高，逐步改变了旧的思想意识，走上了民主进步、热爱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 第四节 认真工作 赤胆忠心

达理札雅先生，对工作认真负责，常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对成绩总是热情赞扬，对缺点或错误，敢于直言不讳，提出批评意见。他在西北军政委员会召开的委员会上，同党的负责同志习仲勋、汪峰接触中，提出在少数民族地区贯彻党的政策，一定要重视民族地区的特点，即少数民族历史环境，生产生活、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差别的问题。一九五二年春，阿拉善旗自治区三反五反运动中，打了许多“老虎”（贪污犯）搞过了头，他感到不对头，觉得有些民族领导干部要蒙冤，为此他到西安向习仲勋书记反映情况，并坦率地指出，不会有那么多的“老虎”，不然会伤害一批干部，并影响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民对党的信任和拥护。习仲勋书记对他的意见很重视，根据阿拉善旗自治区的实际情况，立

即通知宁夏省委，在阿拉善旗自治区不进行三反五反运动，解脱了一批未犯错误的干部，使他们轻松愉快地走上工作岗位。这样他们感激党的英明伟大政策。由于他在阿拉善干部群众中有威信，他所起的作用，是一般人所无法代替的。

达理札雅先生还十分重视边界和各族人民的安定团结。解放初期，这个地区由于长期受反动宣传的影响和散匪特务的捣乱、破坏，阿旗的沿山地区有些动荡不安。达理札雅先生不顾个人安危，不辞辛劳，多次到沿山各巴格及南北寺等地，向各族人民，特别是蒙族人民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一九五三年秋，他还率领政府人员，赴头道湖、克伯那木嘎巴格地区慰问，转达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的关怀，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帮助他们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这些，对消除谣言，安定人心，巩固社会治安，恢复和发展生产，搞好牧区政权建设，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由于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蒙汉之间的民族隔阂，阿旗与宁夏、甘肃边界草场纠纷不断发生。他根据民族团结、农牧互助发展生产的方针、政策，深入群众，调查了解并教育牧民和边官人员，经过各方面的工作，边界草场磨擦逐渐消除了，蒙汉各族人民更加团结了。

#### 第五节 积劳成疾

当达理札雅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巴彦淖尔盟盟长的工作岗位上，满怀信心地为自治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四个现代化事业，为争取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努力奋斗的时候，却因年老体弱，患了严重疾病，无法继续工作。他的夫人金允诚亦因年老多病，需要易地就医疗养，因此，中央领导批准他们夫妇移居北京，居家休养治疗。

#### 第六节 惨遭“四人帮”迫害致死

在达理札雅和金允诚正在北京治疗疾病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达理札雅夫妇虽然在北京受到周总理的保护而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受到冲击。后来，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内蒙和巴盟的追随者不顾一切后果，进京大肆抢抄，并将达理札雅由北京揪到巴盟进行种种折磨迫害，并赶走随身护理的夫人金允诚，终于在1968年11月18日的斗争会上当场死去。终年六十四岁。这样一位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进步思想的蒙古民族中的上层人士，竟然遭到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含冤去世！不能不使人们痛惜万分！

#### 第七节 举行隆重追悼会悼念达理札雅先生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林彪、“四人帮”反革

命集团以后，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对“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一切冤假错案进行纠正，彻底平反，达理札雅先生的这一大冤案也得到了彻底纠正。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于1978年9月23日在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为他和夫人金允诚女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对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追随者强加给达理札雅先生和金允诚女士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为他们夫妇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对其子女亲属和受株连的其他亲友表示亲切慰问。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英明、正确的党。所有这些足可告慰达理札雅先生和金允诚女士在天之灵了。

原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巴彦淖尔盟盟长达理札雅先生和原自治区妇联副主任金允诚女士平反昭雪追悼会，又一次于1979年1月13日在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礼堂隆重举行。

现将《内蒙古日报》登载的追悼大会的实况照录于下：

达理札雅先生和金允诚女士追悼会隆重举行。悼词说：“达理札雅先生，蒙古族，宁夏回族自治区阿拉善左旗人。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我党政策影响下，率部光荣起义，为解放原阿拉善旗做出了卓著的贡献。解放以后，曾任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兼阿拉善旗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原宁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原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并当选为甘肃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内蒙古自治区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悼词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对达理札雅先生十分关心，曾几次接见过他，当面教育鼓励他。达理札雅先生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热爱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他曾亲自向毛主席、党中央敬献锦旗，以表达自己对党中央、毛主席的忠心；关心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达理札雅先生工作积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他为自治区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悼词说：达理札雅先生由于遭受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在我区追随者的残酷迫害，于1968年11月18日含冤去世，终年六十四岁。今天，我们隆重悼念达理札雅先生，不仅对林彪、“四人帮”及其在我区追随者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为

他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并对其子女亲属和受株连的其他亲友，表示亲切的慰问。

悼词说：原自治区妇联副主任金允诚女士，满族，系知名人士载涛先生的女儿，达理札雅先生的夫人。解放战争时期，他跟随达理札雅先生一起光荣起义。参加革命后，曾任宁夏省民主妇联副主任、巴盟妇联主任、内蒙古妇联副主任。先后当选为自治区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一、二届妇女代表大会代表。

悼词说：金允诚女士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她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在我区妇女工作方面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悼词说：1969年11月19日，金允诚女士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在我区追随者的残酷迫害下，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四岁。今天我们举行追悼会，要把林彪、“四人帮”及其在我区追随者强加给她的一切不实之词统统推倒，为她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达理札雅先生的家乡阿拉善旗的代表和达理札雅先生的亲属子女也送了花圈，并一起参加了追悼会。

## 后 记

今年，是达理札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回顾达理札雅先生的一生，在坎坷曲折的经历中，他以刚毅的魄力，坚定的信念，机智沉着地，与日本斗，与蒋、马势力斗，与德、李一伙斗，费尽心机，竭尽全力，终于战胜一切反动派，赢得阿拉善旗的解放，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走上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我们在达理札雅先生身边工作多年，缅怀往事，历历在目，爰将记忆所及撰成此书，但因时隔久远，不免挂一漏万，有疏漏甚至失实之处，尚望知情者和达理札雅先生的亲属、子女、友朋给予批评指正。

本书除参阅档案资料外，还参照达倩芬、李宪、额尔敦巴特尔、卓力克、罗福禧、辛文秀等同志的文稿、回忆录以及李树德、达遯、张宏达、张元懋诸同志提供的情况编写的。谨向以上同志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一九八八年五月

### 附录（一）

营建定远营碑文

贺兰山北，乃朔方保障，沙漠之咽喉也。圣

心軫念山后一带，切近宁城，特移厄鲁特郡王阿宝部落于西海，渡鄂尔多斯七佐领于河东。贺兰山后葡萄泉等处，水甘土肥，引导诸泉，亦可耕种。兼之，山阴挺生松柏，滩中多产红盐。且形势扼瀚海往来之捷路，控关塞七十二处隘口，奉旨特设一营，名曰定远。爰相地形高下，因山筑城，气势轩昂。内外连络，边疆宁谧，良由圣泽广远，神武远施，厄万斯年，感戴常德之深矣。因纪盛事，而镌之石。雍正八年岁在庚戌秋八月立吉。

### 附录（二）

清代官员的顶戴、蟒袍、补服、腰带和坐褥

	顶戴	蟒袍	补服	
			文	武
一品	珊瑚	九蟒五爪	仙鹤	麒麟
二品	起花珊瑚	九蟒五爪	锦鸡	狮
三品	兰宝石及兰色明玻璃	九蟒五爪	孔雀	豹
四品	青金石及兰色涅玻璃	八蟒五爪	雪雁	虎
五品	水晶及白色明玻璃	八蟒五爪	白鹇	熊
六品	砗磲及白色涅玻璃	八蟒五爪	鹭鸶	彪



七品	素金顶	五蟒四爪	鸿鹓	犀牛
八品	起花金顶	五蟒四爪	鹤鹑	犀牛
九品	镂花金顶	五蟒四爪	练雀	海马
未入流	镂花金顶	五蟒四爪	黄鹂	

说明：顶戴的帽顶，一二品红色，三四品兰色，五六品白色，七品以下金色。在同色中也有区别，一二品有纯红、紫红之别，三四品有亮兰、暗蓝之别。

蟒袍是官员穿在身上绣有蟒形的长袍。

被袍是加在蟒袍之外的外挂，正中用金线绣织鸟兽形的正方形图案。御史、按察使、司法监察官员，一律穿獬豸外挂。

对军功人员，皇帝赏赐花翎或兰翎。花翎是孔雀翎，兰翎是鸥鸟翎，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分。六品以下赏兰翎，六品以上赏单眼花翎。双眼花翎非大臣不能得。三眼花翎是赏给亲王、贝勒等贵族和有功勋的大臣的。初时十分名贵，以后用捐纳方式可以买到。

腰带，一品用金方玉版，中嵌红宝石。未入流用乌角圆版四片，银镶边。

坐褥，一品冬用狼皮，夏用金红褐布衬红毡。未入流冬用獭皮，夏用土布衬白毡。

# 怀念我的母亲爱新觉

罗·韞慧（金允诚）

达倩芬

一九六九年元月二十日，我的母亲金允诚被“四人帮”势力折磨致死，至今已整整十八年。在这十几年当中，母亲那高尚娴雅的心灵，端庄秀丽的容颜，慈祥刚正的性格，出类拔萃的才华，无时不萦绕在我的心中。她是我姐弟的慈爱的母亲，也是我们最敬爱的师长；她是我父达理札雅忠贞的伴侣，也是我父的“严师”和挚友。每当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例如，在一九四九年我父脱离国民党政府，率领全旗人民，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力争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在关键时刻，她为我父陈说利害，分析形势，出谋划策，积极扶助，使我父消除疑虑，认清形势，胜利完成起义大业。纵观母亲的五十多年的生活历程，她确曾享受过人生难遇的荣华富贵，但也经历了无数的坎坷。每当我回忆起一幕幕往事，母亲那豁达大度、开明大方、慈祥和蔼的言行，犹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 母亲的家世

我母系满州爱新觉罗氏之后，外祖父载涛乃清朝重臣摄政王载漪之胞弟，被封为贝勒爵位。外祖母蒋畹贞系清朝内务府蒋中堂之女，生有四男二女，大儿早逝。二儿溥佳幼年在宫中陪伴小皇帝（宣统）溥仪读书，一九七八年在北京病逝。三儿溥佺在抗日战争时期病故。四儿于十四岁夭折。大女儿亦于十六岁病故。二女即我的生母，姓名全称为爱新觉罗·金韞慧，嫁于我父达理札雅后改为金允诚。大姨死后，我母亲便成了家中唯一的女儿，因此深得外祖父母的宠爱，视为掌上明珠。由于她从小往来于皇宫王府，很有教养，颇多见识。

我外祖父载涛，是个心胸开朗，处世达观的人，虽为朝廷皇亲近臣，却淡泊明志，日以书画笙歌自娱。他的书法和绘画，在当时颇有名声，亦精于武术。他对京剧特别爱好，造诣亦深，唱、做、念、打，生旦净丑，无所不能，尤以武生戏最为所长。据资料，当代著名武生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的猴子戏，就是拜我外祖父教出来的。在我外祖父家，不仅建有戏台，还备有成套戏装设备，以供在家里演唱之用，全家人差不多都会登台献技，我母亲因受旧礼教的约束，从未

登台演唱。但耳濡目染，对戏剧颇多知晓，听到一两句台词，便能道出唱的戏名，闲时亦常哼几句“坐宫”、“盗令”等小段折子戏，清新悦耳，字正腔圆，令人心旷神怡。

自从大姨去世后，外祖父母对母亲更加珍爱。母亲的聪明伶俐，也使他们下决心把她培养成多才多艺的女孩子，他们看到母亲读书心切，在当时是不可能叫女孩子出外上学的，便托人请了位家庭教师在府中任教。闲时，又经外祖母亲予指教，使母亲的汉文程度迅速提高，诗词歌赋亦能通晓，可以说达到了大学水平。外祖父母更加喜欢，对母亲几乎达到了百依百顺的地步。有一天，母亲要学骑自行车。外祖父便从国外买来一辆名贵自行车给她骑。有个时期，母亲要学英语，时常缠着到皇宫陪伴溥仪读英文的二舅溥佳教她，弄得不胜其烦，外祖父见其求学心切，就在家里又专门请了一位外国人教英语。因此，母亲的英语学得很好，一般的英语会话能够对答如流，而且还能翻译一些短篇作品。

母亲还喜欢书法和绘画。书法非常秀丽，能绘画各种花鸟人物，这些都是由外祖父母亲自传授并经名师指点学成的。母亲最爱画古代人物如“关公”等，形象特别逼真。我们家中过去有许多母亲的作品，可惜在“文革”中都被查抄、烧毁了。

母亲的字画在当时是很有名的。也常有人求她作画。母亲总是有求必应，又买笔，又买纸，无论谁求，都尽力画好。使求者满心欢喜。我父亲曾骑过一匹心爱的大枣骝马，样子又好看又壮实。后来，因工作调到内蒙，这匹马没有带来。一九六一年，我母亲由北京来到呼市，父亲又谈起这匹马，赞不绝口。母亲就按照这匹马的照片，画了一张画儿。画中的马两耳高耸，鬃鬣垂直，浑身象炭火一般红亮，形状真象活的一般。母亲还为此画题了辞，送给了我爱人张钦武留念。“文革”时把它当成唯一珍品，千方百计地藏匿才免遭劫，成为母亲唯一的幸存作品。如今这画还挂在我们家中，每当想念母亲的时候，就看看这张画，也是一种安慰。

母亲还酷爱刺绣，外祖父就从天主堂请来一位姆母教她。母亲无论学什么都非常用心，学什么都很快能学好学会。刺绣也很出色。我



这是我母亲画的唯一留存下来的马像

达倩芬供稿

在兰州结婚时，母亲就亲自为我们绣了四扇大挂屏送给我们。其中有两扇绣的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著名唐诗。另两扇绣的是此诗的英文译文。这四扇屏绣的精美绝伦，谁看了谁都夸奖。这四扇屏一直都挂在我在兰州住的家里，后在一九五四年我们的房子被占用后，我们把它交给我妹妹保管，不料也在文革中被毁了，实在令人痛心！

多才多艺的好妈妈，可惜她过早地离开我们走了！

### 母亲的婚事

我母亲是十九岁上同我父达理札雅结婚的。一个是清朝公主，一个是蒙古王爷，说起来是门当户对的婚姻，按说婚事应该顺利，很快就成婚的。谁知不然，从说媒到完婚竟拖了三年的时间。主要原因是我母亲在家里是唯一幸存的女儿，从外祖父到全家大大小小，没有一个人愿意她嫁到千里迢迢的边塞，更怕婚后回蒙旗去。又听说我的祖母很厉害，怕我母亲出嫁后受委屈，因此一拖再拖，不作答复。这样一拖就是三年。后经我祖父塔王再三托人说情，外祖父才答应下来。

父母举行的婚礼，论规模、排场和豪华劲儿，就别提了。据我母亲后来对我讲的当时情景

说：光是我外祖父给我母亲陪送的嫁妆，从山老胡同我外祖父家门口，一直摆到三座桥塔王府，足有二里路长。送礼的轿子队头已进到我祖父家里，尾还在我外祖父家里没有出门，真是豪华奢侈极了。据说，光家俱摆设就做了两套，一套是全部用紫檀木等雕花的中式的，另一套全部是西式的，都是由天主教堂托外国人购买或订做的。两套家俱把四个大厅摆的满满当当。此外，各种金银珠宝，绫罗绸缎，衣物首饰，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应有尽有。

结婚典礼是按照老规矩举行的。母亲穿着清代服装，头发梳成清朝的莲板头，足穿花盆底鞋，走路一点也不能快，只能慢慢的。母亲是用花轿抬到我祖父家的。后来据我嬷嬷（我母亲的奶姆）说：“当时你奶奶（满人称母亲为奶奶）被人搀到厅堂，正赶上宾朋满坐，喧喧闹闹，等看新娘子。当你奶奶一下轿揭去盖头，真好似画中的美人，顿时鸦雀无声，把人都看呆了。我母亲本来娴雅娇娆，又加上锦缎盛装打扮，越发雍荣华贵，千娇百媚，真似“翩若惊鸿，婉若游龙”，有谁见了而不为之倾倒呢？”

母亲婚后，家庭和睦，与父亲感情极为融洽，几乎形影不离。我祖父对我母亲也亲如自己的女儿。唯有祖母封建思想严重，老是摆出一副

婆婆的尊严面孔，而且王爷府的规矩和清王府一样也十分严格。母亲每天早上五点钟起床，梳洗完毕，就得赶快到祖母那边请早安，不赐座位，就得在一旁规规矩矩站着，侍候祖母抽水烟，吃早点，不敢须臾离开。母亲吃饭也很受约束。全家人吃饭都在一个大厅里，从不敢吃饱，只要祖母一放筷子，母亲就得赶快站起来，再不敢吃第二碗。每次吃完饭，还得侍候祖母漱口、抽水烟。直到祖母休息后，母亲才敢离开，回到自己的住处。由母亲结婚时陪来的奶妈，我们叫她嬷嬷，再做些饭对付吃些。可怜母亲在外祖父家那么娇惯，可到了祖母面前，却那样逆来顺受，可谓封建礼教下的典型妇女了。

### 母亲回娘家情景

我们和通常人一样，都把外祖母称为姥姥。我们小时候最最盼望的便是回姥姥家。好像姥姥家的气氛比我们家随便多了，没有那么严肃的和令人窒息的封建礼教气味。母亲带领我们回到姥姥家，便可以自由自在地、痛痛快快地玩几天。尤其逢上姥爷家谁过生日，那就更加热闹了，有时请来曲艺界的名手，唱大鼓，唱单弦，说相声，有时候就唱大戏。姥姥家有个小戏台，全家人差不多都能演唱，况且家里还有行头，一说唱就能



唱一出戏。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次我三舅扮演《芦花荡》里的张飞，对打时把胡子也甩掉到地下，惹得全家哄堂大笑。

还有，我们每回到姥姥家，姥姥总是叫大姨太（姥爷的第二位夫人）带我们到东安市场去，买许许多多吃的、穿的、玩的东西回来。因此，我们很喜欢姥姥家，时间一久不去就怪想它的。

姥姥家有个太监姓贾，人们都叫他贾老爷。每当我们去时，贾老爷就在过厅的门口，高声唱喏：“姑奶奶、额驸马回来了。”这时姥爷前庭挂着一只鸚鵡也跟着叫起来：“二格格回来啦。二格格回来啦。”每到这时，我们都感到非常的亲切，特别愉快。

母亲回到娘家，给姥爷、姥姥请过安，便象小孩儿一样，一头扑到姥姥的怀里，不多言语，尽情地享受着慈母之爱。母亲是个刚强的人，为了不使姥爷和姥姥难受，从来不把在我祖母那里受的约束和委屈向姥爷他们流露一点儿。有一次，姥爷过生日，由天主教堂外国神甫那里为我定做了一个巧克力的大兔子。姥爷让我先吃一口，我因为喜欢得不得了，说什么也不舍得咬一口，并且拿一张纸把巧克力的兔子包了起来。姥爷喜欢得很，答应下次再为我做一个，我这才在兔子的耳朵上轻轻地咬一点儿尝尝。有一次我生

病了，姥爷果然又为我做了一个巧克力大兔子送给我，一看，这个兔子比上次那个更大更可爱，我乐得一下从病床上跳了起来。这个巧克力大兔子后来由我保存到回阿拉善旗。这件事儿虽小，却一直在我脑海里留下极深印象，至今不能忘怀。

### 母亲的恻隐之心

从我记事儿起，我们住在北京三座桥塔王府，在王府后院的马号院子里，住着一对可怜的老夫妇，老头儿眼睛几乎失明，拄着手杖勉强可以行走。当时我们家的生活费都由我祖母掌管，母亲每月要到我祖母处去领生活费。领来后就叫我偷偷地给那老夫妇送些去。那年月用的是现大洋（银元），每次大约送去二十元左右。我每次去送钱，母亲总是再三叮嘱：“见了老爷爷要叫姑爷爷，见了老婆婆要叫姑奶奶”。童年的好奇心，使我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要叫他们姑爷爷、姑奶奶呢？后来，我长大了些，母亲才告诉我：这个姑奶奶就是我祖父的亲妹妹。姑爷爷是清朝政府废黜的皇帝大阿哥溥隽。溥隽是端王的儿子，在未选中进宫之前，我祖父就同端王结成了亲家，把亲妹妹（我姑奶奶）嫁给了端王的儿子溥隽。当初他们的年纪还小。后来溥隽被选入宫里作为储君。可他整天价不务正业，吃喝

玩乐，嬉狗耍猴的。听说过去还演过一出《大阿哥拉狗上金殿》的戏，就是演的他。慈禧太后对此大为不满，很不喜欢这位大阿哥。后来“义和团”失败，“八国联军”把满清朝廷赶出北京，迁到了西安，外国联军统帅向清廷要祸首端王和他的儿子溥隽，慈禧便借此机会把大阿哥痛打了一顿板子，撵出行宫，再不准叫他大阿哥了。满清倒台退位后，我这位姑爷爷虽然眼睛已看不清楚，生活贫困潦倒，日常开销仅靠从我祖母处领的一点生活费勉强维持。我祖父看他们可怜，才把他们收留在我府的马号院里居住。可我这位姑爷爷生就的一副强脾气，总还摆出一副“皇帝”的架子，经常对人们叨咕，什么“蒙古十八家王子都是扶持我的。”祖母每当听到这种叫喊，就赌气不再给发生活费，这位姑爷爷也赌气不去领钱，祖父只好出面打园场，偷偷的派我给送去。这两位老人，钱一到手，不上几天便全部花光，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母亲对这两位老人非常同情，每次从祖母那里领回我们的生活费，就悄悄叫我赶快给姑爷爷他们送些去，还要嘱咐我提防让祖母知道。姑爷爷房子里只有一张破桌子，两把旧椅子。炕上放着一个小炕桌，也是旧的。旁边单独放着一把破旧的太师椅，上面铺着一块旧羊皮垫儿，那就是姑爷爷称孤道寡坐的所

谓“龙椅”了。可这位姑爷爷还是摆着一副“龙架子”，每顿饭必须摆四个菜碟儿，那怕是二寸大的碟子，也非摆够数不可。可真难为了我姑奶奶了，终日为这四个菜东奔西跑，忙忙碌碌，有时实在弄不到什么菜，摆上几个花生豆儿也算一个菜了。后来，我随父母离开北平回了蒙旗。从此再没有听到这两位老人的消息，以后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了。

### 祖父家的惨变

我八岁那年，我们家相继出了几件事，使得一个兴旺的家庭骤然衰落下来。在这一年，我母亲生下了我的三妹（后来夭折了），不多久，我二叔因骑摩托车摔伤，经抢救无效死去。二婶亦因丈夫死亡，无子指靠，服毒殉节。祖父连遭这两次打击，悲伤过度，不久亦去世。

我们家一年之内死了三口子，全家都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可最不公平的事，把这不幸的责任都归罪于刚出生不久的三妹身上。因为三妹属羊，祖父属羊，二叔两口子也属羊。起先二叔结婚时，祖父就特别反对，原因就为两人都属羊，按迷信说法结合到了一块儿没有什么好结果。可是祖母听信别人的“三羊（阳）开泰”的说法，说什么也要办这门亲事，祖父扭不过，也只好答应了。没想到生下三妹妹也属羊，家里成了四羊

聚会，这又给那些游手好闲、多嘴多舌的人制造了话柄，他们为了讨好祖母，便造出什么“四羊犯忌”的谎言，祖母偏偏又信了，因此对我三妹恨之入骨，一直不愿见到她。就在这时，旗里派来代表，要迎接我父亲、母亲回旗下举行承袭王位的大典。为了顺便送祖父、二叔、二婶的三付灵棺回阿旗祖坟安葬，全家都准备起程，但因惧怕祖母看到三妹发脾气，母亲只好忍痛把三妹留在北京的姥姥家，并把我嬷嬷也留下来照看她。正当起身之际，我也忽然闹起痢疾来，上吐下泻，浑身没有一丝的气力，母亲便恳求祖母允许她暂时留下来照顾我，但遭到祖母的拒绝，坚决要母亲同行。三妹也坚决不能带。只好又请了一位满族西医金凤臣大夫与我家同行，在路上好与我治病。金大夫医疗技术不错，后来一直住在阿旗，以至病老在那里。

这时，母亲的心里是非常痛楚的，她从小在北京长大，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父母，如今，被迫在北京留下自己未满月的女儿，又带着我这个病孩子，就要离开北京，离别亲人，千里迢迢去那据说十分荒寂的蒙旗去，母女情深，那是象刀子剜心一样的疼啊！可母亲真够坚强的。她没有被多层的痛苦压倒，她一遍一遍地擦干了眼泪，告别了父母，强颜为欢，脸上不露出一点儿

的难过，毅然地离开北京，踏上了通往阿拉善旗定远营之路。

### 承袭大典

到了定远营，先把祖父、二叔、二婶的灵棺安顿好，我们便住进了定远营王府。这王府虽然规模不大，但殿堂兼备，亭台楼阁俱全，除了略小于北京王府外，其它各方面都模仿了北京王府的样子。

过了些天，旗里的官员准备为父亲和母亲举行承袭王位大典。父亲承袭亲王，母亲被封为福晋。这当儿却又引起了一场风波。原来祖母并非祖父的原配，所以一直没有受到过“封诰”。这次我母亲加封福晋称号，她岂肯善罢甘休，于是大发雷霆，闹得不可开交。对此，父亲自然不敢说什么，说也不顶事。旗府官员也感到不知所措。亏得南京蒙藏委员会派来参加典礼的官员出了一个主意，把我祖母尊为“太福晋”，才了却这场风波。

母亲加封福晋是同父亲承袭王位大典一同进行的。仪式非常隆重。父亲穿着亲王的服式，戴着紫红的顶戴和三眼花翎。母亲身穿鲜艳的蒙古服装，梳着“双凤朝阳”的蒙古妇女发型，也戴着一颗紫红珠子，与父亲高高并坐在亲王府大殿

的两张大太师椅上，接受全旗官民的朝贺和献礼，接受各地来宾的祝贺及赠送礼品。仪式从清晨一直进行到深夜方才完毕。等母亲回到家里，已经累得躺倒起不来了。我笑着打趣说：“奶奶，您坐在殿堂上同塑像一样可笑。”母亲也笑了，叹了一口气，说：“简直快把我累死了”。

### 帮助父亲提高文化

我父亲从小由我四老太太抚养，没有上过学。十岁上到了北京，才由我祖父请了一位家庭教师开始读书，虽然读过一些书，但文化基础还是差一些。母亲随父亲到了阿旗以后，当时旗里情况是，因祖父长期居住在北京，很少回旗管理政事，旗内一切事情都由官员们执掌，久而久之，造成许多派别，互相排挤，彼此争权夺利，旗政腐败，无人过问。母亲看到这个局面，意识到如果不赶快整顿，后果将不堪设想。可是要帮助父亲整顿旗政，首先必须帮助父亲提高文化，增强办事能力。于是加紧帮助父亲学习文化。虽然父母结婚后，母亲也帮助父亲学习，没有间断过，但不够郑重其事，时紧时松，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日子一久，便一曝十寒，学业荒疏下来。这次母亲对父亲的文化学习，却非常严肃认真，规定除了读诗书、史学之外，还要学外

国历史和名人传记等。父亲有时学得不耐烦了，母亲规劝不成，便以严师的身份予以“惩罚”，吓得父亲赶快振作起来，好好学习。常常逗得我在一旁偷着笑。有一次，我们看了一出戏，叫作《镇台念书》，觉得很可笑，回去以后，我便逗父亲说：“我看了〈镇台念书〉的戏，您这是王爷爷念书啊”。在母亲夜以继日地督促下，父亲的文化有了很大提高，处理一些政事，批阅一些文件，已经不那么困难了。

那时的阿旗经过许多变乱，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存在不少困难，仅靠几个老官员支撑维持着。但他们思想保守，因循守旧，往往在推行一些新制度，任用一些新人材时候，横加干涉阻拦。父亲上任后，施行了一些改革措施，选用了许多年富力强的人到旗政府工作，老官员大为不满，便搬出一些老资历、老条条框框来加以限制。那时候，旗里有一项苛政，对犯有错误的人要打个半死或致残废，父亲见了很不忍，便想废除它，回来跟我母亲一商量，母亲也很支持，这事儿传到老官员那里，他们大为不满，便用“妇女不能干涉政事”等一些谰言刺激父亲。我记得母亲因此事气得病倒在床上，感叹地说：咳！创办一件事，是多么不容易呀！



## 创办第一所女校

阿拉善旗（指现在的左、右两旗）有十八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四万多人口，没有一座学校，文化非常落后，全旗中没有几个人认识字，尤其是妇女，几乎个个目不识丁。母亲心里非常着急，一面催促父亲多增设些男生学校，一面自己下决心创办阿旗的第一所女子学校。没有校址，就从王府旁边腾出一个小院子作校址，并请求旗财政上拨了一部分经费，母亲亲自担任校长。从北京一同来旗的西医金风臣大夫的女儿金慕然教算术和音乐，母亲亲自教语文和图画、写字，另外还请了几位老师来教书，把学校办了起来。起初由于封建势力和旧思想的影响，没有人来报名。为了打消别人的顾虑，母亲让我和二妹首先报名。在我们的带动下，后来逐渐增加到五十多个女孩子，最大的十四岁，小的只有七岁。学生用的课本、笔墨纸张，统由旗府免费供给。学生在校期间，一律穿学校统一发的学生服，装有冬装和夏装。冬天天冷，学生中午不用回家，就在学校食堂用饭，夏天遇到下雨天发洪水，由府里的侍卫把学生背过河去，太小的学生背着送回家。学校开支大了，母亲把校长三十六元的月薪捐到学校里作经费。这样阿旗的女孩子总算开

始学文化了，学校办得也越来越红火了。

也许是母亲读的各种书籍多了，受了新思潮的影响，还是受外祖父的开朗性格影响深了，她虽然出身于封建贵族家庭，却对新生事物很敏感，从不维护旧的腐败的东西。为了让广大妇女群众从旧礼教解脱出来，她号召妇女们参加社会工作。她大声疾呼，反对包办婚姻，反对给女孩子缠脚。对一些封建思想严重的人家，她亲自登门劝说，解除了一些女孩子的一辈子痛楚。同时还提倡新法接生，并选派人到外地学习，这在当时是极不容易的，需要有很大的毅力。母亲利用她“福晋”的有利身份，在旗内推行这些新事物。大部分群众都能踊跃响应，把当时的阿拉善旗搞得相当活跃。

### 日本人来到定远营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他们派兵入侵绥远河套，并派遣特务潜入阿、额两旗，妄图诱降西部蒙旗。一九三〇年的一天，天空中嗡嗡作响，一架日本飞机突然出现在定远营上空，稍事盘旋后即降落在城西一块平地上，下来四个日本人声称是板垣的代表，要求见我父亲。当时满城惊慌，全部保安队也警戒起来。我父亲召集旗府官员商议对策后，回来与我母亲计

议，我母亲深知日本人蛮不讲理，此行决非好意，但现在是突然事件，他们既然扬言要见旗领导，若要等南京政府批示再作决定，时间就来不及。母亲经过深思之后，毅然对我父亲说：“见就见他们一面，看他做些什么。说好的就敷衍他们，说翻了就干掉他们，然后我们往沙窝里一躲，看他们能奈何我们！”母亲的一番话鼓起了父亲的勇气，带领几位官员和十多名武装侍卫到前厅去会见日本人。起初我们姐妹听说日本人来了，心里很害怕，后来看到母亲那样镇定和刚强，我们就不怕了，反而跟在母亲后面到前厅隔扇内去偷听。这时听到父亲在前厅大拍桌子同日本人争吵起来，后来没有吵出什么结果，日本人悻悻地走了。我看到会见的桌子上摆着许多糖果和玩具，心想准是日本人送的，跑去要拿，母亲却叫把这些东西都扔出去，不能动。当时我还不理解，遗憾了好几天，后来听说一位侍候母亲的老妈妈吃了日本人送来的奶油蛋糕忽然闹起痢疾来，有人吃了上吐下泻，大家更对日本人恨得不得了。

以后，日本人又来过几次，板垣也来过，还修了飞机场，成立了特务机关，但什么便宜也没有捞到。后来南京政府派关麟徵、杜聿明率领二十五师来到定远营，才把日本人赶跑了。

## 同“慕侠夫人”的交游

日本人走后不久，宁夏军阀马鸿逵便策划向阿旗进攻，这是他梦想已久的事，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征服阿旗，夺走阿旗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这次日本人到阿旗一捣乱，正是他的好机会，便捏造谣言，诬蔑我父勾结日寇，骗取上级的信任。马鸿逵暗中调兵遣将，在春节过后不久，诡称军队换防，夜里派出几个团的兵力，包括步兵、骑兵、炮兵，还有一架飞机，对定远营进行包围攻击。阿旗军民奋起抵抗，激战两昼夜。但敌我众寡悬殊，为了不让人民遭受重大损失，阿旗决定罢战言和，接受马家军提出的条件，缴械和谈，马鸿逵遂将我全家押解银川居住。

我们到银川后，被安置在一个公馆里软禁起来，达八个月之久。这八个月，全家人都失去了自由，父亲整天不说话，脾气极为暴躁，动不动就呵斥人。母亲总是耐心地规劝和安慰父亲。

马鸿逵是宁夏的土皇帝，母亲知道，要想摆脱马鸿逵的软禁，就必须设法同他周围的人接近。马鸿逵有五六个姨太太，其中最得宠的是四太太，这个四太太的话对马鸿逵来说是言听计从的。她的名字叫慕侠，人们都不敢称她四太太，

而称她慕侠夫人。这位慕侠夫人经常来我们家坐坐，也常请我们到她公馆去吃饭。她有抽鸦片烟的嗜好，还爱玩牌，她抽鸦片烟是从不避让马鸿逵的。因此也常到我们家抽烟打牌。另外，母亲为了讨好她，每天都要应酬马鸿逵的两位母亲（河州老太太、书诚老太太），和马鸿逵的其他几位太太。母亲本来已经忙得不可开交，还得天天陪着慕侠夫人抽大烟、打牌。日子一久，就把身子累垮了。慕侠夫人就劝母亲抽点大烟补补身体。母亲不好推却也抽起来，日子久了也抽上瘾了。慕侠夫人还跟母亲说要认我为干女儿，并送来许多金首饰衣物作为礼物，这又不能推却，只好应允。正在这时，我们家里闹开了传染病，我和几个妹妹都病起来，不久，我三妹妹患白喉死了。父亲认为此处房子不吉利，就在银川另买了一处房子，借此机会搬出这所受监视的公馆，也能松一口气。当年秋天，父亲被国民党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派飞机接往兰州。后来暗中派人回银川让母亲想法活动，带着孩子也到兰州去。母亲接到信儿，就婉转向慕侠夫人求情，得到马鸿逵的允准，乘八战区派来一架专机，把我们全家接到兰州，结束了在银川八个月的软禁生活。

## 在兰州的生活

我们到兰州后，由八战区接待，住在玉泉山裴建中花园，父亲、母亲的心情比在银川时好多了。朱绍良对父亲的关系也慢慢好起来。母亲为了帮助父亲同朱绍良改善关系，作了不少工作，真正起到了贤内助的作用。原来，朱绍良的贵州夫人也喜欢抽大烟，打麻将，母亲就投其所好，于是今天到她家抽烟玩牌，明天她来我家抽烟打牌。你来我往，结成了好朋友。父亲有要办的事，通过这种关系，很容易得到解决。但是，母亲的烟瘾也越来越重了。这时候，母亲参加了兰州书画名流举办的“诗社”。这诗社里有水梓、裴建中、范振绪等著名书画家多人，张大千先生去敦煌路过兰州时也参加了，并在我们家画了许多画。诗社的成员所作的诗和画，均交诗社汇总，并进行交流评比。母亲作的诗画很多，并装订成册，还被评为优等，得过许多奖品。这些诗和画，后来都毁于“文化大革命”中了。

## 在“九间楼”作客

“九间楼”落座在兰州四墩坪山头上一个旧庙宇内，一九四〇年，蒋介石来甘肃视察，谷正伦相中了九间楼这块地方，防空设施较好的经修饰

以后，作为迎接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的下榻地方。宋美龄来兰州后在九间楼一个大厅里，邀请我母亲去吃饭。除母亲外，还有国民党许多军政要员的夫人，并有一些外国贵妇人。后来听母亲讲述当时宴会情景，说来也滑稽可笑，这些要员的夫人，如朱夫人、谷夫人等，平日见了人，趾高气扬，目空一切，总爱摆出一付不可一世的架子，可今天在宋美龄面前，却必恭必敬，随声应和，完全成了丫环和侍女的角色，竟把我母亲的座位摆在上宾的位置，在朱夫人、谷夫人等人之上，真使我母亲感到有些局促不安。宋美龄还一再让母亲不要客气，不要拘谨。桌子上摆的食品、水果，大部分是从外国进来的新鲜珍品。餐后，宋美龄还挑了几件衣料让我母亲带回来。母亲回来后对我们说：“蒋夫人脾气很大，她为她的什么手帕没有带来的小事情上大发脾气，并派专机到重庆去取。”可谓第一妇人欲壑难填。

### 母亲非常关心我们的学习

我们在兰州的时候，母亲同往常一样，最关心的是对我们的教育。起初，一到兰州，便为我们请了一位家庭教师，给我们补习中文、数学、英语。其后，母亲感到离开学校不行，便将我和妹妹菱芬两人送到兰州女子中学上学。因我家离

学校很远，经常迟到，而学校的制度又很严，因此经常挨批评，叫人难以接受。回到家里又不敢对母亲讲，怕再受母亲的训斥。平时，母亲对我们的教育是很严格的，我们有什么要求，总爱找父亲去说，不敢找母亲讲。迟到挨批评事只好对父亲说，后来母亲知道以后，坚持要我和妹妹早起，坚持步行到校，还是父亲为我们置备了一套当时兰州流行的骡子车，专供我们上下学接送之用。人们常说：严父、慈母，而在我的印象里，却是严母、慈父。母亲虽然出生在皇亲贵族之家，但在她的身上很少有贵妇、小姐的脾气。对待下面的人，诸如奶妈也好，佣人也好，总是和蔼可亲，从不使性、动气、打人。有时佣人们做错了事，母亲甚至连骂一句都不会，有时气极了，也只是气得浑身发抖。有一个一直侍候母亲的王妈，几十年来母亲对她视同亲人一般。这位王妈也一直同母亲生活在一起，直到一九七一年老病而死。

### 全家从兰州回旗

一九四六年夏天，西北行营转来南京蒙藏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的命令，通知我们全家可以回归自己的家乡——阿拉善旗了。命令说：根据阿旗人民的请求，达理札雅札萨克可回旗料理旗



政。这真是一件天大的喜事。啊！七年，这半被监视半被软禁的七年，多么难度的日子啊！如今，问题已经澄清，种种怀疑和是非曲直分清楚了，父亲总算得到了当局的了解。谢天谢地！总算可以回旗了。

全家回旗以后，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她所开办的女子小学和社会妇女工作，还想继续过问一下，但已力不从心了。经常把时间消磨在吸烟和作些书画之上。一九四七年，把我祖母由北京接来阿旗。经过这么多年的变迁和分别，祖母对母亲的态度有了很大的改善，母亲的脸上出现了笑容，也能坐在祖母面前畅谈一些家务琐事，不象从前那么拘谨了。婆媳之间关系融洽了。

### 为阿旗起义出了力

前面我已经说过，母亲是个很能接受新鲜事物的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掀起全面内战，在家里大家谈到时局的时候，母亲总是以她独特的见解加以评论。母亲憎恨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出尔反尔，这是她在兰州时亲自看到和亲身经历过的，因此她常说：“共产党的壮大是由国民党的腐败造成的。我看，将来最终的胜利，一定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这样的议论在家里总要引起一番争论，但是母亲始终坚持她的见

解。

一九四九年兰州解放，阿旗处于极度紧张之中，马鸿逵的败兵到处游窜生事，德王、李守信的部队也在阿旗境内横冲直撞，旗政府官员同“蒙古自治政府”的人员各持己见，有的主张向沙漠逃走，有的主张等候投诚共产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正在这时候，大约是九月十六日左右的晚上，母亲在收音机里听到新华社的一则广播说：“胡匪整编骑兵第一旅旅长张钦武率部一千余人向我军投诚”。心情感到莫大的安慰，急忙去告诉了父亲，并叫父亲赶快去告诉妞（我的小名）一声，说：“钦武有消息了。已经投靠了共产党”。父亲当夜便跑到我房里把消息告诉我。我听了尤为欢慰，多日来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第二天，钦武也派了两人星夜飞骑来到定远营把这消息告诉我们，并说到钦武起义后很受优待的情况。从这时起，母亲更下定决心，让父亲排除异议，率领全旗人民起义，欢迎人民解放军。往常，父亲对于母亲的话本来是言听计从的，这次母亲的劝告，听到张钦武受优待的消息，更加坚定了父亲的决心。遂连夜召集了一些亲近的政府官员和“蒙古自治政府”的白海风等，共同研究拟定电稿，通电起义。因为当时我正在父母身边，亲眼看到父亲召集旗政府的亲信

官员罗协理、陈章京、左·甲木英、罗永寿等单独开会研究，又同“蒙古自治政府”的白海风、巴文峻、何兆麟等商议。每次同他们开会研究后，都回到后屋同母亲商量，作最后决定，因此，父亲率领阿旗起义，母亲在关键时刻，起了把握航向的重要作用。

### 与姥爷的会见

母亲同姥爷载涛在抗日战争前分别后，八、九年没有见过面。直到解放后的一九五一年的春天，姥爷担任新中国的马政司顾问，来西北视察时，到了银川，先同父亲通了电话，告诉他老人家第二天要来阿旗。母亲听到后，兴奋得一宿没有睡着，第二天天不亮就忙着起来准备。当与姥爷相见时，母亲象个小孩儿一样，一头扑到姥爷的怀里，大哭起来，“阿妈”！“阿妈”地叫个不停。（满族人称父亲为“阿妈”）这种坎坷透迤生活多年，久别重逢的情景，使在场的人无不掉泪。

姥爷的到来，使全家上下欢欣若狂，尤其是母亲，整日价形影不离地跟随着姥爷，好象生怕老人丢下自己马上离走似的。那一天把阿旗所有的土特产和各种风味食品，全都拿出来，让姥爷尽情地品尝。姥爷最为赞赏的是阿旗的烤羊。烤

羊是阿旗远近闻名的名肴，做法是把一只绵羊宰杀后，取净头蹄下水，不用剥皮将羊毛退除，肚内装满各种调料，用铁链挂在一个大烤炉内，下面用梭梭柴（即札杠）烧烤五小时左右，烤熟后，由二人用铜盘把整羊抬到宴席桌前让众人观看，再抬回放到案子上用刀切开，把一盘烤肉以蒙古族礼节最先奉献姥爷面前，然后再一一送到每人面前，开始食用。烤焦的皮又酥又香又脆，烤熟的肉又软又香又烂，真是色香味俱全。实在是名不虚传的美味佳肴。宴会前，母亲把自己多年存的茅台酒也拿了出来。姥爷满心欢喜，能在边塞定远营，喝上贵州佳酿，真是开怀畅饮，津津有味。母亲也陪着喝得面红耳赤，就连素日滴酒不饮的父亲也兴奋地喝了好几杯。我们兄弟们轮流给老人们把盏，自己也喝了不少。这真是：天伦之乐乐如何，祖孙齐唱欢乐歌。

母亲还陪着姥爷到我父亲的马厩内看了一些走马。第二天老人便起身去执行他的视察任务去了。谁知道以后再等几年才能会面呢？

### 母亲参加了工作

我的母亲在阿旗来说确实是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妇女，但过去在旧礼教的束缚下，没有从政的机会，只能呆在家里，无从发挥她的才

能，母亲真冤啊！

阿旗一九四九年九月起义后，第二年，中共阿旗工作委员会成立，随后阿旗妇女联合会也成立起来，母亲被任为妇联主任，从此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一九五二年，她被邀请参加了宁夏省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这年的三月，宁夏妇联和宁夏省委组织部联合通知她任宁夏省妇联副主任。另外，还担任过宁夏民委的委员。以后宁夏省建制撤销后，她还担任过甘肃省妇联副主任和甘肃省民委委员等职务，但是最令她难忘的还是第一次参加全国妇代会那件事。

母亲常说，那次去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会议，是她一生政治生活中的新起点。她在临走的前两天，便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到阿旗妇联找了许多有关材料。这时母亲的烟瘾已经彻底戒除，恢复了健康，精神饱满，看上去年轻了许多。以往母亲出门，都有许多佣人、侍卫跟随，前呼后拥，而这次去掉了这些人，只有她一个人出去，轻装简从，跋山涉水，却格外精神起来。当别人把她送上车时，她激动地说：我这次是以新中国妇女代表的身份去北京的。我已经多年没有回北京了，这次回去是多么高兴啊！母亲兴致勃勃地向众人挥手告别。开完会回来，母亲滔滔不绝地给我们讲述在京期间的情况，谈到开会

期间见到许多党的高级领导同志情况时说：“他们待人热情、真诚，实在令人钦佩！同国民党相比，真是天悬地隔呀！”

## 母亲之死

一九六四年左右，我父亲和母亲已年老多病，先后离开呼市回北京休养。我仍留在呼市工作。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感到家庭成份极可能成为斗争对象，我整天为此替父母担忧。果然，到了一九六八年五月八日，在“革筹小组”领导下的“造反派”到北京，把我父母一同揪回磴口县巴彦高勒（当时巴盟盟府所在地）。下了火车就推上卡车，准备挂黑牌子游斗，多亏了敬爱的周总理已经发觉，打来电报不让游斗，这才停止游斗，妈妈与我父亲一同被“军管”起来。我母亲平素生性文雅、恬静，但到了紧要关头，就显出刚毅、倔强。据当时目击者说，母亲站在大卡车上，昂首挺胸，没有丝毫的畏惧。

在“军管”中，我母亲身体不支，不几天就病下来，八月间，“军管”当局强令母亲回了北京。十一月十九日，我父亲在揪斗中被折磨致死。消息传到呼市，我正被街道监视，不能自由行动，因而不能到巴盟去接骨灰，遂由我小妹

妹达锐到巴盟把骨灰盒带回呼市，我遂即毅然冲出街道的监视，同小妹一道把骨灰送往北京。等到家一看，映入眼帘的是惨遭抢抄、狼籍满地的家和母亲苍白的脸。我们向母亲请安后，委婉地把父亲的死讯告诉了母亲。母亲闻讯后，一恸之下，便昏了过去，醒来后，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骨灰盒喘吁吁喃喃自语说：“你可回来了”！母亲痛到极处，反而没有一点眼泪，只有哽咽的份儿，说不出一句话，我怕母亲悲伤过度，忙把骨灰盒移往内室。从此，呻吟在病榻上的母亲，嘴里只是喊着：“我真后悔先回来呀”！“你总算回来了”！当时的惨状，令人悲痛欲绝！我终日守在母亲床前，不敢离开半步，常常听到的还是她那喃喃自语的几句话，“我真后悔先回来……”。我虽然也很痛苦，但还得强颜为笑，百般地劝慰。晚上就睡在她床前的一个大沙发上。她睡不着，就和她说闲话儿。她非常痛恨“四人帮”。白天不敢说什么，到了晚上夜深人静，她就哭，哭得十分伤心。她总是说：“我最大的后悔，不该在巴盟抛开你爸爸先回来”。“如今我是不行了。你们等着看吧，共产党是不会让这些坏人长此下去害人的”。以后“四人帮”被打倒后，我深深佩服母亲的预见，在那动乱的年代，她就能把党和“四人帮”区别开来，相信党总会胜利，而且指

出了“四人帮”的可耻下场。

我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呼市来信说我下乡的大女儿要回呼市分娩，叫我回去安排一下。我正左右为难之际，我的二妹妹达芟芬从青海来到北京探亲，我便让二妹照顾母亲，我回去想料理一下就回来。谁知这一去竟成了与亲爱妈妈的永诀。就在我回呼市的第十天头儿上，慈爱的母亲病情突然恶化，与世长辞了，临终前给我打了电报叫我回来，可等我到京，已经见不到亲爱的母亲了。

亲爱的母亲，您知道吗？打倒“四人帮”后，内蒙党委和政府已为父亲和母亲召开了追悼会，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我们这些受株连的子女也落实了政策，安排了工作，现在我们生活得很好，这也足以告慰父母亲在天之灵了。请安息吧，妈妈！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巴彦淖尔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 - - 达理扎雅与夫人金允城史料专辑

作者 =

页数 = 2 1 8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